

5061/5600.1

中國語文

总第59期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JUL 11 1957

5

1957

1957年5月号(总第59期)目录

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 刘 又 辛 (1)

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方式和记音方法 李 荣 (10)

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 李 人 鑑 (16)

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 董 遵 章 (封4)

试论汉语单句复句的区分标准 刘 世 儒 (21)

语法范畴(语言学讲话之三) 彭 楚 南 (26)

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 高名凯、岑麒祥 (33)

汉语不能容纳外来语吗? 刘 泽 先 (40)

苗文中汉语借词的拼法问题 王 輔 世 (42)

语文短评 (45)

信箱

唐兰先生近著读后感 伯 韓 (47)

“综合文字”行得通 程 祥 徽 (47)

这种比喻是不妥当的 毛 西 旁 (48)

关于唐本《说文》的真伪问题 譚天民、周祖謨 (48)

编者作者应该注意汉语的规范 譚 永 祥 (49)

语文笔记

术语(语言学名词选译) 熊振顺译 (9)

苗语的社会方言 爱 卿 (15)

方言调查工作简讯

辽宁省普查组布置具体工作 尙 允 川 (32)

四川省上半年将完成32点方言调查 郑 坚 白 (39)

广东省开展试点调查工作 林 运 来 (44)

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

刘又辛

近几年来宣传文字改革的文章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因此反对文字改革的议论逐渐减少,拥护和欢迎的人一天天加多。可是有些人对于文字改革的信心还不足,对汉语拼音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从文化教育角度来看,汉字有改革的必要;可是从汉字和汉语的特点来看,总以为用拼音字母拼写汉语不一定合适;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最好的文字,不可能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而且汉字是独特的民族形式,如果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就会损害我们的民族形式。应该说,这种关怀是善意的;可是这种对于汉字性质的理解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应该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过去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文章,从教育的角度、从汉字的缺点方面谈的够多了,可是从汉字历史的演变方面谈的却非常少。历史的事实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历史的规律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过去文字学家谈文字历史的时候,只谈文字形体的演变;谈到汉字性质的时候,也只是从横的方面谈“六书”——谈汉字的构造,很少接触到汉字演变历史的问题。因此有几个有关汉字演变的大问题至今还没有认真讨论过。比如:汉字为什么长期停滞在以形声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阶段?汉字为什么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汉字是不是记录古汉语的唯一可能的文字?汉字演变的规律是不是和其他民族的文字演变规律完全不同?——这些问题都是汉语学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在文字改革的理论工作中就必然会产生一些片面性。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字的演变历史谈起,然后从这个角度谈文字改革的。

要研究汉字演变的历史,最好先谈谈一般文字发展的历史。以一般和特殊相比较,可以使汉字的特点更为突出,也就更容易抓住汉字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世界上一般文字的发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是记事图画阶段,第二是象形、表意文字阶段,第三是表音文字阶段。




记事图画只是文字的前身,还不能叫做文字,只是用画画的方法来记事的一种手段,从这些画中不能“读”出任何代表语言的语音;只能“看”了这些画,然后用语言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在苏贝里阿湖(Lake Superior)石壁上的一幅图画就是这一类的记事图画。这幅画上画了五只独木舟,舟上有人;一个酋长骑在马上;周围画了乌龟、鹰、蛇等代表几个部落;三条弧线和三个太阳表示三天。意思是:酋长带了五十一个各部落的印第安人,乘舟渡过了湖,一共用了三天的时间。^①很显然,这种图画不能叫做文字。



从记事图画发展为象形、表意文字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这种文字从综合的图画逐渐变为分析的符号,大体上以一个符号代表语言的一个词,因而成为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中的象形、指事、会意文字,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早期的巴比伦苏美尔象形文字,都是这个阶段的文字。有些语言学家把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分成两阶段,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理由在下面分析汉字演化阶段的时候再说。

象形、表意文字虽然比记事图画迈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文字有极大的局限性。首先,有许多抽象的词语不可能用这种造字的方法造出字来;其次,给每一个词造一个符号也太麻烦了。因此文字逐渐演变为标音文字。标音文字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标音节的文字,

^① 一般讲文字学的著作里(或语言学的著作里)大都提到这幅画,例如丁易著的《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1950年5月中外出版社印行)9页所载的。

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第二个阶段是字母文字，用少数的字母拼出無限詞語的語音。从象形、表意文字演变为标音文字的經過，对于我們是个有兴趣的問題，不妨在这里多說几句话。

从埃及文字發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象形、表意文字演化为标音文字的过程。在最古的埃及陶器上有一些純象形、表意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用一些圖画符号結合成一个复杂的表意圖画，用以代表一个句子。后来这种文字逐漸發生了变化：表示一个詞的象形文字逐漸有了代表音节的意义，而丧失了它的圖形所代表的意义。例如，表示“水渠”的象形字讀作“美尔”，就用来代表“美尔”这个音节；表示“星”的象形字讀作“斯巴”，就用来代表“斯巴”这个音节；表示“座位”的象形字讀作“謝特”，就用来代表“謝特”这个音节。^①——这样就能成为表音节的文字。比如埃及的一塊古碑上有个人名叫“奥西利”，却画了一个神座和一只眼睛来表示。因为神座的讀音是 hes，眼睛的讀音是 iri，两个象形字的讀音合起来是 hesiri（奥西利）。

在多音节語言中不可能产生完全的音节文字。因为用两个符号恰恰能够代表兩組音节相合的詞，像“奥西利”的讀音恰恰是“神座”加上“眼睛”的讀音，这种情形是比較少的，何况还有比这更多音节的詞。于是表音符号又进一步向分析方向演化。例如，表示門門的象形字讀作“薩”，就用来代表“c”的声音；表示小山的象形字讀作“卡”，就用来代表“k”的声音。这样就在埃及文字中出現了一套字母，用来表示二十几个基本音，形成了最早的字母文字（不过埃及文字还不是純粹的字母文字，还保留着一些表示形意的符号）。

从几种現存的古文字發展历史来看，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字演化的这种过程。从象形、表意文字發展成表音节的文字，最后發展为字母文字，这是一切文字演化的基本規律。不过，不能用一般的規律否認特殊的規律，忽視一种民族文字的特殊性。也不能拿特殊的規律和一般的規律对立起来，否認文字演化的一般規律。这几个演化的阶段也并不是可以用年代截然划开的，事实上有許多复杂錯綜的情况存在。我們得从总的趋势去看。

二

現在我們試来分析汉字的演化情况。

清朝的小学家在文字学的許多方面都有偉大的貢獻，可是对汉字構造的研究很少能够跳出許慎“六書”說的圈子。有的人認為六書就是平列的六种造字方法；有的人認為六書不但是造字的方法，也可以从六書的次第看出汉字造字的先后。清代的小学家沒有討論过我們這個問題。

清末以后，由于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又加以国外古象形文字的研究比較，有些学者才跳出六書的圈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沈兼士先生把文字分成四級：（見《文字形义学》）

一、文字画，二、象形文字，三、义字，四、表音字。

唐蘭先生把汉字分为“三書”：（見《古文字学导論》及《中国文字学》）

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声文字。

兼士先生的“文字画”实在是我們上面說的記事圖画，不應該算在文字里面。唐先生不贊成兼士先生的提法，其实他的“三書”和兼士先生的“四級”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先生說：“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圖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②我

①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譯本，315頁。

② 唐蘭：《中国文字学》，开明版，76頁。

在十几年前很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它比过去的六书说高明多了，可以看出汉字演化的粗略的轮廓。近几年来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感到唐先生的三书说破坏传统旧说之功居多，而解释汉字演化的历史还嫌不足。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答。现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汉字的演化可以分做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叫做表形时期，包括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

第二阶段：可以叫做假借时期，即六书的假借。

第三阶段：可以叫做形声时期，即六书的形声。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能够标出严格的年代，只能表示一个大体的趋势。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因字形而见义。所谓“形”是和语音对举的，所以连会意、指事字也都应该算做表形的文字。“六书”中所谓象形字如人、鸟、鱼、虫、水、火、山、川、木、耳、目、口、手、门、户、衣、日、月…等字，都是“画成其物、随体诂诂”，根据物的形体画成的；都是表形的文字。指事字如上、下、刀、寸、血、车等字，都是用一种形状再加以标识而造成的：刀字上点一点，表示刀刃；𠂇字下点一点表示手下一寸的地方；皿中一点表示器中有血；牛口里出气表示牛鸣。这不是表形文字是什么？会意字其实就是复合的象形字，抽象的事物用写实的画法画不出，就画两个图来表示，这就是会意字。比如“益”字下一半是盛水的皿，上一半是水，皿里盛了水，水就益（溢）出来了，用以“会”溢出的“意”。这不是也用“形”来表意吗？所以象形、指事、会意都是表形文字，不能把象形字和会意字分成两个阶段。三者都还离不开画画的手段。这种文字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听的。从一个符号虽然可以读出一个音节的声音，可是是通过这个符号的形体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去读这个声音的。因此我说这三书都是“表形”的文字。

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来看，表形文字的数目相当多，形声字却很少。假借字的本字也还是表形字。从甲骨文字的形体和应用的情况看，已经是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字。在甲骨文以前汉字一定有了一个时期的发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不能拿甲骨文当做第一个阶段的表意文字看待。它已经有了表音文字出现，可以把甲骨文当做第一、二阶段演化过程中的文字看待。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汉字开始走上标音文字的路，大量使用假借字。所谓假借字正是表形文字走上表音文字的第一步。许多从表形演化为表音的文字都走过这一段路。上面谈到的埃及文字的演化情况，也正是这样。可惜过去的文字家忽略了假借字在汉字演化中的重要性，因此汉字演化的真象也就被淹没了。

什么叫做假借呢？许慎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叫假借。这个定义下得很好。比如，“其”字是象形字，象一只箕的样子。后来写字的人碰见一个用作助动词的[k‘i]，声音和“其”一样，就依照声音借了这个“其”字来寄托当助动词用的“其”这个词，于是有了“其雨”、“其来”等用法。又如“万”字本象蝎形，假借为万千的万；“须”字本象鬍鬚形，假借为必须的须；“来”本象麦穗形，假借为往来的来；“难”本鸟名，假借为难易的难…。这种假借字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字中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也一直没有成为唯一的形式，因为它是和形声字在相互矛盾中发展的，最后还是形声字占了优势。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假借字的出现，无疑的是汉字向表音文字迈进了一步。这样的文字对记录汉语的能力大大加强了。凡是不易造或不能造的字，只要借一个同音字来使用就行。因此书面语言也可以比较接近口语了。这当然是一个大进步。

假借字的大量应用曾经引起长时期的文字混乱状况：一方面是同一个字可以假借为不同

的詞，就造成一字多義的現象。一方面是同一個詞可以用不同的假借字來表示，就造成一詞異形的現象。這種情況在古代文獻中留下明顯的痕跡。比如，甲骨卜辭中的“又”字代表左右的右、福祐的祐、有無的有有三個字。“帝”字代表上帝的帝、禘祭的禘兩個字。又如“甲”字的本義是鱗甲的甲^①，甲骨卜辭借為甲乙丙丁的甲；後來又借為“狎”（《詩經·芄蘭》：“能不我甲”）；又借為“押”（《廣雅·釋言》：“甲、押也”）；又借為“胛”（《釋名·釋形体》：“甲、闔也，與胸脇相會闔也”）；又借為兵甲的甲。

至于一詞異形的現象大多數是借字的不同的遺迹。比如：

《毛詩》：周原膺，《韓詩》“膺”作“腓”。《左傳》：宛來歸祊，《谷梁傳》“祊”作“邲”。《論語》：文質彬彬。《說文》引“彬”作“份”。

至于“蒙蒙”可寫作“夢夢”、“瞢瞢”、“憊憊”；“忡忡”可寫作“櫛櫛”、“蛩蛩”、“充充”、“恍恍”；“委蛇”一詞竟有逶迤、委佗、委它、委陀、委也、倭夷、威夷、郁夷等三十幾種不同的寫法！

像這種假借混亂的情況，在先秦典籍中幾乎觸目皆是。清朝的經學家以及後來的語言學家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極有用的工作。比如經典異文的考訂工作，古籍的訓詁和注釋工作，詞典的編纂工作（如朱起鳳的《辭通》）。這些工作絕大部分是針對着古書中的假借現象做的。如果我們不明白假借的道理，簡直就不能讀先秦的古書。可見假借現象在漢字發展史中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一個漢字演變史上的重要階段。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解釋古代文獻中的這種普遍現象；如果不承認假借是漢字走向表音文字的初期現象，就不能理解漢字發展的道路。

為什麼假借字會有這種混亂情況呢？這也并不奇怪，這是任何文字在開始走向表音文字時期必然會產生的情況。因為在表音文字初期，人們使用借字是隨手抓來應用的，如果再因為引用人的方言不同，借用的字當然不會一致。可是這種混亂情況也不會永遠繼續下去，如果這種文字一直向着表音文字發展，沒有其他的因素去干涉它，那末，這種混亂情況是會逐漸澄清的；聲音相同的符號可以合併，最後可以留下所需要的音節符號，成為表音節的文字。漢字假借的混亂現象正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問題倒不在於混亂，是在於漢字為什麼沒有繼續向表音文字發展。

從文獻的材料看來，儘管從甲骨卜辭就已有了大批假借字出現，可是另一方面，形聲字也從萌芽而漸漸興盛，和假借字形成矛盾的兩個方面，最後決定性地進入了漢字的形聲字階段。這種現象是非常有趣的。大約從甲骨文以後，用表形的辦法造字的階段已成過去（象形、指事、會意），只剩下假借和形聲兩條路線的鬥爭。假借是代表表音文字的路線，形聲字是代表表意文字的路線。這種矛盾發展的現象，正可以引導我們揭露漢字為什麼沒有走上拼音文字的秘密。

現在先談談第三個階段——形聲字階段的情況。拿許慎在公元100年所做的《說文解字》來看，大約80%是形聲字。80%是一個決定性的百分比，以後漢字便只有量的發展，沒有質的變化了。從《說文》以後，字數日漸增加，而增加的新字絕大多數都是形聲字。宋鄭樵在《通志·六書略》里有一個統計：象形、指事、會意字一共1,455字，而形聲字却有21,341字，占當時總字數的94%左右。可見從《說文》以後，漢字已經成為以形聲字為主的文字，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從什麼時候開始形聲字的力量戰勝了假借字，堵塞了走向表音文字的路。

① 用郭沫若先生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83頁。

我們若以甲骨卜辭作漢字第一、二階段之間的代表材料(表形、假借),而以《說文》作第三階段的代表材料,用兩者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形聲字的增加有種種不同的方式。^①

(1) 甲骨文原是表形文字,《說文》變為形聲字的,如:

歷 甲骨文從止、從二禾,原是會意字,畫一只腳在禾田里。《說文》變為從止,麻聲,成為形聲字了。

疾 甲骨文作一支箭射在腋下,因而引申為凡突然而來的病叫疾,本是會意字。《說文》變為從疒,矢聲,成為形聲字了。

謝 甲骨文象兩手持席形,象古人兩手持席而謝的意思,會意字。《說文》:從言,殳聲,也變成形聲字了。

(2) 甲骨文原有“初文”,後加形旁變成形聲字的,如:

止 象足趾形,原為“趾”字的初文,象形字。後來“止”引申為停止,乃加“足”旁成形成聲字“趾”。

丁 原象釘頭形,後乃有“釘”字。

申 為電字的初文,象電閃狀,後乃加“雨”成“電”字。

云 本象雲彩繚繞之形,象形字,後乃有“雲”字。

(3) 原為假借字,後乃加形旁成形成聲字的,如:

帝 甲骨文“帝”字本象花蒂形,卜辭中借為上帝的帝,又借為禘祭的禘,後來乃有“禘”、“蒂”二字。

正 甲骨文借為征伐字,後來乃有“征”字。

易 原意或象蜥易的形狀,甲文借為“賜”字,後來乃另造“賜”、“錫”、“蜴”等字。

上面三種方式又以第三種為主要方式。我們可以用古代文獻中殘存的文字材料,證明《說文》中許多形聲字都是在原來的假借字上加形符造成的。我們也可以從經典異文的材料中看出,凡是借字和形聲字對文的,形聲字多半是代表後起的字。比如,《詩經·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說文》引詩作“薺”。“薺”是假借字,在前;“薺”是形聲字,後起。又如,《陳風·衡門》:“可以樂飢”。《箋》、陸德明《經典釋文》又作“療飢”;《韓詩外傳》作“療飢”。很明顯,“樂”是假借字,應在前;療、療是形聲字,應在後。這類材料多極了,彙集起來可以寫一本大書。我們可以設想,許多先秦典籍中的假借字原來一定相當多,後來因為形聲字的發展,把原來的許多假借字都改形成聲字了。我們只有明白了文字的這種演化規律,才會理解為什麼形聲字的數目增加得這麼多。

至於究竟在什麼時候假借字和形聲字的鬥爭發生了質的變化?換句話說,漢字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進入形聲字階段的?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我認為,在春秋戰國期間,形聲字已經逐漸居于優勢。這是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劇烈變動的時期,文字的變化也不能不跟著發生變化。在這時期,假借字和形聲字兩條路線的鬥爭達到最高點,而最後卻決定性地表現在秦朝的文字統一政策上面。李斯“書同文字”的政策是根據當時的需要決定的。這種政策就決定了漢字的形聲字路線。所以漢字的第三階段應該從秦朝開始。

總起來說,漢字演化可以分成上述的三個階段。儘管其中的現象是錯綜複雜的,但如果認清主流,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演化的趨勢。現在我們要接觸到前面提出的那個問題了:漢字為什麼是這樣演化的?漢字為什麼沒有走上拼音文字的路?為什麼最後成為這種以形聲字為主的表意文字?

三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和語言的情況有關;而語言的歷史是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分不開的。因此,我們要研究漢字為什麼終於演變為形聲字式

^① 請參看:楊樹達先生《積微居小學述林》(1954年2月中國科學院出版)97頁;《造字時有通假証》,201頁;《文字中的加旁字》等文。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1935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4、31、40、143、227各頁。

的表意文字,就不能不从汉族的历史談起,不能不从汉族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汉字所以演变成这种文字,是中国政治上的日趋統一和方言分化之間的矛盾所产生的結果。殷商的文字似乎只在都城中使用,掌握文字的人是少数的“卜人”,是当时家內奴隶的一种。使用文字的場所也有限。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只要那些少数的“卜人”能懂得就行了,似乎还没有普及到都城以外的氏族中去。因此这种文字的讀者只要根据都城的口語就行了,用不着照顧各地的方言。这是文字向表音方向發展的一个良好条件,所以甲骨文的假借字比較多。

周朝以后,历史的情况有了变化。地域比以前扩大了,人口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文字使用的范围比以前扩大,認字的人比以前多。文字不但在都城使用,而且在各地諸侯的宮廷中也都在使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發展到很高的地步,这时社会上出现了許多“自由”的讀書人——“士”。这些人要著書立說,幹政治,教学生。使用文字的場所扩大了。一篇文章可以拿到各国去傳閱,一个使臣要帶了使命到各国去办交涉。因此这时的語言文字都大大的發展了。从語言的發展上看,这时的漢語已經發展成詞彙比較丰富、表达力相当强的語言。从文字上看,为了适应語言發展的需要,字数一天天多起来。可是在文字的創造上碰見了一个矛盾:为了記錄語言中新出現的一些新詞語,不能不用大量的假借字来滿足这种需要;因而写文章的人根据自己的語音,用大家習慣了的假借法来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当这种滿是假借字的文章拿到方言不同的讀者手里时,麻煩就来了。因为讀者和作者的方音不同,有些字很难猜到它到底代表的是哪些詞。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只好在假借字上加上个形符。这样一来,尽管兩地的讀音不一致,靠了形符的帮助,也就可以懂得作者的意思。因此,在汉字中就出現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假借字不断地在著作者的笔下产生;一方面这些假借字又很快的加上形符变为新形声字,在更大的区域内通行。又因为作者在使用假借字时是依照自己的方音为取舍标准,各地方音不同,同一詞的假借字也不相同,但在变成形声字时却以意义为准,加上了相同的形符,就又造成了許多异体字。这就是周末几百年文字急剧演化的輪廓。

战国以后,中国政治統一的趋势已經成为定局。从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国家”的数目逐漸减少,到战国末年的七国爭雄,已經决定了大一統的局势;最后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性質已經和商周时的所謂統一有了本質上的差別。秦始皇不只要求名义上的統一,而且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做到一定程度的統一。当时七国的情况是“田疇异亩,車涂异軌,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語异声,文字异形”。这样的情形是不符合統一的要求的。秦始皇針對这种情况,采取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①的政策,以达到政治、經濟、文化統一的目的。別的不講,單說語言文字的統一問題。語言文字是交际的工具,这种工具不統一——“言語异声,文字异形”——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大困难。可是語言不是憑人力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統一的。秦朝的李斯似乎懂得这个道理,因而只提出了“書同文字”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尽管“言語异声”,口語不一致,只要能够“書同文字”,有一套全国通用的書面語言符号也就可以勉强滿足当时的需要了。具体的做法是以秦国文字做底子,“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統一的政策倒不一定像过去有些学者所說的:用秦小篆去統一六国的大篆,因为秦小篆和六国文字在形体上並沒有不同的系統(可作証明的材料很多,这里不具論)。只是由于長时期来假借字和形声字的交互發展而發生的文字不一致的現象非常严重,为了消灭这种現象,李斯才决定用秦文字做标准来統一六国文字,“罢”掉那些在写法上和秦文不相同的异体字。

①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为了貫徹这个措施,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做了《倉頡》、《爰历》、《博学》等字書,要大家都这样用、这样写。只要全国写出来的字一致就行,不管这些字念出音来一样不一样。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有一种通行全国的書面語做交际工具。至于口語不統一虽然不太方便,好在做皇帝做宰相的既不要和各地的人民經常当面談話,而在全国範圍內在大庭广众中应用口語的机会又不多,能够有这种共同的“書面語”做工具,在封建社会已經够了。

不过这样一来,却帶來了新的困难。因为方言不一致,李斯等人規定的字,各地人讀起来差別很大,有时会因为字的意义不能决定而引起誤会,因而减少了文字的作用。怎么办呢?如果原来規定的是假借字,最好的办法是加上形符造成形声字,就是因方音不同讀音稍差,看了形符也就可以“猜中”代表的是哪个詞了。比如《毛詩》“如有殷憂”的“殷”,《韓詩》作“慇”;《齊詩》“以伐崇庸”的“庸”,《毛詩》作“墉”。“殷”和“庸”显然不如“慇”、“墉”的意义容易判断。因此,秦朝的这个措施以及当时的政治情势,就最后决定了汉字的命运。汉字再也不能向拼音文字發展,假借字的路子宣告終止。以后增加新字的时候,可以不必先用假借的办法再加形符,而是直接制造新的形声字了。比如汉賦中出現的大批形声字,就是在这种風气影响下造出来的。于是汉字决定性的进入第三个阶段——形声字阶段。

我們試平心靜气地想想,在全国方言紛歧的时候,这种文字的确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文字。尽管它有很多缺点,可是在当时是無法避免这些缺点的。汉字在历史上尽了它的偉大任务,它在几千年来始終是唯一的全国性的書面交际工具;我們祖先用它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貴著作。它虽然在文化教育上造成許多困难,不能忠实地記錄口語,可是作为一个方言紛歧、人口众多、地域广闊的大国的文字來說,它这些缺点原是不可避免的。“缺点”是我們今天看出来的,古人只感觉到它的方便,並沒有認識到今人所認識到的它的缺点。我們可以根据今天的条件批評汉字,說汉字已經不是今天的好文字了;却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代的事物。我想,这道理是大家承認的。

离开汉族發展的历史去孤立地分析語言文字的历史,对許多現象就会难于了解。在一定的条件下,方言可以統一于共同語;在另一条件下,方言也可以分化为不同的語言。俄国的烏克蘭語、白俄罗斯語、俄罗斯語原来是不同的方言,后来由于政治經濟的原因,这三个部族發展成三个民族,这三个方言也就發展成三个民族語言。假如汉族發展的历史不是从分化走向統一,假如春秋的一百多个“国”或战国的七个“国”分裂成許多民族,那么这些民族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民族語言。这种民族語言的方言大約不会像漢語这样紛歧。如果有了这个条件,文字演化的情况也就会有所不同。在那种条件下的文字不会不向表音文字發展。也許“汉字”早在兩千年前已經成为像埃及、巴比倫的古文字一样成为历史上的遺物了。

今天的漢語虽然已經不同于兩千年前的漢語,方言的發展已經停止,民族共同語已經形成;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方言还没有消灭,普通話(民族共同語)还不能通行全国。因此,尽管我們从文化教育上迫切要求文字改革,要使汉字拼音化,可是目前还做不到。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會議上决定要在全国範圍內推广普通話,給文字改革打下基础,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定更加証实了上面有关文字史的論断。

現在我們再进一步提出另一个問題:汉字沒有發展为拼音文字,除了上面的原因以外是否还有別的原因,是否跟漢語的性質有关?

有人認為,語言的性質可以决定文字的性質。汉字之所以沒有演变为拼音文字,是由于漢語是單音节語所决定的。我不承認这种看法,因为这不合事实。不錯,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号体系;文字必須适合这种語言的特点。比如英語、法語、德語是不同的民族語言,因此,尽管它

們使用的字母都是拉丁字母，可是為了適應各個語言的語音、構詞特點，這些字母的讀音、拼法都不相同。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的性質可以決定文字”，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某種語言的“性質”適合於用拼音文字，而另外一些語言的“性質”只適合於用表意文字，這種理解是錯誤的。事實上，只要這種語言的內部方言差別不大，再加上其他適當的條件就可以發展為拼音文字。蘇聯為國內各民族創造文字的經驗，我國近幾年來為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經驗，更可以說明無論什麼性質的語言都可以使用拼音文字。所以，漢語的性質不適合於拼音文字的說法是和事實不合的，是錯誤的。

四

如果我們所談的漢字演變不但包括過去，也包括現在和將來，那末，我們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推測，在不久的將來，漢字將要進入發展的第四階段——拼音文字階段。不過這一個階段的完成不是自然而然地演化的，而是要用文化教育的力量在短期內促其完成的。我們正在做的文字改革工作，正是這樣一件工作。我們是不是有完成這個工作的必要與可能呢？用怎樣的辦法、什麼步驟來完成這個工作呢？一直到目前還有些不同的看法。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光是說明過去，還要說明今天和明天。從漢字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這些問題是有好處的。

關於漢字改革的必要，已經有數以百計的文章談到了，彙集起來可以印成幾大本。我就不再談它了。關於文字改革的可能，還有很多人抱著善意的懷疑態度。有些人懷疑漢語是否可以改用拼音文字；也有些人懷疑是否可以人為地促進文字的發展和改革。從歷史演變的情況看，漢字本來也是向着拼音文字的方向發展的；因為上面談到的原因，才長期停滯在形聲字階段。如果否認漢語可以拼音化，就等於抹煞文字演變的規律性。事實上早在甲骨文時期，漢字已經有了大量的假借字，這些假借字其實就是演化未成的音節文字。這種事實可以說明，只要語言內部沒有方言紛歧的障礙，漢語拼音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於人為地進行文字改革，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謂“人為”，是我們掌握了民族文字發展的規律，提出改革的辦法，目的是在加速文字的演變。這正是語言學家和教育工作者應該發揮主動性的地方。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用什麼步驟進行改革。

從漢字演化的歷史來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改革步驟。一種是按照文字發展的規律一步一步走的辦法；一種是一步走向拼音文字的辦法。如果依照第一種辦法，第一步可以提倡寫別字，把所有的漢字都變成假借字；第二步整理那些假借字，只留下几百個代表音節的漢字，使它成為音節文字；第三步，在音節文字中選几十个漢字代表几十个音素，使成為初步的字母文字；第四步，整理和簡化这几十个字母，使成為易寫、美觀、合用的字母。按照第二種辦法，一面為使用拼音文字創造條件，一面擬定一種字母文字從事實驗、修正。等到條件成熟，就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最後在日常應用上完全代替老漢字。至於老漢字呢，使它當做一種研究古代文化的工具，完整的保存下來。

關於第一個辦法，雖然沒有人主張過要用那麼複雜的步驟，可是類似的主張是有過的，而今天也還有。記得在二十幾年前胡愈之先生曾提倡過寫別字的辦法，主張把漢字的數目盡量減少，同音的字可以借用，就是屬於這一類性質的辦法。近來唐蘭先生所提倡的綜合文字說，也是主張這個辦法的。唐先生反對文字改革用“爆發”的形式，主張在漢字中加進若干个拼音字，使他“由量變到質變”。我認為，這一種分几步走的辦法，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不行不通。從理論上看，若是人們一旦掌握了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就能用這個規律去推遲或加快事物發展的速度。我們掌握了文字發展的客觀規律，就有可能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里把文字

推进到完全拼音化的阶段。中国社会停滞在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停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百多年；但是我们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推倒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很快地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有一些还停滞在原始共产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少数民族，就不必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阶梯，可以一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进行文字改革正可吸取这种经验。许多已经进行过文字改革的国家，如越南、朝鲜的经验，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况且中国还有个汉字的问题。汉字虽然在今天看来必须加以改革；可是另一方面，它身上背着几千年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比较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不要在文字改革过程中破坏了它。对汉字加以适当的整理是对的，企图打乱汉字的系统，从汉字的废墟中培养新文字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从实践上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文字改革不能改一次又改一次，那样做会使多少人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新文字”、“新新文字”。这种实践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我们的文字改革只应该用第二种办法。现在文字改革的步骤正是这么安排的。目前用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是给实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将要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当做拼音、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同时也在使用中加以考验和修正，作为拼音文字的准备。在汉字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整理和简化。这些做法完全和汉语汉字的发展情况一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这汉字演化史的第四个阶段即将开始。我们全国的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正在辛勤地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将要完成有关祖国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五亿七千万人口的民族中进行一次彻底的文字改革工作，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呢。（1955，11，18初稿，1957，4，4改写）

术 語（语言学名词选译）

术语（термины）这个词在近代拉丁语中为 terminus，作“术语”解；古拉丁语中的 terminus 则作“末端”、“界限”解；它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它是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过程等等的正确的标记物。术语和一般的词不同，它的意义有专业性，它的语义范围准确。语言中一般的词常常是多义的，但它们一变成术语，就在各该部门中得到它们所需要的单义性。术语有着巨大的科学意义。要正确地了解自然界或社会中的具体现象，就必需正确地规定它的名称。同时术语不仅是标记一个概念，而且还使它精确，以及使它与相似的概念分别开来。科学一方面产生相应的术语，而另一方面则把科学认识的成就巩固在术语中，并随着术语本身意义的精确化而向前发展。术语通常是由该语言中现有的那些词彙要素按照语法规则构成。术语构成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语言中现有的词加上一个专门术语的意义。由共同标准语来的术语通常变成了原词的同音词，也就是与原词的意义部分地或完全失去了联系〔试比较：операция“（外科）手术”和 операция“（银行）业务”，полотно“（铁路）路基”和 полотно“（康拜因）传动带”，等等〕。很多时候，人们是以现有词彙为基础通过下列方法构成术语：词的组（如 пылеуловитель“除尘器”），加词缀于派生词的方法（лить“铸造”，отливка“铸件”，нагрев“加热”，подогрев“预热”，подогреватель“加热器”），构成词组（如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铁路”，прямой угол“直角”），以及同时综合地利用上面各种方法（如 противотанковое заграждение“反坦克的障碍物”，зуборезный станок“齿轮割丝车床”，железобетонная плотина“钢筋混凝土的堤坝”）。为了构成术语，常常利用希腊、拉丁语中的词的要素（例如 термометр“寒暑表”是由希腊语的 θερμη“热量”μετρέω“测量”这两个词来的；эквивалент“等价物”是由拉丁语 aequus“同等的”，valens〔词干是 valent〕“有力的、有价值的”这两个词来的）。有时，各种不同的语言中的术语由仿译的方法构成（试比较 пятилетний план“五年计划”，法语的仿译词是 plan quinquennal，德语的仿译词是 Fünfjahr-plan，等等）和由外语借词构成。有一些科学、技术、艺术上的术语由于它们随着相应的事物、概念、现象而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因而成了国际术语，也就是说，应用在不同的语言中时，仅在发音和书写上有点差别（例如 механизм“机械论”，машина“机器”，генератор“发电机”，Soviet“苏维埃”，kolkhoz“集体农庄”，等等）。（熊振顺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2卷，白水校）

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和記音方法*

李 荣

从 1956 年 6 月号起,本刊陸續發表了几篇討論方言調查方法的文章:怎样求出力音和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1956 年 6 月号、7 月号),怎样編写本地人學習普通話的手册和方言調查报告(1956 年 11 月号),怎样求出汉语方言音系的輪廓(1956 年 12 月号),怎样記詞彙和語法例句(1957 年 1 月号),怎样使用《汉语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1957 年 3 月号),方言里的文白异讀(1957 年 4 月号)。

这些文章和本期發表的这一篇,已經編成《汉语方言調查手册》,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华書店發行,供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参考之用。此外,調查手册还包括《語音訓練》、《音标举例》、《北京語音概要》、《北京同音字表》等章节。

一 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

国务院指示,要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兩年內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調查工作。这个工作由各省高等学校語文系担任,各省市教育厅局組織推动。

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應該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这里提出几种方式,以供参考。

(1) 在高等学校內部調查。語文系可以訓練本省籍同学,自己調查自己的方言,这种方式最省時間。也可以請本校的师生員工或者他們的家屬作發音合作人,由語文系教师及受过訓練的同学記音。

(2) 办方言調查訓練班。可以在省城或其他城市办方言調查訓練班,調各县能說本地話的中小学語文教师来班學習。每县一至二人,講授方言調查基本方法,訓練他們記錄自己的方言。訓練班人数不宜过多,以免教学困难,影响效果。同时也不能操之过急,希望在十天半个月之內每个學員都把自己的方言記完整理好,这样子可能影响材料的可靠性。兩三个月办一期也許比較合适,拿一个多月時間學習,拿一个多月時間調查整理。开班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些本地区的重要方言。教的人心中有数,容易結合实际,不会流于空論。教材举例都是本省方言,“能近取譬”,学的人也好了解。

(3) 派調查人員到各县調查。組織各学校教师及受过訓練的同学,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的學員到各县去調查。初次調查,最好兩人合作。比方第一个地点由調查人甲記音,調查人乙在旁边听着提意見,第二个地点由調查人乙記音,調查人甲在旁边听着提意見。兩人合作記过兩三处以后再分开,每人独当一面。假定工作人員多,或者觉得一个人把握不大,可以一直是兩人一組,輪流記音。在野外作調查工作最好由点到面,逐漸扩充。記完一县,就地整理,求出音系,編好同音字表,請發音人核對之后,再記鄰近各县。因为相鄰

各县,方音总比較接近,这样容易累积經驗,提高速度。不过不能片面追求速度,一味求快,欲速則不达,記的材料不可信。

这些方式可以采用一种,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互相补充。別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只要有效果就行。

这次普查,原則上是一县一个調查点。要是全县方言差別不大,就可挑一个能代表全县方言的地方作調查点,比方县人民委员会所在地,旧县城或者較大的市鎮。要是全县方言很紛歧,就得挑两个甚至更多的調查点,每一个調查点可以請一位或兩位發音合作人。兩個人可以有商量,互相提醒。發音合作人的本地話要說得純粹有把握,最好是久居本地,不常出門的,并且初上学的老师不是外地人。發音合作人的文化不必很高,有中学程度就可以了。(不識字的人当然也可以作發音合作人。不过請他們作發音合作人,調查人員所受的訓練要更严格,并且所費的時間要更多。所以这次普查要請識字的人作發音合作人。)記音之前要向發音合作人說明工作的意义,爭取他積極合作。千万不要有那种錯誤思想,以为自己是来研究方言的,發音合作人只是供給材料的工作对象。發音合作人要是煩了,發音不認真,解答問題不耐心,我們得到的材料也就不可靠了。發音合作人要是生了气,下次他根本就不来了。所以,記音的时候要处处照顧發音合作人,这样才能作好工作。

到各县調查,在調查点和發音合作人的選擇上有种种便利,要是在省城或其他城市調查各县方言,只好迁就一点,不过一定要挑本地話說得好,不杂外路口音的。至于从各县調人来作方言調查工作,務必在通知上說明白,要調能代表本地方言的人。

現在說一說調查的人力。首先需要各省教育厅重

*这是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義的一部分。

視这个工作，積極組織推动。至于調查的主力当然是各省区的高等院校語文系老师和受过訓練的同学。其次教育部和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畢業的學員。他們在班上都學过方言調查，有初步的調查能力。各省的方言調查工作，最好尽量吸收他們参加。有些省区，高等院校方言調查人力較多，語音研究班畢業學員在各校教师指导下，可以做一部分調查工作。有些省区高等院校方言調查人力較少，更加需要語音研究班畢業學員多作些工作。

还有，各地高等学校以外的文教界人士和其他知識分子，比如中小学語文教师，有很多对語音学有研究，对方言調查工作很熱心的。他們也是方言調查的力量。如何發揮这些力量，重要的是組織問題。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一方面，教育厅和高等院校可以多方挖掘潛力，了解本地区有誰能参加調查工作。另外一方面，能参加調查工作的人也可以主动和本省的教育厅、高等院校取得联系。只要各方面都动起来，我們一定能够在 1957 年以前完成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据可靠估計，專業的工作人員，調查本省的方言，平均一月大概可以完成一点，一人一年就是十来点。業余的工作人員，每年作兩三点也是很可能的。

二 記音和整理的步驟

記音之前，先要細看一下《汉语方言調查簡表》和其他調查資料（《方言調查字表》，《方言調查詞彙手冊》）書前的“說明”。

(1) 記發音合作人的情况。人名和地名中如有不常用的字也要記音。

(2) 記声調例字。由調值定調类。定調值时注意本方言字調的相对音高，高低升降度数都由本方言的字調互相比較得來。記声調时專辨字調，不必記整个字音。

(3) 得出調类調值之后，記声母例字和韵母例字。記声母韵母的时候，每个例字要記整个字音，包括声母、韵母、字調三方面。字調可以記調值，也可以記調类。比如“布 pu⁴”也可以作“布 pu³”。

(4) 声調、声母、韵母例字之中，有些字用橫綫“—”相連，是比字音用的。字音完全相同（声韵調都相同），就在橫綫上画一个“v”号，表示相等，也可以用等号“=”表示前后的字同音。字音不同，在橫綫上加“x”号，或者画一条豎杠穿过橫綫，表示不等。除了表示相等或不相等之外，仍旧要把实际字音記下来，不过声調例字可以只記字調。

(5) 声母、韵母記过之后，稍微整理一下，看看声韵調大致情形。然后往下記“音系基础字”。把这里每一个字的音都記下来。声韵調都要記。

(6) 記完“音系基础字”之后，把前后五百四十个字全部审查一过，归納音位，求出声、韵、調的系统。

(7) 求出声、韵、調的系统之后，着手編制同音字表的間架。以韵母为綱，每一韵中縱列声母，橫列声調，把已經記过的字按音填到相当的地位。填完之后，就可以看出声韵調配合关系的輪廓。

(8) 接下去記單字表和單字表附录。記完之后，把这些單字也登到同音字表里。整理單字音系統可以使用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

(9) 同音字表作好之后，請發音合作人核對一遍。

(10) 同音字表核對完畢，就开始記詞彙語法部分。把詞彙語法里發現的新字也登到同音字表里。

(11) 根据同音字表所收的字，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12) 要是用《方言調查字表》記音，記完声韵調例字，整理出声韵調大致情形之后，就接着記字表本身，作同音字表。同音字表核對之后記《方言調查詞彙手冊》，把新字登到同音字表里。然后作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

三 記音样張

ts- tsao ⁶⁰ 槽 ⁶¹ 招 ⁶² 焦 ^{tsi-}	ts'- ts'an ⁶³ 倉 ⁶⁴ 昌 ⁶⁵ 槍 ^{ts'i-}
ts'- ts'ao ⁶⁶ 曹 ⁶⁷ 巢 ⁶⁸ 潮 ⁶⁹ 橋(橋)	s- sæn ⁷⁰ 散 ⁷¹ 扇 ⁷² 線 ^{siæn}
ts- tsu ⁷³ 祖 ⁷⁴ 主 ⁷⁵ 舉(舉)	ts'- ts'u ⁷⁶ 醋 ⁷⁷ 处(處) ⁷⁸ 去 ^{ts'y}
	郑州 ts, ts', ɛ 比北京偏后
ts'- ts'un ⁷⁹ 从(從) ⁸⁰ 虫(蟲)	s- su ⁸¹ 苏(蘇) ⁸² 書 ⁸³ 虛 ^{ɕy}
tsəŋ ⁸⁴ 增 ⁸⁵ 爭 ⁸⁶ 蒸	s- səŋ ⁸⁷ 僧 ⁸⁸ 生 ⁸⁹ 声(聲)
ts'- ts'u ⁹⁰ 粗 ⁹¹ 初 ⁹² 鋤 ⁹³ 除	s ⁹⁴ 思 ⁹⁵ 师(師) ⁹⁶ 施
	n- zæn ⁹⁷ 認 ⁹⁸ 硬 ^{əŋ}
zæn ⁹⁹ 擾 ¹⁰⁰ 腦 ¹⁰¹ 襖 ^{ao}	
z'u ¹⁰² 若 ¹⁰³ 約 ^{y'u} 約 ^ɕ	yn ¹⁰⁴ 閏 ¹⁰⁵ 运(運)
	而 ¹⁰⁶ 兒 ^ɕ 耳 ^ɕ 二 ^ɕ
ien ¹⁰⁷ 延 ¹⁰⁸ 言 ¹⁰⁹ 然 ¹¹⁰ 緣 ¹¹¹ 元 ^{yæn}	zæn ¹¹² 軟 ¹¹³ 远(遠) ^{yæn}

上一面的記音樣張，記的是鄭州方言，《漢語方言調查簡表》第四面，聲母例字下。現在簡單說明一下，分成四點來說。

(1) 記音的位置——字的上下左右都可以記音，看情形而定。

(2) 省略的辦法——記音要爭取時間，能省略的都可以省略。兩個字完全同音，只要畫上同音記號，記一個音就夠了。如“鋤”和“除”同音，只記一個音。“槽”字的音是[tsao 4]，“招”字的音是[tsao 4]，因為“招”字韻母聲調都和“槽”字一樣，就從簡寫作[ts-]，聲母後頭畫一短杠。“焦”字的音是[tsiao 4]，從簡寫作[tsi-]。樣張上用橫綫相連的字，鄭州都同調，所以每一組只要第一個字記上調號，別的字就省去調號，表示同前。如“粗”和“初”調子相同，“粗”字記上調號，“初”就省去調號。當然也可以不省。如“認”和“硬”調子相同，兩字都記上調號。調值符號最好寫在音標後頭，如“閏”[yn 4]等等。不過“軟”字的調號寫不下了，只好記在音標末了的上頭。樣張上記的調號都是調值號。要是充分把握也可以記調類。比方鄭州陰平是[4]13，陽平是[4]42，上聲是[4]54，去聲是[4]31，可以分別用“□”、“□”、“□”、“□”表示，調類符號加在字或音標的四角。

(3) 比較字音——樣張上例字中間的橫綫是讓我們注意字音異同的。在橫綫中間斜畫一杠“/”，或者在橫綫上頭打一個叉“X”，表示前后的字不同音。如“槽/招/焦”表示這三個字在鄭州都不同音。在橫綫上加一鈎號“∟”表示前后的字同音。如“鋤∟除”表示這兩個字鄭州同音。同音的字也可以用等號“=”連起來，不同音的字也可以用不等號“≠”連起來。比較字音不限于表上用橫綫相連的字，如“言”和“緣”同音，中間隔着一個“然”字，就用兩條綫把“言”和“緣”連起來，表示同音。記音的時候可以隨時找合適的字比較字音異同。樣張上記了“而”字的音，邊上寫一個“兒”字，底下寫上“耳”字“二”字，都是拿來和“而”字比較的。“兒”字和“而”同音，就在中間加上等號“=”表示，“耳”字和“而”字只有調子不同，就在“耳”字後頭記上調號。“而”和“耳”不同音，“耳”和“二”不同音，“兒”和“二”不同音，分別用不等號相連。

(4) 調查表是草稿——記音用的調查表不怕塗改批注，因為這本來是草稿。記錯了就塗去，比如“增”字讀[tsəŋ 4]，不小心寫錯了，把聲母寫成[ts]，就畫去另寫。當地的發音特點可以用文字注上，如樣張上寫的鄭州[tɕ-]、[tɕ'-]、[ɕ-]比北京偏後。這些話記在調查表上比寫在筆記本里或紙片上方便，整理的時候一眼就看到，並且不會丟。

樣張上“約”字記作[y 4]，因為[u]不顯著，就寫

一個小[u]。記音的時候聽見什麼記什麼，整理的時候可以斟酌情形簡化，再用文字說明。

記音的時候一定要寫得清楚，別人看了也能明白，自己事後看了也能明白，這就行了。

四 比較字音舉例

調查方言是個記錄事實的工作，應該聽見什麼記什麼。可是有時會遇見疑難的情況，不能決定兩個听起来很相近的音是不是相同。這時候最好用比較字音（簡稱比字）的辦法來決定。要比較聲母，最好挑韻母和聲調都相同或相近的字。要比較韻母，最好挑聲母和聲調都相同或相近的字。要比較聲調，最好挑聲母和韻母都相同或相近的字。現在就下列七個問題，選些例字，並且略加說明，以供調查整理時使用。

比較字音的時候要注意兩點。第一，每一問題底下列舉的例字，不一定全部一致。第二，方言里有自由變讀現象。比如有些吳語方言，[in]韻和[iŋ]韻可以隨便讀，不能分別字，也許同一個字這次讀[in]，另一次讀[iŋ]韻。又如長江沿岸有些方言，[n-]、[l-]兩聲母可以隨便讀，同一個字有時讀[n-]，有時讀[l-]。碰到這種情況，整理的時候就挑一個比較常用的音，同時說明哪兩個音可以自由變讀，沒有分別字的功用。

(1) 比清濁和陰陽平

比清濁有兩個目的，一是問方言的聲母是否像古音和今吳語一樣分清濁，要是不分清濁，古濁音現在讀什麼音；二是看古聲母清濁對今聲調的影響。這一節的例字都是古平聲，是問方言是否分清濁分陰陽平的。

比清濁和陰陽平例字表(上)

古不送氣清音平聲	古送氣清音平聲	古濁音平聲
北京陰平	北京陰平	北京陽平
災	猜	才
低	梯	題
遭	操	曹
標	飄	瓢
雕	挑	条
兜	偷	頭
金	欽	琴
單	攤	壇
煎	遷	錢
顛	天	田
搬	潘	盤
津	亲	秦
奔	噴	盆
尊	村	存
當	湯	堂
漿	槍	牆

古不送气清音平声 古送气清音平声 古濁音平声

庄	瘡	牀
精	清	晴
东	通	同

第一豎行北京陰平,声母不送气,如“东”[$c_{\text{t}}\text{uŋ}$]。

第二豎行北京陰平,声母送气,如“通”[$c_{\text{t}}^{\text{h}}\text{uŋ}$]。第三豎行北京陽平,声母送气,如“同”[$t_{\text{t}}^{\text{h}}\text{uŋ}$]。北京“通”和“同”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有声調不同。

要是第三豎行的字和第一豎行相对的字同音或者和第二豎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平。

比清濁和陰陽平例字表(下)

古清音平声	古濁音平声
北京陰平	北京陽平
夫	扶
呼	湖
花	华
飞	肥
灰	回
番	煩
欢	桓
分	墳
昏	魂
荒	黃
封風	縫馮
烘	紅

第一豎行北京陰平,如“荒”[$c_{\text{t}}\text{xuaŋ}$]。第二豎行北京陽平,如“黃”[$\text{ɛ}^{\text{h}}\text{xuaŋ}$]。“荒”和“黃”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有声調不同。要是这两豎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平。

(2) 比清濁和陰陽去

上节已經說过,比清濁有两个目的,一是問方言的声母是否分清濁,二是古声母清濁对今声調有何影响。这一节的例字都是古去声,是問方言是否分清濁和陰陽去的。

比清濁和陰陽去例字表(上)

古不送气清音去声	古送气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布	鋪	步
变	騙	便(方便)
妬	兔	度
戴	恣	代
对	退	队
帝	替	第
到	套	盜
鬥	透	豆
旦	炭	蛋

古不送气清音去声 古送气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冻	痛	洞
鎮	趁	陣

上表的字,北京一律是去声。北京不分陰陽去。

表上北京第三豎行的字和第一豎行相对的字北京同音,如“布”=“步”[pu^4]。

要是第三豎行的字和第一豎行相对的字同音,或者和第二豎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去。

比清濁和陰陽去例字表(下)

古清音去声	古濁音去声
北京去声	北京去声
好(喜好)耗	号
孝	效
兽	寿
秀	袖

北京第一豎行和第二豎行相对的字同音,都是去声,如“秀”=“袖”[ɕiou^4]。

要是第一豎行和第二豎行相对的字同音,那个方言就不分陰陽去。

(3) 比 n-、l- 声母

北京分[n-]、[l-],有些方言完全不分[n-]、[l-],有的方言一部分字分[n-]、[l-],一部分字不分。現在根据影响[n-]、[l-]分不分最主要的条件把例字分成四組。

比 n-、l- 声母例字表

(1) 洪音非鼻尾	(3) 細音非鼻尾
奴 怒 惱 納	爐 路 老 臘
男 难 囊 农	泥 你 紐 女
	犁 里 柳 旅呂
(2) 洪音鼻尾	(4) 細音鼻尾
男 难 囊 农	藍 爛 郎 籠
	年 娘
	蓮 凉

(4) 比 f-、x- 声母

北京分[f-]、[x-],有些方言不分[f-]、[x-]。例字根据古声母的清濁分成兩組。

比 f-、x- 声母例字表

(1) 古清音		(2) 古濁音	
北京 f-	北京 x-	北京 f-	北京 x-
夫	呼	扶	湖
府	虎	肥	回
飞	灰	飯	換
番	欢	房	黃

(1) 古清音

北京 f-	北京 x-
方	荒
做	謊
分	昏

影响 [f-], [x-] 分不分的条件除古声母清濁外, 还有今韵母, 如有些方言[u]韵母字不分 [f-], [x-], 其他韵母字分 [f-], [x-]。

(5) 比尖团

古“精清从心邪”五母和古“見溪群曉匣”五母在今細音前同音, 叫“不分尖团”, 反之, 叫“分尖团”。例字根据古声母清濁分成兩組。

比尖团音例字表

(1) 古清音

“尖”	“团”
祭	計
焦	驕
酒	九
箭	見
精	經
井	景
秋	邱
千	牽
清	輕
西	稀
細	戏
小	曉
修	休
箱	香
想	响
須	虛

(2) 古濁音

“尖”	“团”
就	旧
齐	騎
牆	强
全	权

北京話和百分之八十的官話都不分尖团。北京“酒”=“九”[tɕiəu], “須”=“虛”[ɕy], “就”=“旧”[tɕiəu], “全”=“权”[ɕtɕyan]。

影响尖团分不分的条件除古声母清濁外, 还有今音韵母。比方有的方言齐齿呼分尖团, 撮口呼不分, 有些方言相反, 撮口呼分尖团, 齐齿呼不分。

(6) 比 ts, ts', s 和 tɕ-, tɕ'-, ɕ- 声母

北京分 [ts-], [ts'-], [s-] 和 [tɕ-], [tɕ'-], [ɕ-], 有些方言不分 [ts-], [ts'-], [s-] 和 [tɕ-], [tɕ'-], [ɕ-], 有些方言分 [ts-], [ts'-], [s-] 和 [tɕ-], [tɕ'-], [ɕ-], 可是分法和北京不同。这一节是問 [ts-], [ts'-], [s-] 和 [tɕ-], [tɕ'-], [ɕ-] 的, 把北京 [ts-], [tɕ'-], [ɕ-] 声母字分成兩类, 一类叫“s₁-类”, 一类叫“s₂-类”, [ts-], [ts'-], [s-] 声母字叫作“s-类”。例字表分成四組。第二組又分成四小組, 用橫綫隔开。

比 s- : s₁- : s₂- 例字表(一)

s-类	s₁-类	s₂-类
資	枝	知
此	齿	耻
四	試	世
灶	罩	照
操	抄	超
曹	巢	潮
曾	爭	蒸
僧	生	声
苏	梳	書
素	数	恕

比 s- : s₁- : s₂- 例字表(二)

s-类	s₁-类	s₂-类
紫	紙	
絲	詩	
死	史	
擦	插	
杂	閤	
灾	齋	
猜	釵	差出差
再	債	
才	柴	
腮	篩	
早	找	
酸	門	
算	測	
宗	中	
葱	充	
从	虫	
总	腫	

比 s- : s₁- : s₂- 例字表(三)

s-类	s₁-类	s₂-类
倉		昌
桑		商
葬		脹
藏		長(長短)
叟		手
村		春
存		腎純

比 s- : s₁- : s₂- 例字表(四)

s-类	s₁-类	s₂-类
	愁	綢
	瘦	兽
	餽	趁

北京 ɿ- 、 ɛ- 兩类同音,如“爭”=“蒸” $[\text{tʂəŋ}]$,把 ɿ- 和 ɛ- 分开是为了調查方言的便利。还要注意北京讀合口的字,方言里头有不同讀法。

有些方言沒有 $[\text{tʂ-}]$ 、 $[\text{tʂ'-}]$ 、 $[\text{ʃ-}]$ 等声母,这四組例字逢洪音一律讀 $[\text{ts-}]$ 、 $[\text{ts'-}]$ 、 $[\text{s-}]$ 等声母,逢細音一律讀 $[\text{tʃ-}]$ 、 $[\text{tʃ'-}]$ 、 $[\text{ʃ-}]$ 等声母。

(7) 比 -n、-ŋ 韵尾

北京 $[-n]$ 韵尾和 $[-ŋ]$ 韵尾在各种元音后头都分得很清楚,現在把例字依元音分成七組,可以問出方言在哪一种情况下分 $[-n]$ 、 $[-ŋ]$,在哪一种情况下不分 $[-n]$ 、 $[-ŋ]$ 。

比 -n、-ŋ 韵尾例字表

(1) $\text{an} : \text{aŋ}$		(2) $\text{uan} : \text{uaŋ}$	
北京-n	北京-ŋ	北京-n	北京-ŋ
搬	帮	官关	光
盤	旁	管	广
瞞	忙	欢	荒
翻	方	晚	網
煩	房	万	望
反	做	享	裝
販	放	川	瘡
單	当	船	牀
攤	湯		
壇	唐		
炭	燙		
蘭	郎		

(3) $\text{ian} : \text{iaŋ}$

北京-n	北京-ŋ
連	涼
箭	醬
淺	搶
錢	牆
賤	匠
仙	箱
乾(乾坤)	强
延	陽

(4) $\text{en} : \text{eŋ}$

北京-n	北京-ŋ
珍	征
眞	蒸
震	証
身	升
神	繩
晨	承
根	庚

(5) $\text{in} : \text{iŋ}$

北京-n	北京-ŋ
賓	兵
貧	平
民	明
津	精
亲	清
秦	晴

尽	靜
信	姓
斤	經
緊	景
銀	迎
因	英

(6) $\text{uən} : \text{u(ə)ŋ}$

北京-n	北京-ŋ
敦	东
屯	同
頓	冻
鈍	洞
尊	宗
村	葱
存	叢从
春	充
棍	貢
坤	空
網	孔
魂	紅
溫	翁

(7) $\text{yn} : \text{yŋ}$

北京-n	北京-ŋ
群	瓊
勤	穷
运	兄
	胸
	用

苗語的社会方言

爱 卿

苗語的西部方言里,在四川古蔺县箭竹乡一帶,有一种妇女說的社会方言。除了妇女会說能懂外,別的人甚至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也一句不懂。这种社会方言使当地的男人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們不知道妇女們說的是什麼話!其实这不过是在共同語的基础上,利用語音变化而成的一种妇女的社会方言罢了。

这种社会方言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当然不可能發展成語言。它是建立在原有的詞彙和語法構造基础上,把語音按一定的、非常簡單的規律变化而成的。从下面的圖例就可一目了然。

苗語原来音綴:	声母	+	韵母+声調(一个音綴)
社会方言音綴:	声母+y+声調	s+	韵母+声調(两个音綴)
例字:	koŋ(我)	=	k + o+ŋ
	kyŋsoŋ(我)	=	k+y+ŋ s+o+ŋ

按照这个規律,本来一个音綴变成了两个,一句話里有多少音綴都要加倍;又由于插进去的“y”和“s”,这样就使这种社会方言和原来的話不同了。难怪当地的男人不懂,因为語音的外貌和音綴的数量發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說,說“kauŋ”(你)为“kyŋsauŋ”,說“zuŋŋ”(好)为“zyŋsuŋŋ”,說“nfiŋ xoŋ nkəuŋ”(他唱歌)为“nfiŋ siŋ xyŋ soŋ nkyŋ səuŋ”。有的时候,当一个音綴变成两个音綴后,常常又在当中插进去一个“təuŋ”(叫)比方說“koŋ”为“kyŋsoŋ”,也可說为“kyŋ təuŋ soŋ”。同样, nfiŋ xoŋ nkəuŋ 也可以說为 nfiŋ təuŋ siŋ xyŋ təuŋ soŋ nkyŋ təuŋ səuŋ。不过这个“təuŋ”加不进去沒有多大关系,意思仍然是一样,加进去显得更复杂些罢了。

我們在調查少数民族語言时,要注意全面調查,少数民族語言当中是有社会方言的,我們不應該忽略过去,也不要受它困惑。

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

李人鑑

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种语法现象。本文只谈一谈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完成体的情形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情形(所说的这些情形,在泰兴的邻近的县市如如皋、泰州、泰县、南通等地也相差不多)。

在泰兴方言中,表动词的完成体的“Y、πY、《Y”这三个音段被广泛地使用着。“Y”是跟在阴声字后面的,“πY”是跟在阳声字后面的,“《Y”是跟在入声字后面的。它们被使用的情形,大致如下文所述。

(1) 用在动词和它所带的宾语之间。例如:

开Y门 扫Y地 绞Y桌子

穿πY衣裳 戴Y帽子 攤πY床 洗Y脸 吃《Y早饭 上πY学堂

秤πY鱼 买Y肉 打Y作料

他骂Y人,打Y人,还以为自家有理。

我打算看πY卷子,算πY分数,坐汽车回去。

有Y晚娘,就有晚老子。(俗语,下同)

吃《Y果子忘πY树 吃《Y馄饨省πY面。

好Y瘡疤忘πY疼。得《Y千貫巴万貫。

做Y亲,合《Y心。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Y、πY、《Y”的语法作用,相当于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

(2) 用在动词和它所带的数量词之间。例如:

去Y一趟 唸πY五遍 吃《Y兩頓 睡Y一覺

去Y个把月 穿πY大半天

洗Y一水 踢《Y一脚 亮πY一角天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Y、πY、《Y”的语法作用,也相当于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

(3) 用在动词和它所带的方所词之间。例如:

活《Y世上 住Y东大街 站πY門外头 坐Y椅子上 伏《Y桌子上 睡πY床上

写Y紙上 記Y賬上 挂Y牆上 浸πY水里 滴《Y地下

放πY心上 頂πY头上 風吹Y身上 鞋子穿πY脚上

羊毛出《Y羊身上。(俗语,下同)

牛扣Y樁上也是老。

眼睛落《Y菜碗里。好雨落《Y荒田里。

睡Y鼓里摸天。灘子脫《Y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动词,都表示已经实现的动作,

所以在它们的后边能够加上“Y、πY、《Y”这几个音段。在泰兴方言里,在这种表示动作着落的结构里,动词的后面是可以紧接着方所词的(也间或说成“風吹Y在身上”“鞋子穿πY在脚上”等等);但在北方话里,在同样的结构中,动词的后面是必须加上一个“在”字的。不过北方话里,动词的后面不再用其它任何语法成分来表示这动作已经实现的情态。所以泰兴话里的“風吹Y身上”,在北方话里是说成“風吹在身上”。虽然上列各例中的“Y、πY、《Y”换成“在”字完全讲得通,但决不能误以为这“Y、πY、《Y”,是和“在”字相当的东西。

(4) 分别地用在使成式的两个成分的后边。例如:

我打Y破Y一个碗 他吃《Y飽Y飯就睡 我說《Y他丁

門关πY好Y了 灯吹Y熄《Y了。衣裳晒Y干πY了 狗子吆Y走Y了他去Y远πY了我問πY清楚了

以上这些例子,如改说成北方话,只要把“Y、πY、《Y”这些音段取消了就行。在北方话里,虽然整个使成结构的后面可以加上一个“了”字表动作的完成(如在句末,那么语气词“了”就兼表动作的完成),但第一个成分的后边是决不用任何成分来表示这一个意思的。

(5) 用在动词和它所带的表示结果的俗语或成语之间。例如:

吃《Y个飽上加飽 跌《Y个头青眼腫。

鬧Y个烟霧塵天 罵Y个不亦乐乎。

在以上这些例子中的“Y、πY、《Y”的语法作用,相当于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

(6) 用在动词后面,这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能在静止的状态中绵延下去的,或者因这动作而形成的状态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的。例如:

台上坐Y主席团。操場上站πY許多人。

牆上挂Y一个鐘。匾上刻《Y兩個大字。

捧πY个猪头没得店燒。(俗语,下同)

看πY和尚罵禿驢。这山望πY那山高。

睜πY眼睛吃老鼠藥。

在以上这些例句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已经实现,但“坐”的仍“坐”在那儿,“挂”的仍“挂”在那儿,“坐”这一个动作在实现以后,它能在静止的状态中绵延下去,

“挂”这一个动作在实现以后，也能使被挂的东西长时期维持着这“挂”的状态。其他可以类推。在泰兴方言里，“Y、πY、《Y》”这几个音段，仅表示动作已经实现，不管这动作所形成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存在。可是在北方话里，认为“坐”“挂”等所形成的状态仍然存在，也就认为“坐”“挂”等动作并没有结束；因此，在北方话里，在这种情形之下，动词后所加的词尾不是表示完成状态的“了”，而是表示持续状态的“着”。泰兴方言中“Y、πY、《Y》”这几个音段，它同时能表示如同北方话中“着”字所能表示的意义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7) 用在动词带副词性后附的复合体后面。例如：

跑杀《Y》了 气杀《Y》了 吃杀《Y》了 冤枉杀《Y》了
找到Y了 看到Y了 听到Y了 算到Y了
吃掉Y了 用掉Y了 死掉Y了 飞掉Y了
睡着《Y》了 说着《Y》了

北方话在这些例子中“Y、πY、《Y》”等音段所在的位置，是不用任何成分表示的，这是因为后面有语气词“了”，北方话叫这个语气词同时表示完成状态的缘故。

(8) 用在连用的两个动词中的第一个动词的后面。例如：

a. 跑Y门口去 飞Y树上去 跌《Y》河里去 放πY桌子上去
b. 吃《Y》尝尝 跑Y要要 忙πY过年 等πY拿 騙πY吃 搶πY做
c. 听πY人说 看πY人做

在以上的例子中，a.类第一个动词说明动作，第二个动词说明趋向。在泰兴方言中第一个动词后有“Y、πY、《Y》”这几个音段，在方所词前不用“到”字。北方话和这情形不同：第一个动词后不带动词词尾，在方所词前用“到”字。所以泰兴话里的“跑Y门口去”在北方话里是说成“跑到门口去”的。这样的结构，如果要表示动作已经完成，须在第二个动词后面再加上“Y、πY、《Y》”等音段，如“跑Y门口去Y了”“飞Y树上去Y了”等等。b.类第一个动词说明手段，第二个动词说明目的。这样的结构在北方话里一般地是在第一个动词后面加上词尾“着”字，如“忙着过年”“等着拿”等。又这样的结构，要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也须在第二个动词后面再加上“Y、πY、《Y》”等音段，如“吃《Y》尝πY了”“跑Y要子Y了”“忙πY过Y年”等等。c.类第一个动词是管着第二个动词的，但两个动词的施动者不同。这样的结构在北方话里，可能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加上词尾“着”字（如“看着人做”），也可能什么都不用（如“听人说”）。

从以上所说的各点看来，泰兴方言中跟在动词后面的“Y、πY、《Y》”这几个音段主要地是表示“动作已经实现了”。虽然它们和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的功

用有相同的地方，但毕竟有好些显著的区别：

a. 泰兴方言中的动词后附成分“Y、πY、《Y》”，仅表示动作已经实现，不兼表决定的语气。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如果在句末，它就兼表动作的完成状态和决定语气。（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b. 泰兴方言中的动词后附成分“Y、πY、《Y》”，能表示动作已实现后的绵延下去的静止状态，北方话里的动词词尾“了”没有这种能力，只有动词词尾“着”能够这样。

c. 泰兴方言中动词后附成分“Y、πY、《Y》”所表示的语法作用，有些在北方话里是用别的表现形式加以表示的（如用“在、到”等词），有些是干脆不用任何语法成分加以表示的。

二

现在进一步谈谈紧接在动词后附成分“Y、πY、《Y》”后面的其他成分。这里要谈的有三种情形。

(1) “Y、πY、《Y》”后面的“了”（ㄌㄞˊ）。这样的“了”，主要地表示新情况的产生，这新的情况是早先没有发生或是早先没有被注意到的。例如：

花开Y了 花开Y是《Y》了
门关πY了 门开πY好Y了
他吃《Y》了 他吃《Y》饱Y了
人来Y了 人来Y齐Y了

这样的“了”，大致相当于北方话里的语气词“了”。所不同的是这个“了”不表示动作的完成，仅单纯地表示语气。所以北方话里的“花开了”这句话，在泰兴方言里要说成“花开Y了”，北方话里的“人到齐了”这句话，在泰兴方言里要说成“人到Y齐Y了”，句中的“Y”这一类的音段是决不能够随便省去的。

须附带说明一下：动词后面如果跟着宾语，这“了”字的语音是会因前一个字语音的不同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变化的规律大概是：“了”在阴声字后面读“ㄌㄞˊ”，在阳声字后面读“ㄌㄞˊ”，在入声字后面读“ㄌㄞˊ”。例如：

念πY书了（ㄌㄞˊ） 开πY门了（ㄌㄞˊ）
吃《Y》粥了（ㄌㄞˊ）

(2) “Y、πY、《Y》”后面的“里”（ㄌㄞˊ）。这样的“里”，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至多可以勉强地说，它能帮助“Y、πY、《Y》”这几个音段表示动作已经实现。例如：

他饭吃《Y》里就睡觉，觉睡醒πY里又吃。
这个伢儿，这些时变πY乖Y里。
狗子打Y里三天不上屎缸。（俗语，下同）
瘦杀《Y》里的鹅儿抵到一只鸡。
伢儿养πY老Y里，胆养πY小Y里。

这样的句子，以假设句与祈使句为最常见，这是由

于說話的人每每假設某一事件的已經實現，或者希望某一事件的一定實現，所以用得着完成體。例如：

你曹走 Y 里，家里就清閑得多了。

不要混跳，回頭跳 Y 跌《Y 里。

快点吃《Y 里去上学！拿帽子戴 Y 正 πY 里！

所以說這樣的“里”並不表示什麼意義，這可以从下面的比較中看出來：

你拿 Y 他的，就拿出來把他，不會拿就拉倒。

你拿 Y 里，就拿出來把他，不會拿就拉倒。

你不曾睡覺，就請你去一趟；你睡 Y 覺，我就請旁人去。

你不曾睡，就請你去一趟，你睡 Y 里，我就請旁人去。

原來動詞後面不帶賓語，才能加上“里”字，一帶賓語（或者帶似賓語），這“里”字就用不上，所以說這樣的“里”字是不表示什麼意義的。

从上面的比較中，我們还可以看到：“拿 Y 里”和“不會拿”對比，“睡 Y 里”和“不會睡”對比，足証“拿 Y 里”就是“已經拿”，“睡 Y 里”就是“已經睡”。“Y、πY、《Y”已經表示動作的實現，“里”字並沒有添加任何新的意思。

如果拿“里”字和“了”字相比，那麼“里”字比“了”字是更加顯得虛靈了。“了”字還能表示新情況的產生，“里”字要是沒有前面的“Y、πY、《Y”這幾個音段，它連表示動作的已經實現也是做不到的。“里”和“了”在用法上的不同，可以从下面的對話中看出來：

甲：張三呢？

乙：睡 Y 了。

甲：睡 Y 里就不要驚動他了。

甲：喜兒拿碗打 Y 破 Y 了！

乙：打 Y 破 Y 里要甚緊，打 Y 破 Y 里好再買呀！

在上面的例子中，用“了”字的表新情況的產生，用“里”字的表事情的已經如此，是十分明顯地可以看出來的。

(3) “Y、πY、《Y”后面的“下”(FY)。這樣的“下”，本來是一個不定指的方所詞，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來：

人在下你不說，人走 Y 了，你囉里囉索的。

你可在下吃？你在下吃，我就多做上點飯。

你可睡 Y 下？你睡 Y 下，我就預備你的床鋪。

我到他學堂里，他不在下，找到他家里，他不在下，這個人要找他真費難。

你家去拿飯做 Y 下等，我一定去抗你一頓。

在上面的例子中，前三例的“下”，意思是“這里”，後兩例的“下”，大概要解釋成“那里”，才說得過去，“下”是一個不定指的方所詞是很明顯的。

因為“下”是方所詞，“在下”等于說“在這里”或“在那里”等等，而人們說某某人在什麼什麼地方做什麼，意味着動作在進行的狀態中，所以在泰興方言中“在

下”逐漸發展為表時態的虛詞。例如：

他在房里哭——他在下哭。他在房間里寫字——他在下寫字。

正因為“在下”本用以表方所，所以我們還能在“在下”之上加“正”“將將”這一類的詞（如說成“他正在下吃飯”等等），不過加上這類詞以後，語氣更加強烈一些罷了。

上文說到在泰興方言中，動詞可以選接方所詞，用不着“在”這一類的詞做媒介，所以動詞後帶上“Y、πY、《Y”，再帶上“下”也就能表示動作在靜止的狀態中持續下去。例如：

人坐 Y 凳上——人坐 Y 下。鐘挂 Y 牆上——鐘挂 Y 下。

灯点 πY 桌子上——灯点 πY 下。他晒 πY 地下——他晒 πY 下。

因為“下”是不定指的方所詞，說話的人着重動作的狀態，不強調方所，將實詞虛化，以“下”代一般的方所詞，因而動作的綿延狀態便明顯地呈現了出來。

這樣的語法作用，在北方話里一般地是用“着”字來表示的。如上面例句中的“人坐 Y 下”“鐘挂 Y 下”，北方話里說成“人坐着”“鐘挂着”都是。

在泰興方言中，動詞如果帶上“Y、πY、《Y”這幾個音段，後面就必須帶別的成分，不是帶上各種實體詞如第一節所談到的那些，便是帶上“了、里”或者“下”，二者必居其一。為了說明“了、里、下”三者的區別，底下再舉類似的句子作一番比較。

門关 πY 了，不要出去了。

既然門关 πY 里，我只好不出去了。

門关 πY 下，不曉得他怎樣得《Y 進來的！

伢兒睡 Y 了，我可以做我的事了。

伢兒睡 Y 里，我才能够去做我的事。

伢兒睡 Y 下呢，你曹不要拿他吵 Y 醒 πY 里。

从這兩組例子中可以看出：“了”表新情況的產生，“下”表動作在靜止狀態下的延續，“里”差不多什麼都不表示，只是一個襯音。

順便交代一下：動詞的後附成分“Y、πY、《Y”之後再帶“下”字，一般地是在動詞後不帶賓語這一情況之下的。如果動詞帶賓語，那就需要把賓語提到前面去，讓它成為被動句的主語。但賓語不變位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如下面的例子：

关 πY 門下吃。点 πY 灯下看書。

這種結構大概是後起的。在這種結構里，“下”的方所意義已經完全消失，只說明動作在靜態中持續下去罷了。

三

現在从動詞帶後附成分的情形來看看動詞的性

質，研究一下一般的動詞是不是還可以再分一分类。

有一部分動詞，它本身並不表示動作，只表示人或
其他生物的一種姿態。這種動詞，在泰興方言里，可以
在它的後面加“Y、πY”或“《Y”再加“下”字。如果要使
這種動詞表示動作，那就需要在它的後面加上動向
詞。例如：

	靜 態	動 態
坐	坐 Y 下	坐起來 坐下去
站	站 πY 下	站起來 站過去
伏	伏 《Y 下	伏下去
跪	跪 Y 下	跪下去

另外有一部分動詞，它本身表示動作(用不着加上
動向詞然後表示動作)。這種動詞，在泰興方言里，是
不能夠在加了“Y、πY、《Y”這些音段之後再加“下”字
的。例如：

走：可以說“走 Y 了”“走 Y 里”，不能說“走 Y 下”。

說：可以說“說 《Y 了”“說 《Y 里”，不能說“說 《Y
下”。

吃：可以說“吃 《Y 了”“吃 《Y 里”，不能說“吃 《Y
下”。

看：可以說“看 πY 了”“看 πY 里”，不能說“看 πY
下”。

另外有一部分動詞，它本身表示動作，但它也能够
表示因它而產生的一種靜態。這種動詞，在泰興方言
里，當它表示靜態時，是可以在它的後面加“Y、πY”
或“《Y”再加“下”字的。例如：

	動 態	靜 態
挂	挂 鐘	鐘挂 Y 下
关	关 門	門关 πY 下
放	放 花 瓶	花瓶放 πY 下
睜	睜 眼 睛	眼睛睜 πY 下

由此看來，一般的動詞似乎可以分為三類：1)靜
態動詞，2)動態動詞，3)兼動靜態動詞(當它表示人物
的動作時是動態動詞，當它表示人們所看到的人物存
在的靜態時是靜態動詞)。一些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
它能帶上靜態動詞的標志，所以它們是應該歸併在靜
態動詞這一類裏邊的。例如：

他歡喜 Y 下呢。他高興 πY 下呢。現在他正愁 Y
下呢。

靜態動詞只表靜態，所以它是比較接近於形容詞
的。從另一方面說：形容詞也有接近動詞的地方，所
以好些形容詞可以用如動詞。在它們的後面加上“Y、

πY、《Y”再加上“了、里”或“下”。例如：

他個子大 Y 了。你胖 πY 了。天黑 《Y 了。

他這些時瘦 Y 里。這個鐘慢 πY 里。一直等到天黑
《Y 里。

他頭低 Y 下工作。這個大厅閑 πY 下好多時了。他
的心辣 《Y 下呢！

分別動態動詞和靜態動詞是有它的用處的。譬如
說，証明某些句子是否同型，我們就可以依據動詞的性
質結合句子的結構和它的功用加以恰當的說明。例如：

人坐 Y 凳上。人坐 Y 下。
鐘挂 Y 牆上。鐘挂 Y 下。

像這樣的句子就是同一類型的，因為它們同表靜
態(用的是靜態動詞)，句子的結構又是完全一樣的。
雖然有些人憑邏輯的常識來看這些句子，說它們並不
一樣，它們有主動句和被動句的分別，但人民大眾是不
管這些的，他們認為這都是敘述靜態的句子，物我一
體，其間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又如：

凳上坐 Y 兩個人。
牆上挂 Y 一個鐘。

這兩個句子也是同一類型的。它們描繪一種靜
態。每個句子都包含三個部分：1)所要描繪的空間，
2)人物的靜態(用靜態動詞，須注意只能是靜態動
詞!)，3)呈現着此種靜態的人物。這種句子跟用動態
動詞敘述人物動態的句子完全不同。現在有好些人在
爭論，說這兩個句子的後面兩個部分，有的是主謂關
系，有的是動賓關係，並不完全一樣。其實人民大眾也
是不管這些的，它們認為這同是一種描繪靜態的句子。
要論句子中的後兩個部分，在它們看來“鐘”固然有使
之“挂”者，“人”也應有使之“坐”者，都存在着客觀因
素，其間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又如：

凳上坐 Y 兩個人。
兩個人坐 Y 凳上。

這兩個句子雖然所描繪的同是一種靜態，可是它
們所描繪的對象並不相同：前者描繪某一個空間里的
靜態，後者却是以人物為描繪的對象的。這具體地表
現在句子的語序上(須注意在泰興方言中這兩個句子
所包含的成分是完全一樣的)。當人民大眾在使用語言
這一工具來描繪一種靜態時，他們知道如果描繪的是
某一個空間里的靜態，這種句子應該用方所詞開頭，如
果描繪的是某一個人的靜態，這種句子應該用表示
人物的名代詞開頭。究竟採用哪一種句型，他們是能
夠恰當地加以抉擇的。又如：

凳上坐 Y 兩個人。
教室裡走出兩個人來。

這兩個句子，一個描繪靜態，一個敘述動態，它們
並不是同一類型的句子，這是從動詞的性質(前者用靜
態動詞，後者用動態動詞)，从句子的含義，句子的結

稱，誰都能够区别出来的。

我認為：我們對於動詞還研究得不够，對於動詞的複雜性也理解得不够，所以我們對於某些句子的分析，還免不了在意見上有相當大的分歧。如果我們從形態方面着眼，把動詞再分一分类，从分类的中間找出各類動詞的特性來，這樣句型問題就容易得到解決，某些不必要的爭論也就可以漸歸平息了。

四

最後就個人偶爾想到的和上文有關的幾個問題談一談。

(1) 在泰興方言中，有些語句因為結構相同或類似，動詞的後附成分完全相同，可是在北方話里卻用了不同的語法成分。例如：

放 πY 桌子上。

放 πY 桌子上去。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放在桌子上”，後者說成“放到桌子上去”。動詞不帶詞尾，卻用了如一般人所說的副動詞“在”和“到”。又如：

台上坐 Y 主席團。

主席團坐 Y 台上。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台上坐着主席團”，後者說成“主席團坐在台上”。同一個泰興方言中的“ Y ”，在北方話里卻一個變成了“着”，一個變成了“在”。又如：

操場上站 πY 許多人。

操場上站滿 πY 人。

在北方話里，前者說成“操場上站着許多人”，後者說成“操場上站滿了人”。同一個泰興方言中的“ πY ”，在北方話里卻一個變成了“着”，一個變成了“了”。

為什麼能有這樣的分歧，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相當有趣的問題。

(2) 我以為現代語言中的某些語法成分，它們的來源是相同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在語言的長期的發展變化中，它們才慢慢地分道揚鑣，形成各種不同的語法成分。例如古代語言中的“于、與、歟”，它們就是同一個音段“ Y ”的書面上的分化，這在泰興方言中似乎還能找到具體的證明。上文已談到在泰興方言中有“住 Y 東大街”之類的說法，這和古代語言中“居于東街”的說法實際上是一樣的。（大約古代語言中的“ Y ”這一個音段，在書面的語言中是不妨省略的，所以“居于東街”也可以寫成“居東街”。）泰興方言中“ Y 、 πY 、 $\langle Y \rangle$ ”這幾個音段，也能作連接成分用，如古代語言中的“與”。例如：

鍋里有現成的飯 πY 菜，快點盛得來吃吧。

您 πY 我兩個人，總算巴到點好處了。

一天到夜，一年到頭，一點事不做，只曉得吃 $\langle Y \rangle$ 耍子。

這些人只要聚成塊，就是吵 Y 鬧，打 Y 搞，無法無天的。

泰興方言中的“ Y 、 πY 、 $\langle Y \rangle$ ”這幾個音段，也能表示疑問、祈使、感嘆等語氣，如古代語言中的“歟”。例如：

你不去 Y ？ 你還要罵人 πY ？ 你是不是想喝點粥 $\langle Y \rangle$ ？

快點走 Y ！ 喝上點湯 πY ！ 快趁熱吃 $\langle Y \rangle$ ！

這多好耍子 Y ！ 這個人多懶 πY ！ 這是多喜歡哭 $\langle Y \rangle$ ！

由此看來，研究現代漢語方言，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也是有種種好處的。

(3) 語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們從幾種不同的方言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到各方言的發展情況，也可以看到它們的發展前途。例如在泰興方言中，動詞的後附成分只能表示動作的已經實現，決不能用以兼表語氣；而北方話里的“了”卻能同時兼兩種作用。又如泰興方言中的使成式，第一個動詞後要帶上“ Y 、 πY 、 $\langle Y \rangle$ ”這幾個音段，而在北方話里，使成式中第一個動詞之後已不帶任何語法成分。這說明了兩種方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北方話該說是稍微走到前面去了一些了。就拿上面所說的情形論，泰興方言所能表達的意思，北方話能照樣地並比較簡煉地表達了出來，不是比較進步的具體證明嗎？我過去曾引《史記·項羽本紀》中的“拔劍撞而破之”這句話為例，說這句話翻譯成泰興話就是“拔出劍來撞 πY 破 Y 它”；在使成式中，前後兩個成分是並列的，“撞而破之”的“而”，固然是個明證，泰興方言中兩個成分之間的一個音段，也是一個明證。我因此堅決地認為使成式中包含兩個成分，不應該看成一个單位。我不但反對把“撞破”當做“複合動詞”，也反對某些人把“破”看成是“撞”的“後附加語”或“結果補語”。其實“複合動詞”的說法是應該接受的，這不但在北方話里使成式中的兩個成分已凝合成一個單位，在泰興方言中有些使成式也凝合成一個單位了。語言在這樣不斷地發展，我們對於語法的研究，對於語法現象的分析，是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的。不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把現代語法和古代語法混淆起來，或甚至想把現代語法拉回到古代語法的圈子里去，都是違反客觀的語言實際的，因而也就是不科學的。

啓 事

(1) 本刊近來所收來信來稿常有把姓名和住址寫得很潦草的，或是漏寫了住址，以致我們無法處理。希望讀者作者以後要特別注意把姓名和通信處的字迹寫清楚。

(2) 本期因版面擁擠，“書刊評介”暫停。

本刊編輯部

試論漢語單句復句的區分標準

劉世儒

漢語中有沒有單句復句的區別呢？當然是有的。那麼憑什麼標準來區分它們呢？大家的意見可就不一致了。有人認為語音的停頓與否是可以作為區分的標準來考慮的，這可以呂叔湘先生、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為代表。^①呂先生認為下面兩個例子是“幾個動詞聯合起來做謂語”的單句：

從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不干一點正經。（呂例，77頁，下同）

新開張的百貨公司真熱鬧，數不清的人進進出出。

然而，“倘若中間有停頓，那就也可以把它當作複合句看待了”。又如下面兩個例子，認為是含有“複雜謂語”的單句：

他走過去開門。（呂例73頁，下同）

你喝一口尝尝。

然而，“只要當中有個停頓，就可以算是複合句”了：

他走過去，把門開開。

你喝一口，尝尝味道兒怎麼樣。

語法小組說：“要是並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後頭，中間有停頓，也算是複合句。”例如：‘吳天寶人小，膽量可大。’要是並列的謂語都在主語後頭，而又沒有停頓，那就不必說是複合句了。例如：‘張先生胆大心細。’”（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由此可見，幾位先生都是主張憑語音來建立漢語單、復句的區分標準的。這個標準能不能成立呢？依我看，是頗難成立的。怎見得呢？第一是理論上有矛盾。比如：

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正義，愛和平。

愛祖國，愛人民，愛正義，愛和平，是應該的。

憑什麼說前一句是複合句而後一句却是單句呢？憑語音么？語音是一樣的。憑連詞么？連詞是都沒有的。憑成分么？成分不足為憑的。因為成分不同只是單句內部的構造問題，和複合句是壓根兒就不相干的。那麼憑什麼呢？顯然地，難以自圓其說了。第二是實踐上有困難。首先是太活動，難掌握。比如：

他活動，利落，準確。（呂例，76頁）

這本書內容豐富，文章也生動。（呂例，71頁）

按照語音停頓與否的說法，這該歸入複合句了；然而呂先生卻又認為第一句是“聯合成分”作“表語”，第二句是“句子形式做表語”，又劃歸單句了。這就使人莫名其妙了。其次是太神秘，難理解。比較：

從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

從前，他們一天到晚吃，喝，逛……

按照呂先生的意見，第一句是“幾個動詞聯合起來作謂語”的，是單句；而第二句因為“中間有停頓”，所以就該“把它當作複合句看待”。這就更使人糊塗了：果真這兩句僅僅因為頓（、）、逗（，）不同，就可以把它們一個判歸單句，一個判歸複合句么？恐怕未必吧？由此可見，“語音停頓說”，或者“頓、逗異用說”，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都是有缺欠的，要想依靠它來把漢語中的單句復句區分開來，顯然是難於辦到的了。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據我個人考慮的結果，要想把漢語中的單句復句區分得開，區分的干淨而又利落，簡潔而又一貫，我以為除了採用“成分劃定法”外就別無良法。因為句子本來就是結構學（синтаксис）中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單句和複合句之間的區別”又“在於結構上的不同”。^②要探討單句復句的本質區別所在，咱們就不能不從句子的組織結構——“成分的劃定”入手，舍此不談，而空談語音，這就未免是舍本逐末了。

什麼叫“成分劃定法”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明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單句和複句在構造上的區別：單句是由主語、謂語、賓語、足語（就是俄語中的“名詞謂語”）、定語、狀語等等成分構造成的；而複句則是以句子為單位，由幾個小句子（一般叫分句）構造成的。這也就是說，“複合句的構造材料既不是詞（слово），也不是詞組

① 前者見《語法學習》，據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以下正文引証，凡注有“呂”的，都見此。后者見《語法講話》，據《中國語文》，1953年5、6月號；以下正文引証凡註有“小組”的，都見此。

② 參看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俄語語法》第二編第一冊莫斯科俄文版，6頁，又99頁。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而是簡單句(прост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①單句和復句的本質特征的差異,我以為,主要就在於此。根據這個本質特征差異的事實,咱們就有可能把單、復句划分開了。怎樣划分呢?就是:凡包有幾個語言單位,其中有一個或幾個能夠被划定為另一個語言單位的成分的,這種語言單位就是單句;反過來說,凡不能被划定為另一個語言單位的成分,而只能各以句子資格互相联接起來的,這種語言單位就是復句。例如“時間長不要緊”,這是單句。因為“時間長”本身雖也是個句子,但它可以被划定為這個較大的語言單位的成分(主語),所以就不能作為復句看待了。但是如果把這句話改說成“就是時間長,我也要堅持”,這就是復句了。因為其中的任何一個語言單位都不能被划定為另外一個語言單位的成分,所以就不能作為單句看待了。我所說的“成分划定法”,大體說就是如此。

要補充說明的是:句子既然是語法·邏輯範疇中的單位,我所說的“成分划定法”當然也就不能脫離邏輯。的確如此,句法關係的更深邃的基礎是邏輯關係。句法分析,如果脫離了這個基礎,說句過激的話,那確實是一切規律都是無從談起的!略舉幾例為証:

這是木頭,火車要開了。

凡人皆有死,我是學生,所以這是黑板。

儘管幾個句子排列到一起了,不怕有的中間還用上了作為表示句和句联接筋絡的連詞,但也終歸還是一堆‘烏合之眾’的句子,不能就作為“複合句”看待的,因為它們之間並不存有任何邏輯上的關係啊!

尤其是那些形式相似然而實質不同的句子,在辨認它們的單、復句的類屬上,邏輯關係的考慮,就更顯得重要:

他告訴我,他不喜歡你[這樣的]話。(簡單句,包孕的)

他告訴我,[可是]他不告訴你。(複合句,轉折的)

如果不看邏輯,不管意思,單從形式上看,這兩個句子,那就只好混為一談了!所以說,分析句子必須從語法·邏輯範疇出發:“成分划定法”當然也是不可能例外的!

標準有了。剩下的問題是怎樣運用這個標準來解決在漢語單句復句區分問題上一向討論未決的問題。現在就按照這個標準逐項討論如下:

一 關於包孕句的歸類問題 包孕句該歸單句呢,還是復句?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標準,前邊已經說過,它當然是應該歸入單句的。因為其中的小句子可以被划定為另一個語言單位的成分。早期的語法書(可拿嚴復的《英文漢詁》作代表②),差不多都是把這類句型歸入復句的。但是中西語言組織不同,強作比附,終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請比較下邊的兩個俄語、英語的例子就可以完全明白的:

Я знаю, что он болен.

我知道[?]他病了。

I know that he was sick

我知道[?]他(是)病了。

漢語中的包孕句,在它的母句和子句接榫之處,是根本沒有這類“連詞(союзы)”或“關聯詞(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如 что, that 之類的。既然如此,咱們也就不必強作比附了。③

包孕句有時是可以擴展得很繁復的,例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咱們兩國人民才能相親相愛,什麼時候那種愚昧的罪惡的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言論才會終止,什麼時候咱們才會像兄弟一樣重新見面”。如果把包孕句都斷然歸入簡單句,那麼碰到這樣繁復的句型又該怎麼辦?好辦,都“斷然”歸入“簡單句”就是了。須知所謂“簡單句”和“複合句”,原本都是語法學中的專用術語,它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學科上的涵義,和一般常識上所說的“簡單”和“複雜”的概念是不便混為一談的。

二 關於在副位的名詞句的歸類問題 包孕句應該歸入單句,想來大家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把下邊的句型也歸入包孕句,恐怕就要引起爭論了④:

① 同上頁注②, 99 頁。

② 他說“以大包小,故曰包孕”,“合省、包孕皆為繁句”,參看《英文漢詁》159—160 頁。

③ 誠然,在英語也有可以不用這種“連詞”或“關聯詞”的,那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接觸句(Contact-clauses)”如:“I know he is happy”“I saw he was tired.”然而這究竟還是不用,不是不能用,所以和漢語的情況比較起來,還是不能並為一談的。

④ 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國語法理論》(112 頁)就不是這樣處理的。王先生認為,只有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或“次品句子形式”的句子才可以算單句,至於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的句子就只能歸入複合句了。他的主要理由是“末品句子形式”可以有語音的停頓,而首品、次品的句子形式則不能有。如“我們不知道張先生來”不能念作“我們不知道,張先生來”,“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門”,不能念成“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門”。這個說法是頗難成立的,首先,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的,不一定就不能“有語音的停頓”,如“我相信,他是一個官僚主義者”。其次,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的也不一定就都能夠有“語音的停頓”,如“凡尼亞自作主張地作了一件大事”,要是就念成“凡尼亞自作主張,地作了一件大事”,顯然也是通不過的。這就可見“語音停頓”說的不足為憑了。

他因为天下雨不来了。

他为了穷人翻身牺牲了。

我们应该像园丁培养花草一样来爱护我们的青年。

他对于妇女下地工作有意见。

我之所以毅然决然把它归入包孕句而不把它归入复合句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所包孕的子句都可以用名詞来重指，和名詞構成同位的关系。例如：

他因为天下雨这么一点小事就不来了。

他对于妇女下地工作这件事有意见。

这就证明其中的小句子还是作为單句的成分而存在的。如果咱们不便于把名詞在副位的句子（如“他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不来了”和“他对于这件事有意见”）都塞入复合句的话，那么咱们有什么理由把这种包孕着用名詞重指或可能用名詞重指的名詞句的句子判归复合句呢？

不错，这类句型中的名詞句，是可以提置句首，破坏“被包孕”的形态的，如“因为天下雨，他不来了”和“对于妇女下地工作，他有意见”。然而这似乎也不能就作为不承认这还是包孕句的理由。因为这样提前并没有能够使它所固有的句法組織上的本质特点起有什么变化。就是说它仍然可以得到名詞的重指而被划定为句中的成分，如“因为天下雨这么一点小事，他就不来了”（他例准此，不备列）。如果咱们不便于把“因为他，我挨了一顿骂”和“对于这件事，他有意见”这样的句型也都塞入复合句的话，那么咱们就决没有理由把这类提置句首的包孕句型也都混入复合句。在别的地方，我曾经试着用語序的不同来作为划分單句、复句的标准（即在主語后謂語前的算包孕句，在句首的算复合句）^①，现在觉得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又把它统统归入包孕句即單句了。

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把小句子提置句首的句型，也都归入包孕句了，那么像下边的句型，是否也都可以援例呢？

如果天下雨，他就不来了。

即使天下雨，他也还是要来的！

这又不然。我以为，不但提置句首的不能援例，就是嵌入句中的也同样是不能援例的：

他如果天下雨就不来了。

他即使天下雨也还是要来的！

什么道理呢？简单得很，道理就在于它不能用名詞重指，不能被划定为單句的任何一种成分！

三 关于复成分句型的归类问题 这是一个历来就有争论，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大致说，对于这种句型的处理，可得三派意见：a)一律归复句；b)一律归單句；c)部分归复句，部分归單句，看情形办。主张第一说的可以严复氏的《英文汉诂》为代表。^②他认为像下边的句型：

澗溪沼沚之毛，苹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傳）

这就是中文中的所谓“节省句法”（Contracted sentence；严氏列为“合沓句”之一种）。照他的说法，这句“以西文言之”，初步可析为“平列八句”（样句：“澗溪沼沚之毛，可荐于鬼神”），进一步还可以分成“三十二句”（样句：“澗之毛，可荐于鬼神”），以至“六十四句”（样句：“澗之毛，可荐于鬼”）。说句笑话：这哪儿是讲语法，简直是八八六十四卦了！这种说法的不妥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讨论。下边说第三派的意见。这一派可以吕叔湘先生和语法小组诸位先生为代表。他们的理论在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不必重复。这个办法之所以行不通，主要就表现在“理论上矛盾”，“实践上有困难”，这些我们在前边也已经有过讨论，也就不必重复了。

第二派的意见，就是《中国语法教材》的意见。^③我以为这个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和划分單句复句的标准——“成分划定法”是正相吻合的。为了使所讨论的问题更具体化一些，请再系统地列举一批例句：

（甲）复主語：教师們和同學們都很喜欢他。（教材 53 頁，下同）

（乙）复宾語：我爱这山水和庄田。（頁 184）

（丙）复足語（表語）：鋪上躺着的是怀孕的妇人和兩三个月的嬰兒。（235 頁）

（丁）复定語：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366 頁）

（戊）复狀語：你沈默而倔强地工作着。（563 頁）

（己）复謂語：旅客都又餓又渴。（123 頁） 人很端庄和严肃。（125 頁） 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正義，愛和平。（小組

① 参看《中国语法教材》第三册，454 頁。

② 参看《英文汉诂》161—162 頁。

③ 参看該書 53, 123, 183, 273, 363, 563 頁。

例① 金桂是个女劳动英雄,一冬天征集卖煤,成天打娘家門口过来过去,几时想进去看看,就进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当成件稀罕的事。(吕例 77 頁)②

如果咱們承認(己)項以上各項例句,都可以归入單句(事实上現在大家也都是承認了的),那么为什么独独到了(己)項就要提条件(比如有無語音頓啦,是頓还是逗啦,等等),不給通过呢?这就未免太不公道的了。

在(己)項中还有“倒接的复謂語”,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标准,不用說,它們当然也都是應該归入帶有“复謂語”的簡單句的。如:

听了伯父的話,我难过了好几天。(教材 68 頁)

正如語法小組諸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主語管几个謂語,有的在主語前头”的。既然承認是“一个主語”管着“几个謂語”,那就沒有理由再把它們“一律算是复合句”了。

四 关于連环句的归类問題 这兒所說的“連环句”是指的下边的一些語言事实:

中尉叫他走过来。

他选老品作代表。

把这些句型归入簡單句,想来大家可以同意。問題是在于下边的一些句型:

皇宮前面有一道門,是專給皇帝走的。(教材 30 頁)

前边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馬爬不上去。(302 頁)

这种句型該归入單句呢,还是复句?按照“成分划定法”,当然是應該划归單句的。因为它在类型上一般說还是属于所謂“連环句”的。我的理由是:

a) 外動詞“有”有認定性,它所帶的賓語常需要再有足語来补充,这就正合于这种句型的造句条件:

我有孩子牽累着。

我有几个朋友就死在那里。

b) “連环句”中間如果有語音的停頓,大都是在賓語之后:

我爱他,能写会算肯劳动。(今歌詞)

这类句型的語音停頓处,也恰在这里(例子已見上),这就可見它們是應該同型处理的了。

c) 所以,如果咱們承認 a) b) 兩項所列例句都可以列为連环句——單句,那么咱們就沒有理由不承認像上边所举的那兩個賓語后有語音停頓的例句也該归入連环句——單句了。

有人說,这类句子其实該归入后附的定語部門中去处理的。(以第一句为例,就是“皇宮前面有一道是專門給皇帝走的門”的意思③),这种說法是否正确,这兒可不討論,但有一点却是說对了的,那就是他終归还是把它划归單句了。

五 关于狀語移前句型的归类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明确另外一个問題:即單句中的狀語是否也可以移前到句首?試比較:

我明天进城去。 明天我进城去。

絕大多數的語法研究者(包括語法小組諸位先生在内)都認為,特別是時間詞作狀語的时候,是可以移到句首的。④既然如此,那么像下边的一些句型,究竟該归入單句还是复句自然也就不难类推而解决了:

在祥子眼里,曹先生必是孔聖人。(小組例,6 月号,下同)

对于車座兒,他絕對不客气。

然而語法小組諸位先生却把这类句型都归入“复合句”了,就是所謂“偏句作正句的修飾語”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a) 既然承認“明天我进城去”可以是狀語高踞句首的簡單句,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承認“在昨天,他去找你来着”这句话也是狀語在句首,而又認作复合句中的偏句了呢? b) 如果說,“明天”可以回到句中,所以可以証明它还是狀語,那么正如語法小組諸位先生所指出的一样,像上边的那兩個例子又何尝不能返回句中呢? c) 如果說,“对于車座兒,他絕對不客气”,“对于”吃紧,去不掉,所以該划归为偏句,那么“他对于車座兒絕對不客气”,

① 小組諸位先生認為这是“复合句”。解釋道:“这个复合句由四个分句組成,主語全是他們,不过后头三句沒有把主語明白說出来”。

② 呂先生認為这也是个“复合句”,就是“由主語相同的几个分句組成”,但“主語通常只在第一分句里出現”。

③ 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207 頁。王先生叫“次品补語”,但說:“本节里所討論的次品补語,就是后置的次品”,这就實質上等于說是后置的定語了。

④ 語法小組諸位先生認為只時間詞可以这样处理,“地位詞”还是應該按語序划成分的。參看《中国語文》1952 年 11 月号。这种說法是否正确,这兒也不討論,但不管怎样,总还是單句的成分,这在單复句的划分上不發生問題,也就不必深究了。

“对于”也同样吃紧，去不掉的，这又该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字眼，还有不吃紧，可以去掉的，如“(在)路上，他問了我好多話”，“(在)昨天，他来找你来着”，这又该怎么办？如果說有“在”的，就是复合句的偏句，沒“在”的就是狀語在句首的簡單句(按照小組的意見，空間詞还可以作主語，那么它的下文就是个“主謂結構”作謂語的)，这未免有些說不过去吧？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好理解的了。

由此可見，这种說法是难以成立的。——这就需要“成分划定法”来解决问题了。这些前置句首的名詞(或代名詞)，不管它前边有無介詞，只要它在語法·邏輯上能够被划定为句中的成分——狀語(或主語，看情形办)，那它所屬的句子当然就是个單句了。不必怀疑，狀語除可以移前到句首外，它有时为了修辞上的需要，还可以挪到句尾的，这当然还是單句内部的構造問題，和移前到句首的一样，也当然是不能把它划归复合句的，如“他坐在那里，靜靜地”(521頁)，“我們根本不配有家眷，在我們还没有能力养活他們的时候”(499頁)，“他从前也是庄稼人，跟你的祖父一样”(505頁)。

六 关于定語挪后句型的归类問題 現代漢語的定語，一般常見的，总是擱在中心詞的前边；但有时为了修辞上的需要，也可以排在中心詞的后头，如“他提着一个籃子，空的”。这类帶有后附的定語的句型不應該归入复合句是显而易見的，不必討論。問題是出在当后附的定語复杂化了的时候。看下列：

藍色的天上飄着一塊一塊的浮雲，像紅綢子。(382頁)

她一次生下三个孩子，都很健壯。(377頁)

这就是来生老汉的小女子，名叫小娥的。(383頁)

他做了一首長詩，題目叫哀郢。(383頁)

靠左岸的一帶是沙灘，水很淺。(384頁)

这是否也应该划归簡單句呢？是的，應該划归簡單句。因为按照“成分划定法”的标准，这些后附的东西，是都可以划定为單句中的一个成分——即定語的；既然可以作为單句的定語(特别是那些还帶有定語信号“的”的)，当然就不該划归复合句了。不消說，这后附的定語也是必須和它的中心詞在邏輯上能够搭得攏的。否則尽管形式上很近似，但終究还是不能并为一談的。因为我們已經一再指出过，句子本是邏輯·語法范疇中的單位，不管邏輯关系，只看語法形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門口栓着条大花狗，望見姚長庚和郑超人，跳起来汪汪直叫。”語法小組認為这是个复合句，“第一分句的賓語‘大花狗’，兼后头两个分句的主語”。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只“兼”的說法还須商討)。因为把“大花狗”后边的东西也說成定語，那在邏輯上显然是說不通的。諸如此类的句子之所以應該划归复合句，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結合着邏輯范疇的“成分划定法”，在划分單、复句上理所当然的結果。

值得提醒的是那些帶有更加复杂化了的后附定語的簡單句：

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清目秀，身材天嬌，輕裘宝帶，美服华冠。(教材385頁，下同)

就在这群学生中間，出現了一个新学生：明朗的面孔，和善的眼光，瘦長的身材，穿着一身青大布的短褲褂。

照我們在前边第(一)項所說的道理看，既然帶有那样繁复的“賓語”、“足語”的句子还可以在語法上划定为簡單句，这兒的例子当然也就可以照例办理，就一点也沒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了。

总起来說，漢語的單句复句是客觀地存在着的，是可以划分得开的；結合着邏輯范疇的“成分划定法”，就是漢語划分單句复句必須通过的一条康庄大道。其他标准頂多只能作为輔助手段，不能系統地、全面地解决问题。

(1957, 1, 24。)

(接49頁)

的存在不是在句子里消灭，而是在句子里更清楚地呈现出这个独立的存在的特性。(11月号33頁右欄)——这两句話真象蹩脚的譯文，即使“团結、孤独、焦躁”都加上引号，也实在难懂。

6.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动作一般这个性質，这个动作一般的性質是从每个指具体的动作的詞抽象出的。(12月号40頁左欄)——“动作一般的这个性質”不易理解，似乎應該改成“这个动作的一般的性質”或者“动作的这个一般的性質”。

上面是比較突出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隨便改动成語的，如把“漠不相关”写成“渺不相关”(11月号27頁)，“約定俗成”写成“約定成俗”(12月号39頁)；也有不應該省略的地方却省略了的，如“鳥在屋子里飞”略成“鳥在屋子飞”

(12月号42頁)，“各种各样”略成“各种样”，——这些都是和漢語的规范不相容的。文中有这样多的不通語句，虽然作者应負主要責任，但是編輯同志也不能辞其咎。希望《中国語文》的編者和作者今后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編者按] 譚永祥同志举做例証的《詞类的区分和辨認》这篇文章，因为作者事前表明不同意删改，所以除《詩經》“君子来朝，言觀其旂”一例的出处誤注“魚藻”改为“采芣”(9月号14頁左欄)以外，編輯部全未改动。但是这个声明并不意味着經過編輯部修改过的文章都是沒有語病的；相反的，別的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合规范的詞句，說明本刊編輯部对于来稿文字加工不够周到，我們承認編輯工作中的这个缺点，并决定努力改进。

語 法 范 疇(上)

——語言學講話之三——

彭楚南

1 語 法

語言是社會現象，它沒有階級性，它的發展不是通過爆發的方式進行的，這些原理都是我們所熟悉的。為了更好地深入地瞭解語言的本質，應該對語言的各個具體方面先作比較全面的探討。因此這裡就從語音①、語法和詞彙三個方面談起。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語義是內容。語言的基本單位——詞既有語音的一方面，也有語義的一方面。語音的一方面由語音學來研究。語義的一方面由語法學和語義學來研究。詞的語義方面又可以大致分為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兩部分，而後者才是語法學研究的對象。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的區分，正像“實詞”和“虛詞”的區分一樣，並沒有絕對嚴格的界限。如果拿它們的兩極來比較，差別仍舊是容易覺察的。因此，我們可以對語法意義進行研究。

什麼是詞這個問題是語言學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這裡暫時不打算討論。用到它的時候，可以作常識上的理解。舉例的時候，盡量舉那些在是詞非詞的問題上沒有什麼爭論的例子。

詞的語義方面反映客觀事物和它們的相互關係。詞彙意義是客觀事物的抽象化。比方“人”這個詞把人這種客觀事物區別於一切非“人”的客觀事物，而把“人”的共同點概括起來。詞彙意義在這方面是抽象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把詞的語義方面再加以抽象化，正象詞彙意義把客觀事物抽象化一樣。這樣得到的抽象意義就是語法意義。比方“人們”“學生們”“同志們”三個詞的詞彙意義雖然不同，但是它們也有共同之點，就是都有“們”這一形式，並且都有“不止一個”的共同附加意義，這就是語法意義。在詞彙意義上說，這三個詞是不同的。在語法意義上說，它們有共同之點，而詞彙意義的差別是不關重要的。相反的，“學生們”和“學生”這兩個形式，在詞彙意義上是相同的，在語法意義上却是不同的。在這一方面，語法意義比詞彙意義更加抽象，詞彙意義比起語法意義就顯得具體多了。

語法學就是從各个方面研究語法意義的學問。意義不能離開語音，因此語法學就結合語音來研究語法意義。語音跟語法意義的結合是語法形式。因此語法學是一種形式的學問。

2 語法意義和詞彙意義

語言是時間上的信號系統，它的最小單位——音素只能一個聯着一個從嘴里說出來，象一條綫或鍊條一樣。沒有兩個音素能夠同時佔據同一剎那的時間。因此，語言具有綫條性。

語言是由詞組成的，這句話只對了一半。因為不是先有了詞才有語言。至少不能說，人們先認識了詞才認識語言。這個道理很容易了解，現在搞漢語的文字改革，詞和非詞的問題就可以說明。

除了詞以外，語言里還有比它更小的單位，是比較容易辨認出來的，那就是由一個或幾個音素（正確些說是音位）構成的最小的語義單位——詞素。詞素是一種歷史範疇，跟語言的一切部分一樣在歷史發展中會發生變化。詞素是某種語言中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在不同地方出現的具有相同或相近語義方面的一組相同或相近的音位。說是“某一階段”而不是“全部時期”，這一點對於漢語或某些語言十分重要，因為漢字的詞源作用往往在詞素的分析上把人引導到錯誤的境地。正是由於有了漢字，給漢語詞素的辨認增加許多困難，一種語言越是沒有歷史記錄，詞素的辨認越是容易。

人們常常不是從比較語言的片斷去尋找詞素，而是從某一組音位有沒有意義去辨認詞素，這是不恰當的。比方英語里的外來詞 nankeen（南京棉布）和 orang-utang（猩猩），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盡管在漢語有“南”和“京”，在馬來語有“人”和“森林”的意義，有時還用了短劃分開，但是其中任何一個在英語里從來不單獨出現在別的地方，因此 nankeen 和 orang-utang 都只能算是詞素，不能再分割。

人們也常常把詞素分為兩類：代表詞彙意義的叫做“詞根”，代表語法意義的叫做“附加成分”（affix）。比方俄語 книга-a，книг 是詞根，是詞彙意義“書”的担当者，-a 是後加成分，是語法意義的担当者，它同時表示

① 在《中國語文》上面連載過羅常培、王均先生的內容豐富的《語音學講話》，這個講話已經以《普通語音學綱要》的書名出版單行本。為了節約篇幅，騰出更多的地位來談談其他問題，在這裡就暫時不刊登語音學部分。讀者如果沒有閱讀過《語音學講話》，可以先拿來讀一讀。

“陰性、單數、主格”三種語法意義。這種傳統的區分方法只能適用於一定的範圍，不能適用於一切情況。

象漢語這樣的語言，假如一個詞沒有附加成分，難道就只有詞彙意義而沒有語法意義嗎？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話，很可能要得出漢語沒有語法或者語法很貧乏的結論。西方的一些語言學家正是從這種傳統的區分方法出發而得出一些不全面的結論。事實上，沒有語法的語言是不存在的。上面一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那麼，象“書”這樣一個詞，它的語法意義究竟躲在哪儿呢？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現在先談談各種語言都適用的一條普遍的定律，稱為語言現象分配不平衡律：如果某一現象在A語言中占主導地位，在B語言中它可能占不顯著的地位，甚至作為例外而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這一定律可以用演繹法證明：世界上語言的類型很不相同，正是因為各種現象在不同的語言里所占的比重不相同。如果各種現象在各種語言里都是同樣顯著，就不會有許多類型上的差異了。

利用這一定律，一種語言的特殊現象對另一種語言的一般現象的解釋可以有啟發作用，相反地，一種語言的一般現象對另一種語言的特殊現象的解釋也可以有啟發作用。比方，我們可以从俄語的特殊現象中找到漢語“書”這樣一個詞的語法意義是用什麼來做物質外殼的這樣一種一般現象的解釋。

請比較俄語的變格：

	單數	複數
(主格)	книг-а	книг-и
(屬格)	книг-и	книг

複數屬格的形式 книг 恰好沒有附加成分。книг 肯定是一個光禿禿的詞根。它的詞彙意義“書”由這四個音位表達出來，是毫無疑問的。人們也都承認它還有“複數、陰性、屬格”三個語法意義。但是它們用什麼語音外殼來表達呢？古印度語言學家創造了“零形態”的說法，把問題勉強對付過去了。零形態的意思，就是說雖然這個詞的這個形式沒有象同一個詞的其他形式所具有的那種附加成分，但是在對比之下，它的幾種語法意義就都顯露出來了。

這種解釋還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語法意義躲到哪儿去了？語音外殼象房子，“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各自造一所房子住，當然很好。在特定的情況下，“語法意義”沒有另造房子（沒有附加成分），是否可以跟“詞彙意義”共住一所房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兩個意義擠在一個詞素里是完全可能的，這在上面的例子里已經說明了：同是一個-a，同時具有“陰性、單數、主格”三個語法意義。換句話說，三個語法意義共住一所“房

子”。因此，漢語的“書”這個語音外殼除了詞彙意義外，還可以包含它的語法意義在內，雖然一時還沒有找出語法意義是什麼。這種現象在漢語占主導的顯著的地位，而在俄語則作為例外或不顯著的現象出現。俄語的例外幫助人們了解漢語的一般。可是，語法意義不論多少，可以擠在一塊兒，語法意義和詞彙意義性質究竟有所不同，不一定能“住在一起”。因此上面的論証還不夠充分。為了更充分地說明這個問題，最好是先列舉事實，事實搞清楚了，道理也就不說自明了。

語法意義是比詞彙意義更抽象的。我們

3 語法範疇 我們还可以把这些够抽象的語法意義再加以抽象化，就是說，歸歸類。比方說，把表示復數的語法意義和表示單數的語法意義歸在一起，因為它們有共通之處。我們管它叫做數目範疇，這是一種語法範疇。其他的語法範疇有：性別範疇，人稱範疇，時制範疇，格位範疇，語態範疇等等。詞類也是語法範疇的一種。

各種語言的語法範疇並不是一樣的。有些語言有某種範疇而另一些語言沒有。有些範疇是兩種語言所共有，但是在A語言是用綜合的形式（就是說用詞形變化的形式）表示出來，而在B語言却用分析的形式（就是說，用兩個以上的詞的形式共同地）表示出來。也有兼用綜合和分析兩種形式的。用分析形式表示出來的語法範疇可以稱為准語法範疇，因為在形式上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功能上（就是說在語法意義上）卻是一樣的。在上面所說的“零形態”的情況下（比方“書”），語法意義的歸類也應該算是語法範疇。

語法範疇成立的條件是什麼呢？是詞形變化嗎？詞形變化常常跟語法範疇聯繫在一起。但是它不是本質的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語法意義的對立。

沒有複數就不會有單數，沒有陰性也就不能有陽性，只有一個格等於沒有格。可見，語法意義的對立是必要的條件，沒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法意義的對立，就談不上語法範疇。

其次，一般應該有詞形變化作為標志。有詞形變化的語法範疇是穩定的、顯性的語法範疇。但是也往往有一些語法範疇沒有明顯的固定的詞形變化，這是不穩定的、隱性的語法範疇。

現在把各種語言的一些語法範疇分別介紹如下。由於篇幅的關係，只能着重談談頭幾個範疇，后面的就要談得簡略些。

客觀事物有數量可言，反映在語言里就可以有數目範疇。恩格斯說，“數目及形體的概念，完全是由現實世界中得來的”^① 數目範疇首先是名詞尤其是實物名詞所具

① 《反杜林論》，34頁。

有。形容詞和冠詞(作为名詞的屬性)、部分的代詞(作为名詞的代替者)也可以有它。動詞的動作者也有數量可言,这也反映在動詞的數目範疇上。

(A) 名詞的數目範疇有下列几种对立形式。

a 單數和复數的对立是比較普通的一种。

語言	詞彙意义	單數	复數	語法手段①
阿拉伯語	(書)	kitab	kutub	元音屈折
維吾爾語	(馬)	at	atlar	后加成分
摩如語②	(男孩)	ngágà	ngàgà	声調
俄語	(人)	человек	люди	补充法
富尔貝語③	(人)	pulo	fulbe	前后屈折

b 單數、双數和复數的对立,存在于印欧基础語(保留在梵語、希臘語、古斯拉夫語、南斯拉夫的斯洛溫語等)、南島語系的一些語言以及其他語言里。在印欧諸語言,它先后消失着,尚存的也是走的下坡路。

語言 詞彙意义 單數 双數 复數 語法手段
梵語 (船) nauḥ nāvau nāvah 屈折
在單、双、复數对立的条件下,复數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东西,而排除兩個的东西。在單、复數对立的条件下,复數还包括兩個的东西。双數可以指各种事物,但是最常用到的是成双成对的东西,尤其是身体上的器官:双手、双脚、双耳、双眼等。

汉语的“倆”有發展成为名詞或代詞双數接尾部的可能,不过这一过程还正在开始。

c 也有一种不計量数和复數的对立。不計量数形式的名詞沒有数的限制,前面可以加任何数目詞。复數形式的名詞排斥“一个”的意义,并且前面往往不能加数目詞。这种对立是不完全的,可以从下面两个比較表中看出来。

英語				汉语			
1	2	3	...	1	2	3	...
book	books				學生們		
	(書)			学	生		

汉语、日本語、朝鮮語、馬來語等都有这种範疇。在一些語言里,这种範疇限于指人名詞或有生物名詞(比方北美洲的秀安[Siouan]語)。

語言	詞彙意义	不計量数	复數	語法手段
汉语		学生	學生們	后加成分
馬來語	(人)	orang	orang-orang	重迭
爱努語④	(脚)	kema	ukema	前加成分

馬來語 tiga orang (三个人)不用复數的情况跟汉语是一样的。

d 作为單、双、复數不完全对立的例子:

語言	詞彙意义	單	双	复	語法手段
爱斯基摩語 (格陵蘭)	(眼睛)	isse	issik	issit	屈折

其中單用 issik 表示兩只眼睛,用了数目字“二”,就可以不用双數而用复數。

e 除了“單數”“双數”“复數”的对立外,还有一种表示“个别”和“集体”“多种”或“各种各样”对立的範疇。比方,下列概念的差別:

1. 書: 書籍	2. 鳥: 鳥類	3. 紙: 紙張
繩: 繩索	魚: 魚類	馬: 馬匹

在汉语是用詞彙手段表达出来的(2、3比1虛化程度大些),在馬來語却用形态手段表达,構成“多种”範疇:

个别型	多种型 (重迭和中加)	
orang	orang-orang	人們, 各种人
anak	anak-anak	各种年龄的兒童
burung	burung-burung	鳥類
tali	temali	繩索
kitab	kitab-mengkitab	書籍

“多种”範疇跟复數并不相同,虽然它往往包含复數的意义,并且有时可以相通(馬來語)。

f 也有一、二兩個数跟复數(三以上)对立的例子,不过只發現在量詞中,請看下面(F)。

(B) 形容詞的數目範疇跟名詞差不多。有时候在形容詞比在名詞要少些。比方汉语指人名詞有數目範疇而形容詞沒有。

威宁石門坎苗語形容詞有数目:

單數	复數
黑漆漆的 tɕʰilintɕie	tɕʰilintɕulintɕie
(省声調)	(中加及重迭 li)

(C) 代詞的數目範疇是最普遍的一种,它跟人称範疇結合得很緊密。

a 第一、二、三人称的單复數的对立。汉语指人名詞的接尾部“們”跟代詞接尾部“們”有不同的意义,后者是單、复數对立的接尾部。代詞的數目範疇往往用补充法構成,但也有用其他手段構成的:

語言	單	复	語法手段
滿洲語	bi 我	be 我們	元音屈折
連都語	nì 你	ní 你們	声調
祖魯語⑤	mina 我	t'ina 我們	輔音屈折

① 下面举例都采取这一格式。这里着重在語法意义的对立,所以不打算列举各种不同的語法手段構成的語法形式。不过,举的例子也選擇有代表性的或对汉藏語言研究有特殊意义的。例詞的其他語法意义(如性別、格位等)在沒有必要时都未加說明。

② Moru, 非洲苏丹畿內亞語系。見 Tucker, «West Sudanic languages». 下引的这些語言也見同書: Lendu, Logo 等。

③ Fulbe, 西非洲大西洋語系。

④ J. Batchelor: «An Ainu-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1938, 东京。又金田一京助: «アイヌ語», 載在研究社《世界語言概說》下卷。

⑤ Zulu, 非洲, 班圖語系。

b 代詞的數目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人称(說話者)嚴格地說不可能有複數,第二人称(听话者)的複數也可能包括第三人称(非說話者又是非听话者)。假如用1,2,3代表第一、二、三人称的個別的人,那么,各人称的複數可以有下列可能:

單	雙	複
1	1+2, 1+3	1+2+2..., 1+2+3..., 1+3+3...
2	2+2, 2+3	2+2+2..., 2+2+3..., 2+3+3...
3	3+3	3+3+3...

第三人称的意义是單純的。第一、二人称的複數意义就不一样。有些語言在第一人称複數(甚至雙數)再区分這兩組:

	雙	複
A	1+2	1+2+2... 1+2+3...
B	1+3	1+3+3...

A組包括2,称为包括式(inclusive),B組排除2,称为排除式(exclusive)。例如(排除式往往跟單數有形式上的联系而包括式沒有):

	我	我們(排除式)	咱們(包括式)
廈門方言	gua	guan	lan
客家方言(大埔)	gai	gaiteu	enteu
彝語①	ga-i	ga	a ₁ sz ₁

在北美洲梅諾米尼(Menomini)語,代詞的形式有系統地很具体地指出所代替的是誰:ke-包括2,ne-排除2,we-排除1和2。

kenah	2	kena?	1+2	kenua?	2+2
nenah	1	nenah?	1+3	—	—
wenah	3	—	—	wenua?	3+3

c 單、雙、複數對立的例子:

	我	我倆(排)	咱倆(包)	我們(排)	咱們(包)
散塔里語②	iñ	liñ	lan	lä	bon

d 南島語系美拉尼西亞語族安納圖(Annaton)島的語言還有單、雙、仨和複數的對立。

	單數	雙數	仨數	複數
ainjak	1	aijumrau	1+3	aijuntai
		akaijau	1+2	akataij
aiek	2	aijaurau	2+2	aijautaij
aien	3	arau	3+3	ahtaij
			3+3+3	ara

e 疑問代詞由於沒有肯定所問的東西是什麼,有多少,所以一般沒有數目範疇,但是:

彝語(什麼) amI(單數) amImI(複數)。

(D) 冠詞的數目範疇

冠詞在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語言里是獨立的詞。一般分為定冠詞和不定冠詞兩種。前者多是

指示代詞(如英語 that)弱化而成,后者則是數目字“一”弱化而成。德語的冠詞像名詞一樣,有性別、數目、格位等範疇,而且複雜錯綜,造成學習上的相對困難:雖然有16個語法形式,事實上只有六個不同的詞形,因此有兩個詞形 der 和 die 的意义多到各有四個,其他每個詞形也各有兩個意义。

德語(定冠詞)	單數	複數
	(陽性) (陰性) (中性)	(陽陰中)
主格	der (1) die (5) das (6)	die (5)
屬格	des (2) der (1) des (2)	der (1)
與格	dem (3) der (1) dem (3)	den (4)
對格	den (4) die (5) das (6)	die (5)

有些語言名詞(全部或部分)沒有數目,數目的職能由冠詞負擔,比方:

	單	複
法語③	le[lə], la[la], l'	les[le]
夏威夷語	ka	na

(E) 動詞的數目範疇一般是間接的,它不是指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多少,而是由於動作者有數量,因而反映到動詞中。因此它往往跟人称結合在一起。

	單	複
英語(說)	says [sez]	say [sej] (第三人称)
(唱)	sings	sing (第三人称)
俄語(讀)	читаю	читает (第一人称)
愛努語(進去)	ahun	ahup 收尾輔音屈折

由於名詞有雙數,所以動詞也隨着有雙數和複數的分別:

	單	雙	複
梵語(我生長)	rohāmi	rohāthaḥ	rohāmaḥ

動詞的“直接的”數目範疇應該是指動作本身的重複,這種意义被包括在各種“體”里。

跟一般的動詞的數目不同,有些語言的動詞表示出賓語(不是主語)的數目:

愛努語	ande(他放東西[單數]在一邊)
	amke(他放東西[複數]在一邊)
	shuwe(他煮[一種]東西)
	shuke(他煮[多種]東西)

這種意义也往往被包括在“體”里。

(F) 量詞的數目 威寧石門坎苗語的量詞(即類別詞)有單數和複數的區別:

① 馬學良:《撒尼彝語研究》,1951。

② Santali, 捫達語系,見《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③ 法語名詞在寫法上還区分單複數。有若干名詞也還保留了語言上的單複數。如 l'œil[lœ:j]和 les yeux[lezjø] (眼睛)。

(單)tai³ (復)tai³ 声調

这个量詞是指动物、抽象事物、長形实心的無生物用的。

彝語除了許多个别的量詞外，还有一个相当于汉语“个”的普通量詞，这个量詞有“一和二”跟“三和以上”的对立范畴，后者又有“指人”“指物”的对立范畴，列表如下：

	1, 2	3 和以上
人	ma-]	ʒu-]
物		ɿ-]

人們認識極端复杂的客觀事物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把它們归类。比方把客觀事物分为有生命的、沒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可以再分为陽性的和陰性的，也可以分为有理智的人类和無理智的动物。还可以把事物分为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事物。也可以从形狀上分为大的、小的、圓的、方的、長的、短的、扁的、細的、粗的，等等，也可以从性質上分为强的、弱的、美丽的、丑惡的、可爱的、可憎的，等等。这种語法的分类称为类别范畴，在許多語言里往往用特别的形式巩固下来。在另外一些語言里，虽然沒有特殊形式，但是这些类别还是存在的。

(A) 有生物和無生物是客觀存在的类别，它同样可以表現在語法里。比方俄語陽性名詞的对格，有生物同屬格，無生物同主格。又如西班牙語：

La madre ama a la hija. 母亲爱女兒。

La madre ama la flor. 母亲爱花。

有生物 hija 前面用 a，無生物 flor 前面不用 a (la 是定冠詞)。

(B) 有理智無理智的區別，或者是人类跟其他动物的區別也是很明显的：汉语指人名詞一般可以加“們”，动物虽然有生命，也不能加“們”，这种區別跟上面(A)項不同。高加索的阿巴札(Abaza)語①名詞分为社会-主动(有理智的)和社会-被动(無理智的)兩类。这种區別也表現在数詞及其他詞类中。

	有理智	無理智
阿巴札語 (一)	за-джвы	за-кIы
(二)	гIв-ыджь	гIв-ба
(三)	х-гIвы	х-на
(六)	ц-гIвы	ц-ба
(百)	швкI-гIвы	швкI-ы
(十)	зъкь-гIвы	зкъ-ы

(C) 高加索諸語言的語法类别，从兩类到八类不等。比方拉克語②分五类：

(1) 男人和拟人化后成为男人的东西：人，兄弟，

父亲，神，天使。

(2) 以前包括女人，現在只剩下少数几个：母亲，女人，老婆婆。

(3) 动物(包括鳥类、爬虫、魚类、昆虫)和大部分無生物，还有許多女人名称。比方，头，眼睛，姊妹，海，路。

(4) 各种东西，人手制做的各种物件，抽象名詞：牙齿，手，耳朵，銀子，錢，馬鞍，成就，夜。

(5) 只有一个名詞 кьатта(屋子)。

它們跟動詞的一致关系表現在動詞“是”上面：

	單數	復數
第一类用	ур	бур
第二类用	дур	бур
第三类用	бур	бур
第四类用	дур	дур
第五类用	бур	дур

显然，这五类的区分是以“是”字开头輔音單复数的五种不同結構为依据的：O/б, д/б, б/б, д/д, б/д。形容詞、数詞、代詞等也跟着区分成五种类别。

巴次比語③有八种类别，它們的标志是：в/б(男人)，й/д(女人)，й/й, б/б, д/д, б/д, б/й, д/й。例如：

о	се	в-акхуй	в-ашō	в-а
他	我的	大	兄弟	是
оби	се	б-акхуй	в-ажар	б-а
他們	我的	大	兄弟們	是
о	се	й-аккхуй	й-ашō	й-а
他	我的	大	姊妹	是
оби	се	д-аккхуй	й-ажар	д-а
他們	我的	大	姊妹們	是。

(D) 班圖諸語言的类别，从十几种到二十三种不等。現在举魯干达語④的主要几个类别的前加成分來說明：

單	復	意义
omu-	aba-	生物，人类
omu-	emi-	生物，植物
eri-	ama-	石头，船等
eki-	ebi-	無生物，花，乡村等
en-	en-	动物，鳥类，針，鼓等
olu-	en-	長的薄的东西(条，張)如桥，紙，頭髮，街道，日子。
olu-	ezi-	高的瘦的人，長的东西

① «Русско-абази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莫斯科 1956。

② Л. И. Жирков: «Лакский язык», 莫斯科, 1955。

③ Ю. Д. Дешерев: «Бацбийский язык», 莫斯科, 1958。

④ «A Luganda grammar», E. O. Ashton 等, 1945. 倫敦。

otu-	很小的东西,水滴
aka- abu-	小的东西,不愉快的东西和感觉,危险
oku- ama-	耳朵和腿(只有两个名词)
ogu- aga-	巨人,笨拙的人
ogu- en-	巨大的东西,笨拙的东西

这些类别贯穿到整个句子里,比方:

Abawala bano balimye bulungi, naye bali bagayaavu.

女孩子们 这些 耕种 好 但是那些 懒惰

(这些女孩子庄稼活做得好,但是那边那些很懒惰。)

这种类别范畴跟高加索各语言的类别范畴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在数目上多一些罢了。

曼德语(Mande, 非洲)①有可转让(alienable)的和非转让(inalienable)的两种类别,比方财产、房屋、儿女、妻子等属于可转让类,而身体各部分、父母、丈夫等属于非转让类,比方丈夫说“我的妻子”是 na musu (na[我的]属于可转让类),而妻子说“我的丈夫” n kai (n[我的]属于非转让类)。这一事实对语言研究很有启发,因为这是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对语言的直接影响。

非洲苏丹畿内亚语系的语言用声调作为区分语法类别的手段:

	大类	小类
艾威语(Ewe)	弯的 gòbà	góbá
	短而粗的 bòlì	bólí

类别范畴是非洲语言中最普遍的语法范畴之一,许多非洲语言都有一些看起来很离奇的类别。

(E) 吉伯克(Giliak)②语的类别范畴表现在数词和名词的一致上。比方数词“一”(词根 n-) 至少有 下列这些形式:

语法意义	名词
nex 长的, 条	棍、树、植物、草、路、山脉、小河、针等。
nik 大的, 圆的	牙齿、斧头、蛋、拳头、星星、钱等。
naqr 大的, 圆的, 月亮, 太阳, 河流, 石头, 湖, 屋等。	
不定的形式	
nrax 薄的, 平的	烟叶, 纸, 皮, 席等。
nen 动物, 昆虫	鸟, 鱼, 虫, 蝇, 生物等。
nin 人, 神	
nvasq 成双的	眼睛, 耳朵, 手, 脚, 足印, 鞋等。
nim 只	船
net 块	板
nir	雪橇
niu	网目
nerqe	鱼网的线
nvor	鱼网
nla	棒, 杖, 木槌
neo	网
nfat	捕鱼工具
nlaɟ	绳织物

navr	地方
na	度(两手伸开的长度)
nma	指(拇指和尾指伸开的长度)
niiɬ	熊脂的厚度
nar 束	鱼干
nraq 束	鲑鱼
nxuvi	狗食

(F) 汉藏语言的类别范畴。比班图语在数目上更多的类别范畴可以在汉藏语言里找到, 这里的类别范畴的一致关系跟吉伯克语一样限于类别词(量词)和名词。比方现代汉语名词有一百多类, 名词本身没有特殊的标志, 分类完全由类别词(量词)决定。举例如下:

条	细长的东西: 绳子、规则
张	薄而平的东西: 纸、饼、桌子
位	指人, 有敬意: 先生、长官
把	用具有柄可拿的: 刀子、扇子、椅子
粒	小而近似圆的: 米、珍珠
顶	帽子
匹	马、驢
头	牛

象这样的类别词在汉语里有一百几十个, 其中有些还保存相当完整的词彙意义(如度量衡单位)。有几个是更抽象、更概括的:

个	指人、用具、小动物等, 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只	动物、用具, 也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种	抽象名词

这种类别词把名词分为若干类。一个名词也可以兼属几类, 比方: 一个人, 一种人; 一双鞋, 一只鞋; 有些名词只能属于一类: 一匹马, 一头牛。兼属几类的可以这样解释: 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从一般的角度看, 我们说“一个人”, “一个样子”; 从种类的角度看, 我们说“一种人是好人, 一种人是坏人”。

为了说明汉语的类别范畴是名词固有的范畴, 可以从历史上观察, 也可以和其他语言比较着来观察。古汉语只有不多的类别词: 如“一介臣”、“一簞食”、“一瓢饮”, 而一般情况少用: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类别词是中古汉语以后大量发展起来的。在东干语里, 又逐渐减少, “个”特别常用而越来越概括。③ 方言跟北京话的类别词不完全一样, 比方客家话“一只人”, 北京话“一个人”。跟汉藏语系的语言比较也容易看出:

僮语 tu² 用在“狗、老虎、鸡、鸟”前面, 相当于汉语的“只”, 但是它也用在“牛”的前面, 而汉语用“一头”

① «Народы африки», 莫斯科, 1955.

② 在庫頁島, «Языки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第三册, 莫斯科 1931.

③ A. A. 卡里莫夫: «现代东干语的計算詞、計算詞尾和数量单位的语法特征», 见《中国语文》, 40期。

nat(面)	指人物
mari(头)	动物、牲畜
čaro(柄)	有柄可以拿的
kil(册)	書
al(粒)	米
mo(塊)	豆腐

普通	壯美	小	
tai ⁵	tu ⁵	ta ⁵	元音屈折
lai ¹	lu ¹	la ¹	

苗語形容詞也区分这三类(詞中附加):

游玩用	tɕo˥˥	(一轉, 一過)
打 用	pa˥˥	(一下)
鞭打用	sa˥˥	(一下)

tɕap'ɤ 火把 tɕapɕt'ipɤ 一把火把
 lep'e 手 lep'et'ip'e 或 let'ip'e 一只手

甚么尖尖上天？	甚么圓圓上天？
甚么尖尖在水邊？	甚么圓圓在水邊？
甚么尖尖街上賣？	甚么圓圓街上賣？
甚么尖尖姑娘前？	甚么圓圓姑娘前？
宝塔尖尖上天，	太陽圓圓上天，
菱角尖尖在水邊，	荷葉圓圓在水邊，
粽子尖尖街上賣，	燒餅圓圓街上賣，
花針兒尖尖姑娘前。	鏡子圓圓姑娘前。
甚么方方上天？	甚么弯弯上天？
甚么方方在水邊？	甚么弯弯在水邊？
甚么方方街上賣？	甚么弯弯街上賣？
甚么方方姑娘前？	甚么弯弯姑娘前？
風箏方方上天，	月亮弯弯上天，
絲綢方方在水邊，	白藕弯弯在水邊，
豆腐方方街上賣，	黃瓜弯弯街上賣，
手巾方方姑娘前。	木梳弯弯姑娘前。

	天上 t	水邊 s	街上賣 j	姑娘前 g
尖 i	宝塔 tip	菱角 sik	粽子 jie	花針 giz
圓 o	太陽 tox	荷葉 soh	燒餅 jow	鏡子 gov
方 a	風箏 taf	絲網 sar	豆腐 jad	手巾 gan
彎 u	月亮 tul	白藕 sub	黃瓜 juq	木梳 gum

中 国 語 文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討論

关于社会方言

·高名凱·

年来我曾收到一些讀者的信，对我在《普通語言学》里所談的“社会方言”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我願意在这里就我所了解的，对某些有关“社会方言”的問題，做个补充的說明。

一 “社会方言”与“社会習慣語”

“社会方言”是新近从俄語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翻譯成漢語的一个普通語言学术語。因为是一个新的概念，大家对它还没有共同的一致認識。有人依照李立三同志把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俄語原文“классовые” диалекты 譯为“‘階級’習慣語”的办法，把俄語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譯成“社会習慣語”。我却把它譯成“社会方言”。这并不是因为我要标新立异，而是經過再三的考虑而做出的決定。应当指出，把这个術語譯成漢語，确是不容易的。無論把它譯成“社会習慣語”或是“社会方言”，都不是很理想的办法，但在沒有得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却宁可采用“社会方言”，而不采用“社会習慣語”。为什么呢？“社会習慣語”不能表示原文的意义，因为一切的語言現象，在某种意义上說，都是一种社会習慣，全民的語言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習慣，因此，把語言支派之一，并且是永远不能發展成語言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說成“社会習慣語”，是不恰当的。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中的 диалект 久已譯成漢語的“方言”。“方言”是一般人拿来指明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的，不但一般漢人口里所說的“方言”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歐洲人一般嘴里所說的 dialect, диалект, 等也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問題，“方言”这个術語本身的含义就需要有新的了解。方言固然与地理条件有关，但它却不是自然現象，本質上不受地理条件的決定，它是一种社会現象。所以不宜依照傳統的想法，把方言看成簡單的地方性的語言形式，我們不能过分強調“方”的“地方”的意义，因为光是“地方”并不能产生方言，方言是社会在各地的分化而使語言分化的一种現象。不过，在分化的过程中，在某个历史时期里，地理条件曾經起过外因的作用罢了。在歐洲的語言学术

語里，dialect, диалект 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詞其实都是希臘語 dialectos（意思指的也是“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的后身，因此，一般歐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內，也把 dialect 等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然而随着語言学理論的發展，歐洲的語言学家們多数已不再強調这种語言形式的地理特性，而注意这种語言形式的社会本質，特別注意“方言”是語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的特点。希臘語的 dialectos 是由詞根 di-（意思就是“二”，“分为二，分化，由一变成二”等）組成的，dialect 等等之所以能够指明“方言”，正因为“方言”是語言分化出来的支派。所以，歐洲各語言的術語 dialect 等等本来就指的是“語言的分化”，并不一定要指“地方”，只因为古代的人只看到語言在地区上的分化，所以只把这些詞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今天，在我們了解方言的社会本質的时候，我們似乎不必只把“方言”看做是“地方之言”，虽然我們沿用了古漢語的一个詞“方言”。就是拿漢語的習慣來說，“方”也不見得只有“地方”的意义，它还有“方面”的意思，我們無妨把“方言”理解为語言在不同方面（包括地方方面和社会集團方面）的支派。“方言”正是我們用来翻譯歐洲語言学术語 dialect 的，而我們对“方言”的理解也应当随着語言学理論的發展而有所改变，也应当随着国际語言学家們对“方言”这个概念的新的了解而有新的看法，因此，我們不必把它看做非指“地方性的語言形式”不可。我們查了一下斯大林和一般苏联語言学家对 диалект 这个術語的用法，就知道，和漢語的“方言”相对应的 диалект，在他們的著作里，既可以指“地方方言”，又可以指“社会方言”。диалект 或“方言”所指的既然主要是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那末，無論是表現在地区上的語言的支派，或由于社会之分化为各种集團而产生的語言支派，就都可以被称为“方言”了。事实上，斯大林就在他的著作里既用过 диалекты местные（“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又用过 “классовые диалекты”，如果 диалект 这个詞只指“地方性的語言形式”，那末，斯大林也就不可能在这个詞的前后加上修辭語 местные（地方）和 классовые（階級）了。其他的苏联語言学家，如契科巴瓦^①和列弗瑪茨

^① А. С. Чикобав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1952, Москва, 61 及 67 頁。

基^①等也是同样的情形。

正因为語言学家們只把“方言”(或 диалект) 看成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所以,苏联的学者們往往要把“方言”加以分类。比方說,阿布拉摩維奇就在他的《文艺学引論》里有这末一段話說:

Средствам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лужат порою и диалектизмы, т. е. слова, не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в общена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а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или для жителей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местности, или дл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тех или и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групп, или для людей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профессий.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ироды и характера диалектизмов они подразделяются на провинциализмы, жаргонизмы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ы. ②

这里虽然講的是方言詞彙,但作者却把方言詞彙分为三类,省区(即地方)方言詞彙,隱語詞彙和行業語詞彙。可知,диалект(或“方言”)这个术语指的不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形式”,它还兼指社会集团的語言形式(即我們所說的“社会方言”)。說句实話,我之所以决定要把俄語的социа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ы譯成“社会方言”,正是我翻譯阿布拉摩維奇这一段話时,感到困难的緣故。диалект既可以分为几类,地方方言既只是диалект之一種,我們就不能够依照一般人的意見,只把диалект理解为“地方性的語言形式”。如果我說,方言有三种,一是方言,二是社会習慣語,三是行業語,邏輯学家們一定要批評我不合邏輯。比較合理的办法,是把“方言”看成国际学术术语之一,要用新的理解来解釋“方言”这个术语的含义,要随着国际語言学的用法,把“方言”看成語言所分化出来的支派,包括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兩者(社会方言內还可以再分为階級方言、隱語等,地方方言內还可以再分为土話、次土話等)。

有的人說,俄語的 диалект 可以包含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兩個意思,漢語的“方言”可不能,因为漢語的習慣,“方言”只指“地方之言”。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也不尽然。契科巴瓦在他的《語言学概論》里就有这样一句話說:“分布在頗大的地区上的語言分为各种方言或者地方話…这就是地域方言。”(В Язык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ённом 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ыделяются диалекты, или наречия… Это диалект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③ 這句話就反映了一种情形,在科学上所說的地区方言(即地方方言),一般人称之为“方言”。事实上,在苏联各語言学家的著作里,有的时候也有只用“方言”这个詞去代替“地方方言”或“地区方言”的,我們可以从上下文里看出它的确切的意义。但是說到“社会方言”时,苏联的語言学家却从

来也沒有只說“方言”的,因为“社会方言”是一个新的术语,而在沒有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區別时,只說“方言”也不至于引起誤会(这本来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意义)。苏联語言学家們所以把方言分为兩大类(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这是新近的發展,代表苏联語言学的新的趋势。詞的意义本来是会改变的,对詞所指明的事物的了解起了变化,詞义就会随着演变。我們对“方言”的理解既然有所改变,而和国际的科学工作也有必要取得一致的步驟,那末,我們要是依照苏联的情形,在漢語里創造出一个新的詞“社会方言”,来和国际語言学的术语相一致,为什么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呢?我認这不但不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正可以使我們对“方言”的含义有个正确的科学的認識。

这是我所以不用“社会習慣語”,而用“社会方言”的原因。④

二 社会方言有哪些种类

关于这个問題,大家的意見并不一致。但是,如果我們能够了解社会方言的特点,这問題是不难解决的。什么是社会方言呢?語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这种分化有兩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許多地方性的組合而产生的地方方言(或地区方言,或地域方言),一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許多集团而产生的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这客观的基础就是社会之分化为各种集团,社会方言就是为这些集团服务的。社会方言是个总的名称,凡是由于社会之分化为集团而产生的語言分化或語言支派,都可以叫做社会方言。但是各集团的組合,性質并不一样,組成社会集团的人們,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随着不同性質的集团,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就产生了不同性質的社会方言。从这个角度来看問題,社会方言就可以分为行業語、階級方言、老人語、青年語、男人語、女人語、国际杂湊語等。

行業是以职业的特点来組成集团的,每一个行業都可能有个行業語,行業語是为这一行業的集团服务的。比方說,我国各行業都有其特殊的行業語。⑤

①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1955, Москва, 336 及 390 頁。

② Г. Л. Абрамович: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129 頁。

③ А. С. Чикобав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61 頁。

④ 我在所起草的《語言学引論教学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里,根据大家的意見,应用“社会習慣語”这个术语。但我个人的意見,仍認为“社会方言”是更合适的。

⑤ 这里所举的行業語的实例是解放前的情形。

絲綢業：絲——為為 細絲——為上好兒 買上——
為板兒 孔絲繩——郎頭 招主顧——打路頭——汪
提——二——堂兒 主人——點王兒 客人——蓋各兒 伙
計——二點兒 說話——中山 罵——馬途 笑——迷花
哭——苦水笑 銅錢——內空 包絲袋——祖宗

南貨業：綫粉——攪把 豆腐皮——白衣 白糖——
滿口 砂糖——泉水 黑棗——黑皺皮 荔枝——絳紗丸
木耳——云頭 水笋——羊角 榛子——小鉄丸 梅干——
窮秀才 蜜棗——琥珀 瓜子——小相公 葵子——水火生

猪肉業：豬——長耳公 豬頭——愛字 豬耳——順
風 豬腦——白球 豬眼——千里燈 豬爪——荷花苞
骨——掌頭

理髮業：修面——光盤子 修眉——排八字 修鬚
鬚——沙額子 扒耳朵——板井 快——千些 慢——漂
些 吃飯——見山 吃肉——老天 剃刀——青子 面
盆——月亮 鏡子——過相 假髮——冒頭絲

行業語的範圍很廣，因為行業只是勞動崗位的具
體表現，所以一切由於勞動崗位的不同所產生的社會
方言都可以叫做行業語。就是在這樣的了解下，我認為
特殊事務部門，如醫師、律師、學生、教師等集團的社
會方言（如果有社會方言的產生的話），都屬於行業語，
甚至於科學術語也屬於行業語。

有的人認為科學術語不能算是行業語，因為它是
全民語詞彙的來源之一。這種看法是不恰當的。任何
社會方言的詞彙成員都可能成為全民共同語的詞彙來
源，包括具有秘密性的隱語在內。科學術語有它的特
點，和一般的行業語不同，它是最精確的，這是不成問
題的，但這也只能說明科學術語是一種特殊的行業語，
並不說明它不是行業語。要知道，從事於各不同科學
部門工作的人事實上就是拿這種工作來作為他的行業
的，我們今天把“科學工作”也稱為“業務”，正反映了這
個情況。當然，某些科學術語會變成“人所共知”的，會
變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在科學發達的國家里，某
些科學術語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但這只是全民共同語
詞彙成員的來源問題，並不能因此而否認科學術語是
行業語。全民共同語可以吸收某些科學術語，作為它
的詞彙成員，正如它可以吸收方言，甚至於外語的詞彙
成員，作為自己的詞彙成員一樣，都是自然的現象，但
這只是說這些被全民共同語所吸收的詞已經變成了全
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這並不是說每一科學部門沒有
它所特有的一些特殊的術語，不是全民共同語所有的
術語。事實很明显，任何一個民族共同語的詞典都並
沒有把一切的科學術語都收在內。為什麼呢？因為許
多特殊的科學術語並不是全體人民所了解的，並不是
全體人民所運用的，並不是全體人民都需要知道的。
有的人因為要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因此就認
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科學大眾化了，科學術語必然會
是全體人民大眾所知道的，因此，科學術語不能算是行

業語。這種說法的用意是好的，但不能解決問題。在
社會主義國家里，科學一方面成為大眾化，另一方面也
將要更加發展，更加精細的分工，而科學術語也將無
限制的日益增多；一般的科學術語無疑地將要變成全民
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但新的科學術語仍將不斷地產生，
其中有更多的科學術語，將仍然成為科學家所特有的
行業語的詞彙成員。一般科學術語之大量地變成全民
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和特殊的科學術語之大量地增多，
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反映。我們沒有理由認為
只有一般科學術語的大眾化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性的具體表現。其實，全民共同語詞彙成員的特點就
在於它的全民性，社會方言詞彙成員的特點就在於它
的非全民性，只要科學術語變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
員時，它就失去了它的術語性，而成為全民共同語的
詞彙成員。我們有許多例子，可以讓我們了解這一事
實。比方說，電流、生物、維他命、發動機、速度、蒸汽、
音波、無線電等原先都是科學術語，現在都變成了漢族
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大家已經不再把它看成嚴格的科
學術語了。“后台老板”原先只是戲劇界的行業語，“要
把戲”原先是元朝在江湖上賣技的人的行業語，現在都
變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然而，這些情形都不
足以說明行業語並不存在，因為各行業都還有其不為
全民所了解的特殊的詞彙成員，而且會隨著工作的需
要而增加這些詞彙成員的數目。

階級或階層又是一種社會集團，因此就有一種不
同於行業語的社會方言，這種社會方言也正是斯大林
所說的“階級方言”。①有的人因為斯大林否認階級語
言的存在，就以為“階級方言”不存在。這是一種誤會。
我們雖然沒有階級語言，却有階級方言。階級也是一
種社會集團，並且是階級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的社會集
團，因此，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方言的存在是自然的現
象。封建社會的某些貴族集團有其特殊的階級方言，
這是誰也知道的事實，就是農民階級、工人階級也未始
沒有自己的社會方言，不過各不同地方的農民階級或
工人階級、各行各業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能有不
同的階級方言罷了。階級方言和行業語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階級方言是以階級為單位的，同一階級所形成的
集團，為着自己的利益，可以有自己的階級方言，尽管
不同的階級可以在同一個行業里服務。某一地方的同
一個行業，例如旅館業里，一切從事於這個行業的人，
不論是旅館主人或是旅館伙計，他們都了解同樣的行

① 有人說在“方言”上加上“階級”，這就是主張語言有
階級性，這就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然而斯大林却正好在方
言(диалект)上加上“階級”(классовые)，難道斯大林也想
主張語言有階級性，對於這個原則性錯誤也有明知故犯的意思嗎？

業語，都懂得“尺八”指的是“床”，“天牌”指的是“棉被”，“头架”指的是“枕头”，但是，旅館主人之間却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用語，不是旅館伙計所了解的，而旅館伙計之間也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用語，不是旅館主人所了解的。有的人因为看了斯大林的下面一段話：

但是人們，个別的社会集团，个別的階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的詞彙，特殊的術語，特殊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并且仇視人民的有产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別厉害。^①

就以为只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份子有階級方言，农民、工人等就沒有階級方言，并且認為有階級方言就是脫離人民，仇視人民的。这完全是对斯大林的話的誤解。这里，斯大林只說有产階級上層，如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份子表現得特別厉害，并不是說只有他們設法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可見，“任何个別的社会集团，任何个別的階級都不是对語言漠不关心的”，都会“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斯大林所說的“脫離人民，并且仇視人民”只是一个形容“有产階級上層，如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份子”的修飾語，他並沒有說利用語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人就是“脫離人民，仇視人民”的人。事实很明显，我国的無产階級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能不运用階級方言，但是我們当然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我国的無产階級是脫離人民，仇視人民的。問題在于，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份子的利益是“脫離人民，仇視人民”的具体表現，而無产階級的利益是和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的。階級方言只为階級服务，服务的結果是否与人民有利，要看这階級本身到底是什么階級。

此外，如男人語和女人語，老人語和青年語也都是社会方言之一種，但既不与行業語相等，也不与階級方言相同，因為它們是以性別和年齡来做为組成社会集团的根据的，不是以行業或階級地位来做为組成社会集团的根据的。国际杂湊語是国际港口居民所說的一種社会方言，这些居民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他們經常和各国商人来往，于是，就拿各語言的成分杂湊起来，来構成自己的社会方言。

以上是从組成社会集团的人們的社会地位来給社会方言加以分类的。此外，我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原則来把社会方言加以分类，即依照社会方言的公开性和秘密性来加以分类的。根据这个原則，社会方言可以分为兩種：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隱語。一般的社会方言虽然有許多本集团所特殊运用的詞語，这些詞語也可能是其他集团的人所不了解的，但都不是有意讓别人不了解，別人只是因为“不在行”而不了解，只要留心他們所运用的特殊詞語或向他們學習，这些詞語也

可能为別人所了解，也可能漸漸地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隱語却不然。隱語在俄語称 жаргоны，它来自法語 jargon，jargon 原是歪曲的語言的意思，最初的 jargon 是偷兒的語言，具有秘密性，即不讓偷兒集团之外的人了解。这种 jargon 很像漢語的“黑話”。但这只是就其来源來說，并不是說現在語言学术語中的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指的必得是偷兒的語言；正如漢語的“黑話”，虽然依照其来源說，指的是“黑幫所說的話”，但在語言学术語中却不一定非指这种“語言”不可一样。偷兒的語言有兩個特点，一是它的歪曲性，一是它的秘密性。現代語言学中的術語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也指的是具有歪曲性和秘密性的語言，不过歪曲性并不是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所特有的（任何一种社会方言都可能具有歪曲性，例如鮮魚行的行業語管“魴魚”叫做“縮头”，藥行的行業語管“烏頭”叫做“天鵝眼”；煤炭業的行業語管“炭末”叫做“飞塵”，这是把“縮头”“天鵝眼”“飞塵”加以歪曲的結果），而秘密性則是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所特有的罢了。我从前根据《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中譯本把它譯成“同行語”，虽然我曾在《普通語言学》里加以說明，但是許多讀者都为“同行語”的“同行”二字迷惑了，以为它指的就是“行業語”，現在为着避免誤会起見，应把它改譯为“隱語”^②，“隱”即“秘密”之意，因为这种語言形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秘密性。

一般的說，行業語或其他社会集团所运用的社会方言，并不是秘密性的，但这并不是說在特殊的情形下，它們就不可能有隱語。一部分行業語的詞彙成員帶有隱語的性質，是不可諱言的。全民共同語里明明有“芝麻”、“棉花子”、“黃牛”、“石磨”等詞，然而油坊的行業語却把它們說成“尖口”、“絲头”、“摆老”、“大輪子”，其中的一个原因显然是要使“外人”听了“莫測高深”。这和工作的需要而把各种工具称为“小鉋”，“粗鉋”，“双把鉋”，“溝鉋”，“剝鉋”，“剗鉋”，“鉤鉋”等的木工的行業語詞彙成員并不一样，因为这些詞并不能在全民共同語里找到相应的名称，而是木工們为着工作的需要而創造出来的。甚至从事于地下工作的革命家集团也可能运用一些秘密的隱語，因为客觀的情势要求他們这样做。有的人因为 жаргоны 或 jargon 这个術語的詞源是“偷兒的語言”，就認為說學生們有隱語是侮辱了學生，因此，就認為學生們不可能有隱語，这实在是个誤会。詞源的解釋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历史所証明了的，与現在的 жаргон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人民出版社，10頁。

② 本来可以譯为“黑話”，只因为許多人看到“黑”字就緊張起来，覺得未免“太黑”了，所以就譯为“隱語”。

或 jargon 这个术语的含义并不一样，帶有秘密性也不見得就是坏事情，要看秘密的目的如何。我們現在不是还要“保密”嗎？我們可以因为不同的目的而运用不同的隱語，只要有“保密”的必要，我們都可能运用“隱語”，虽然不見得非这样不可。

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隱語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方言，有的社会集团只有一般的社会方言，有的社会集团，如洪門会等秘密社会，只有隱語；但是有的时候，我們却可以有一种混合的形式，既具有一般社会方言的特点，又具有隱語的特点。旧社会的行業語就多半有这情形，一般階級方言也多是如此，尤其是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社会方言。这也正是斯大林既認為社会方言有階級方言、同行語、客厅語等^①，又認為“階級方言”不如說是同行語^②的緣故。

有的人又以为在文艺作品中出現的詞就是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不可能是隱語。这是不了解文艺作品的語言的特殊性所引起的誤会。文艺作品的語言当然是以全民共同語为根据的，但文艺作品的語言却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超出全民共同語的范围，它可以引用一些古代詞語、方言詞語，甚至于外語的詞，隱語的詞也不例外。我們并不能因为古代詞語、方言詞語或外語的詞出現在文艺作品里就否認其为古代詞語、方言詞語或外語的詞，同样地，我們也不能因为隱語的詞出現在文艺作品里，就否認其为隱語的詞。至于隱語詞彙之采用文艺作品中的詞語，那更是平常的現象。“西瓜”、“守”、“滑”、“霸王”、“風”、“流”等都是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然而却被道士的隱語拿去指明“云鐘、笑、大、大洋銅、快、烟”等，問題在于这些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已經被歪曲去秘密地指明只有道士們所了解的意义(当然这些“秘密”也可以被人識破，好象我們現在知道这些秘密似的)。方言詞語、外語的詞之被歪曲成隱語的詞，也是常見的現象。为什么曾經出現在文艺作品里的詞就不可以被歪曲来構成隱語的詞彙成員呢？拿《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来在特殊的集团內去指明某一特殊的人物，而只有本集团內的人知道指明的是誰，为什么就不是隱語呢？

当然具有秘密性的隱語的詞也可以被別人“識破”，甚至于漸漸地变成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例如綠林好汉的隱語“嘍囉”，門房的隱語“攔駕”等都成为了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但这并不足以否認它的秘密性，因为既被“識破”，自然就不再是隱語的詞，而运用隱語的集团也就会另創其他的来替代。不过，一般的情形，由隱語的詞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沒有一般社会方言的詞那样多，那样容易地变成全民共同語的詞彙成員罢了。

三 社会方言的前途

斯大林曾經說過：“習慣語(按即階級方言)和同行語(按即隱語)只是全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語言，并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③ 這句話就使得一般人認為社会方言是沒有前途的，必定要灭亡的。其实，問題并不这样的簡單。我們已經說過，社会方言的产生有其物質的基础，它是随着社会之分为不同的集团而产生出来的。当然，社会方言在語言生活中的意义是極小的，它只为狭小的一部分人服务，但这不等于說社会方言是沒有用处的，也不等于說社会方言是要不得的东西。在社会的發展过程中，当人們还没有实行劳动分工，还没有分化成各集团的时候，社会方言是不存在的，但是只要社会起了集团上的分化，社会方言就能够为这些集团服务。斯大林不是說過“但是人們，个別的社会集团，个別的階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嗎？^④ 能够为个别集团、个别階級服务的社会方言絕不是沒有用处的东西，問題只在于它的用处是有限度的，它只能为狭小范围的个别集团內的人們、个别階級內的人們服务。斯大林之所以強調指出社会方言之类的东西的局限性，是針對着馬尔所說的“一切語言都是階級的，全民語言是虛構”这一錯誤的理論而發的；但是斯大林並沒有說社会方言是沒有用处的，是不能存在的。有人說，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方言是不健康的語言。這句話要看是如何的說法。如果認為这些階級方言並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自己的語法結構，只有極小部分的特殊詞彙，這句話就說对了。果尔，就不只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方言，一切的階級方言甚至于一切的社会方言都有这些特点。^⑤ 如果認為这些階級方言，或其他社会方言的产生是沒有根据的，因之它也就必得灭亡，這句話就說得不对了。沒有疑問，社会方言，包括階級方言在內，是先天不足的，它注定不能發展成独立的語言，它总是苟且偷生着，它不能替代全民共同語。但这不等于社会方言随时都必得灭亡，社会方言是“無根之草，無源之水”。和地方方言比，社会方言的作用当然要小得可憐；地方方言为全地区的人民大众服务，只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0頁。

② 同上，43頁。

③ 同上，11頁。

④ 同上，10頁。

⑤ 有人以为农工的階級方言是健康的，貴族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方言是不健康的，因为农工人多。这是把語言問題和階級問題混在一起的結果。农工尽管人多，他們的階級方言却并不因此而具有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也并不因此而能發展为全民族的語言。

因之，可以發展為獨立的語言，而社會方言只為狹小的社會集團服務，沒有語言特點的本質（基本詞彙，語法結構），因之也不能發展成獨立的語言。然而這並不等於說社會方言沒有生存的权利，隨時都要滅亡。任何事物的產生和滅亡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只要這原因還存在，它也就可以生存，至少可以“苟且偷生”。社會方言的產生是受社會之分化為各集團所決定的。社會方言也只能隨着這集團的滅亡而滅亡。因此，只要社會集團有一天的存在，社會方言也可能有一天的存在。

我們已經說過，社會方言可以隨着不同性質的社會集團而有不同的種類。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社會方言是否必得滅亡，我們要看一看哪一種社會集團在歷史發展的哪一個階段上會產生或滅亡的，因而斷定哪一種社會方言是會產生或滅亡的。換言之，社會方言是歷史的範疇之一，要以具體的歷史條件來斷定哪一種社會方言要在什麼時候產生或滅亡。毫無疑問，階級沒有產生之前，階級方言是不存在的，而階級滅亡之後，階級方言也將隨着滅亡。然而行業語卻不一定要和階級方言同其命運。行業語的產生並不和階級方言同時產生，各行業語言之間的產生也有先後的不同，行業語也不見得要和階級方言同時滅亡。當然，如果有某些行業，它的存在是和階級的存在有密切的關係的，那末，這種行業就會和階級的滅亡而同時滅亡，這種行業所用的行業語也要隨之而滅亡。但不見得一切行業都與階級有關，也不見得舊的行業滅亡之後就不會有新的行業產生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隨着社會生活之日益發展，日益豐富，我相信儘管在社會發展的过程中有些行業“壽終正寢”（無論是隨着有關的階級的滅亡或其他的原因而滅亡），社會的分工總是要愈來愈細的，換句話說，儘管階級方言總歸要滅亡的，儘管某些個別的行业語要滅亡的，但總的來說，行業語的種類是會愈來愈多的，雖然每一種行業語都永遠是語言的支派，永遠不能替代語言，永遠是注定不能發展成獨立的語言的。

至於隱語，也是同樣的情形。隱語的產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需要。盜賊、乞丐等集團所以要有隱語，因為他們需要秘密行動。有各種抱負的政治團體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下也可能需要隱語，因為他們正是統治者的追捕的對象，需要秘密行動。從事各行業的人在某些情況下之有隱語也正好因為在某種社會環境里，他們是“員外”、“老爺”們的欺壓對象，或與其他行業有彼此競爭的情形，需要“秘密行事”。有的人太天真了，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隱語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所以這樣的主張，一方面誤以為隱語總是不好的東西，它是“盜賊”的語言，一方面以為在社會主義國

家里，凡事無需偷偷摸摸的做。其實，正如我們所說的，“隱語”這個術語的來源儘管是“偷兒的語言”，它的現實意義卻只是帶有秘密性的社會方言。隱語之是否可以存在，要看“秘密行事”是否必要，不是看有沒有盜賊存在。我們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偷兒”，我們也可以有隱語。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然有理想的社會制度，但這不等於說我們就不需要“保密”，因為仇視社會主義的敵人還沒有滅亡，我們還需要警惕，為做壞事而運用隱語固然是我們所反對的，但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而運用隱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們今天在國際上不是還採用電報密碼嗎？我們的人民警察，為着維持國家的秩序，社會的安寧，為什麼不可以運用一些隱語呢？當然，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里，許多從前所需要的隱語將大量的消滅，許多從前需要“秘密行事”的地方，現在都不需要了。但這不等於說，一切的隱語都不能存在，人類社會是否有一天可以沒有任何秘密性的集團呢，這問題不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我也只好不回答了。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社會主義國家里還存在有一些隱語，則是無疑的。

關於“階級”習慣語、同行語 和客語“語言”

·岑麒祥·

“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語“語言”，據我理解，是階級社會中個別階級，特別是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等的特別詞語。這些特別詞語的來源是各種各樣的，但大多數是從古代語言中吸取來的，也有一些故意把詞的固有意義加以歪曲的詞和一些外來語。他們之所以使用這些特別詞語，除特殊情況外，多出于特別的趣味，或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高貴”，不同風俗。這些特別詞語因為可以反映個別階級的思想、觀念、風尚和道德原則，所以肯定是具有階級色彩的。

“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語“語言”既然有的只是一些特別詞語，即斯大林所說的“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和“拋棄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用語和辭句的特別風雅客語的用語和辭句以及一些外國詞”^①，當然不能構成一種語言，因為“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②，而任何個別階級的特別詞語中都不可能擁有它自己的與全民語言不同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第2版，11頁。

② 同上，24頁。

造，所以只能算是全民語言中的一個支派。

這些“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廳“語言”是不是不同階級的人都完全聽不懂的呢？這是一個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據我理解，“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廳“語言”並不是同一樣的东西，我們試看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常常把“習慣語”和“同行語”並列就可以知道。如果“習慣語”和“同行語”是同一樣的东西，他就應該說“習慣語或同行語”而不應該說“習慣語和同行語”，可是“習慣語和同行語”這個並列詞組在斯大林的這本著作中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①我們現在所用的“同行語”這個詞是從俄語的 жаргон，也即英語和法語的 jargon 翻譯過來的，它的特点是故意把詞的固有意義加以歪曲，使局外人不易了解。“同行語”多出於秘密的社會集團，不是有產階級所特有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有產階級集團中確有這種“同行語”，這些“同行語”當然不是別的集團的人所能了解的。但是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表示特別趣味，表示風雅客氣的詞語並不是其他的人完全不能了解的，只是聽起來有些特殊。與一般人所用的有所不同罷了。

有產階級上層分子儘管脫離人民，仇視人民，在說話的時候喜歡咬文嚼字，裝腔作勢，可是他們跟一般人民的关系是錯綜複雜的，因此他們的這些“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廳“語言”跟全民族的語言的关系也是錯綜複雜的，並且在一定的條件下會成為社會上的一種“時髦”。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會影響全民語言，不過它們的數量是如此之少，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為它們“對於統一的全民語言的發展能有嚴重的意義，它們能夠削弱全民語言的意義或改變它的性質”。^②

我在《普通語言學》^③里曾從古代文獻中舉例說，同是一個人的配偶，而天子的叫做“后”，諸侯的叫做“夫人”，大夫的叫做“孺人”，士的叫做“婦人”，庶人的叫做“妻”……“宮”本來是“室也”，《爾雅》：“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後來卻成了“天子所居之室”的專稱。這就說明上面所說的“我國從前在封建時代，一切重等級觀念，許多起居飲食極平常的事情也有了不同的稱謂”那句話，意思並不是說這些都是“階級”習慣語。因為大家都知道，全民族的語言是以人民大眾的話為基礎的，其中如“妻”，如“室”，如“死”等無論如何不是

“階級”習慣語。可是也許因為話說得不很清楚，竟至引起了鄭遠漢同志的誤會，他說我把這些詞都看作“階級”習慣語，並且認為這些詞跟“爸爸”、“爹爹”一樣都不是“階級”習慣語，“后”（皇后）絕不是皇帝“階級”（?!）才懂才用的詞，相反“妻”也不是做皇帝的做大夫的不知道的。事情可真是這樣嗎？任何人的兒子都可以叫他的父親做“爸爸”、“爹爹”，但是不是任何丈夫都可以叫他的妻子做“孺人”或“夫人”呢？並且他以“懂”、“知道”等來做鑒定“階級”習慣語的標準也不是我所能同意的。

我在那本書里還有這麼一句話：

每一個階級都可能有的習慣語和同行語，歷代許多文人或小說家往往就利用這些“階級”習慣語和同行語去顯示出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階級地位，例如《鏡花緣》里唐敖的許多說話就不是多九公所能說得出來的，《紅樓夢》里賈政等人的許多說話也不是劉姥姥所能說得出來的（72頁）。

鄭遠漢同志看不清我這裡所用的“往往”、“許多”，“能說得出來”這些字眼，隨便從《紅樓夢》里舉出劉姥姥和賈政的各一段話（其實劉姥姥的話不能叫做“階級”習慣語，賈政的話里面也不是全部都是“階級”習慣語）來加以比較，雖然也承認其中有所不同，卻認為這是由於“階級地位”（注意“階級地位”這幾個字）、文化素養及個性的不同，好像賈政等人的說話里並不會有什麼“階級”習慣語似的。最後他強調“階級”習慣語都是其他的人所不懂的，說賈政等人的說話里有“階級”習慣語就會引起整部《紅樓夢》怎樣會使人看得懂的問題，並且懷疑這樣一說就會“使人們對全民語言和階級習慣語（同行語）混淆不清，‘同行語’將泛濫起來，……變相地承認了語言是階級的，語言有階級性”，那就扯得太遠了。

以上是我對於“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和客廳“語言”的一些粗淺的看法，是否妥當，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① 斯大林在《答桑席叶夫同志》里雖曾說過“‘階級’習慣語，正確些說，應當叫做同行語”（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2頁），那只是為了表示對“階級”習慣語的憎惡，意思並不是說“階級習慣語”就是同行語。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0頁。

③ 科學出版社，1957，71—72頁。

四川省上半年將完成 32 個點方言調查

四川省方言調查指導組於3月25日在四川省教育廳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到會有省教育廳、四川大學、西南師範學院、四川師範學院的代表張秀熱、甄尚靈、劉又辛、劉念和、趙振鐸、翟時雨、梁德曼等七人。

會上各校交換了工作情況：目前西南師範學院已作出了四個調查點的調查整理，編寫了兩個點的“學習普通話手冊”初稿，本年上半年內60個點的調查可以普遍展開。四川大學正進行成都市的方言調查整理工作，並有四位同學分工調查32個點，預計本年上半年內可完成。四川師範學院目前也正在部分地區記音。

會議決定：本年內完成全省169個漢民族地區調查點的調查任務。爭取在年內着手編寫“學習普通話手冊”，至遲在1958年上半年內寫完。

會議同時要求各校指定專人負責組織方言調查辦公室，加強領導，以便能跟方言調查指導組密切聯繫。（鄧堅白）

漢語不能容納外來語嗎？

劉澤先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迫切要求學述名詞——特別是科學名詞——國際化了。這裡所說的“名詞國際化”，自然並不是什麼“全部國際化”之類的意思，而是指“適當地吸收外來語”說的。

可是也有少數同志從理論上反對這樣做，在有這種見解的同志中，陶坤同志可以作為代表人物。

一 詞彙里不能混入外來語嗎？

陶坤同志說：“斯大林同志早已指出兩種語言不可能融合。那末作為語言基礎的詞彙，又豈能如此混合呢？”①

陶同志這個理論根據至少有兩個重要的錯誤。第一，斯大林同志並沒有說過兩種語言不能融合。第二，即使語言不能融合，也不能因此推論說詞彙不能混合。

斯大林同志不但沒有說過兩種語言不能融合這類的話，而且相反，他討論過歷史上語言融合的事實。他說，“例如，俄羅斯語言便是這樣的，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與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它經常成了勝利者。”②（着重點是引者加的）

詞彙能不能混合呢？顯然是可以混合的。吸收外來語這種詞彙混合的事實大家都很熟悉。世界上無論哪種語言都從國際詞彙里借用了成批的科學名詞混在自己的詞彙里使用，這幾乎不用舉例大家也知道。甚至在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彙里也混雜着許許多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在這種語言里生了根，並且產生它自己的派生詞和固定詞組。

外來語 трактор（拖拉機）產生新詞 трактористка（女拖拉機手）、тракторостроение（拖拉機製造業）等等是俄語里的例子。外來語 ガラス（玻璃）產生新詞 ガラス商（玻璃商）、ガラス店（玻璃商店）、ガラス 罎（玻璃瓶）、ガラス 管（玻璃管）等等是日語的例子。外來語“咖啡”產生新詞“咖啡館兒”、“咖啡茶”、“咖啡糖”、“咖啡碱”、“咖啡粉”、“咖啡色兒”等等是漢語里的例子。

甚至陶同志認為已經被“淘汰”掉了的“盤尼西林”這個外來語，在幾年後的今天，仍舊沒有按照陶同志的主觀願望死去。儘管它沒有得到中國科學院的支持和推廣，可是它和“盤尼西林糖”、“盤尼西林片兒”、“盤尼西林針”、“盤尼西林水兒”、“盤尼西林油兒”等一系列的派生詞依然流行在群眾的語言里。可以肯定，這類的外來語如果中國科學院不加以排斥的話，它們會流

行得更廣泛一些。誰說漢語里不能容納它們呢？

二 “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

陶同志還說：蘇聯院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在《現代俄語》里指出：“新詞在舊詞的基礎上構成，或者分出新的詞根和新的接詞因素來構成，是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③

我推測陶同志這樣說的意思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說吸收外來語是違反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的，所以外來語吸收不得。另一方面是說，在化學家所造的那些新字的基礎上構成新的化學名詞才合於詞彙的內部發展規律。

我並沒有找陶同志引用的這理論的原文來仔細研究，因為我認為那並不重要。我深信世界上不會有什麼理論是可以證明“一種語言里不能容納外來語”的，因為任何理論都不能推翻事實。事實是，語言越發展就越要吸收外來語。

Виноградов 院士指出的這個規律有兩種解釋的可能：（1）它沒有談到外來語問題；（2）包括外來語在內。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它沒有談到外來語問題，那就跟我們的討論沒有關係了。就如同“A 是動物”並沒有談到 B 是不是動物一樣，並不能因為“A 是動物”的成立可以證明“B 也是動物”或“B 不是動物”。

如果 Виноградов 院士這理論包括外來語在內的話，我相信他所說的“舊詞”可以指外來語說。“盤尼西林”固然是“新詞”，可是當它構成派生詞的時候，它就是“舊詞”而派生詞是“新詞”了。

如果是我弄錯了，“盤尼西林”這類的詞兒不能算是“舊詞”，那末，“銻”、“釷”這類的化學新字也同樣是不能算“舊詞”的。那就是說，如果使用外來語就違反

① 陶坤：《詞彙的發展與學術名詞的制訂問題》，見 1952 年 12 月 26 日《光明日報》。這篇文章曾經在 1953 年 2 月中國科學院的“化學物質命名擴大座談會”上印發給大家。陶同志在 1956 年 5 月的“有機化合物名詞座談會”上重申過他的這些觀點。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28 頁。

③ 這是陶同志 1956 年 5 月 6 日在“有機化合物名詞座談會”上說的。

这规律的话,使用化学新字也同样违反这规律。

不管这理论怎么解释,都说明陶同志引用得不恰当,这理论跟我们的讨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至少是不能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三 语言的稳定性

陶同志还有一个理由证明名词国际化是行不通的,那就是“语言有极大的稳定性,其中最稳定的,要算音韵结构。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语音总是有限的,发音习惯也是稳定的。”^①

自然,外来语在任何语言里都常常是比较生疏的、比较难念的。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要要求群众把外来语念得跟外国人一样,只要求尽量接近就行了。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只要求群众按本国的发音习惯来对待外来语。

所以,世界上因为发音上的困难而拒绝或不能吸收外来语的例子,我们还没听说过。日语的发音比较简单,他们在外来语的发音问题上所碰到的困难要比一般别的国家多一些,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他们大量地吸收外来语。日本科学的发达跟他们大量地吸收外来语是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中国人是不是比俄国人或日本人更笨,笨到不能对付外来语的程度呢?我不知道陶同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四 中国人念不了外来语吗?

陶同志夸大地强调了外来语读音的困难,认为只要“考虑一下读音问题”就可以知道名词国际化行不通了。

他夸大读音困难的方法之一就是找一串方块字来标注外来语的读音。几年以前,他把“盐酸”写成“哈已竺若克罗里克阿西德”,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来反对名词国际化。^②最近,他又用“啊册拿佛志泥稜”注 acen-aftenilen 的音这类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不能读外来语的音。

其实,陶同志用方块字来注音并不能证明读音的困难,因为,谁都知道,方块字作为注音工具是拙笨无比的,是突出地不恰当的。用筛子舀不起水来,那是你工具选得不恰当,不能因此说水是舀不起来的。

用“汉语拼音方案”写出的外来语里有以 d、l、t、k 等结尾的或 br、dr、tr、ft 等两个辅音在一起的情形。乍一看,对于许多地区的汉人来说,好像很难念。其实,普通话里有一些带轻声字的词儿就可以看成是以辅音结尾的,例如 dad(大的)、chil(吃了)、zhangf(丈夫)等等。同样,也可以看成有两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情

形,例如 shaubre(烧不热)、shaudre(烧得热)、douftar(豆腐摊儿)等等。我们完全可以规定用这种汉语里本来就有的念法来念这些外来语,并且我们也完全应当规定这样念才是标准的念法。

个别的音,像 V,它相当注音字母的万,那也是很容易学会的。即使学不会,念近似的音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用“汉语拼音方案”写出来的外来语是取自国际词彙的,并不一定是取自某一国的。谁也不能说非得念成英语或德语那样才合乎标准。我们规定按照汉语习惯来念才是标准的。

这样的念法,连非知识分子都会念,一点儿困难都没有。而且,这样的念法,不但比日本人念外来语漂亮得多,就是比起西方各国来,也并不差!

陶同志担心汉人非先学英文念不了外来语,并且因此得出名词国际化行不通的结论来,那简直是沒有道理的。

五 汉语是可以容纳外来语的

在今天,世界上无论哪种语言里都有大量的外来语存在。这是普遍的事实。在语言学里,这叫“语言中的借用(займствования в языке)”。^③语言越发展,外来语就越多起来。包括许多近代科学新名词在内的国际词彙,是各种语言里外来语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来源。

越来越多的外来语混入各种语言里既然是事实,所以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可以证明一种语言是不能容纳外来语的。即使有这种理论,那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汉语也决不是唯一的例外。认为各种语言都可以容纳外来语,唯独汉语不能,那是沒有根据的。汉语普通话里的音韵结构非常丰富,用汉语自己的发音习惯来念外来语,可以念得非常漂亮。

事实上,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起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语,现在也还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语。许多外来语在汉语里生了根,并且繁殖了起来。遗憾的只是我们过去沒有給它們在文学上适当地安排而已。

总而言之,种种的理论和种种的事实都证明汉语是可以容纳外来语的!

① 陶坤:《从现行化学物质的命名方法谈起》,见195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

② 陶坤:《化学物质的中文命名问题》,见《科学通报》3卷6期。

③ 《语言中的借用》,彭楚南译,见《中国语文》1954年5月号。

苗文中漢語借詞的拼法問題

王輔世

1956年10月31日到11月7日在貴陽舉行的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初步通過了由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第二工作隊擬定的苗語四個方言的四個文字方案。

在方案中沒有談到漢語借詞的拼法問題。但是文字一出來，漢語借詞必定要和苗族群眾見面，漢語借詞到底應當怎樣拼寫，是應該在方案中明確規定的。所以在討論會閉幕以後，第二工作隊曾就這個問題在隊內討論過許多次，但沒有得出大家一致的看法。

有一部分同志說，漢語現在正在推廣普通話，並且擬定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為了苗族將來學習漢語漢文的方便，最好在苗文中用北京音拼寫漢語借詞。這樣，在四種方言文字中的漢語借詞詞形都一樣，也便於互相學習，又能促進將來苗文的統一。

另外一部分同志說，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數目不同，和北京話音位都有相當大的差別，最重要的是聲音的結合不同。比如說，北京話和苗語東部方言都有a和u音位，北京話a和u可以結合成復元音au，但是苗語東部方言卻不能。現在叫苗族學習苗文，同時再讀一些根本不習慣發出或不習慣結合的音，必然要造成很大的困難。如果說，各方言文字中漢語借詞拼法的一致有助於苗文將來的統一，那麼為什麼現在不創立統一苗文呢？只用一種苗文豈不是當時就統一了麼？所以要給苗族創立三種文字，改革一種文字，原因就是苗語方言差別太大，目前不能使用統一的苗文。若只創立一種苗文在全國苗區內使用，結果只有基礎方言區的苗族容易學習，非基礎方言區的苗族學習起來非常困難。既然創立了三種文字，改革了一種文字，這就說明苗語本身的詞並沒有統一。苗語的詞的形狀不統一，而光叫漢語借詞的形狀一致，到底有多大意義呢？為了使漢語借詞在各方言文字中的拼法一樣而給學習造成困難，是不是與給苗族創立三種文字、改革一種文字的意圖矛盾呢？為了學習上的方便，應當讓各方言區的苗族用自己固有的音位拼寫當地的漢語。話是常說的，音是自己語言里有的，這樣就不會在學習漢語借詞的時候加上一重負擔。

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是同時也都不能使對方信服。

主張漢語借詞用北京音拼寫的人會說：文字是要一個詞一個詞學習的，雖然學習用北京音拼寫的漢語

借詞有困難，但學會了以後，對於將來學習漢語漢文就有很大的方便。再說這種困難也不是大到不能克服的程度，總比學習漢字容易一些。也應當比英國的小孩子學習英文，法國的小孩子學習法文容易，因為在英文中一個音位往往用各種不同的字母表示，例如：[i:]音位可以用e(me)，ee(meet)，ea(meat)，i(live)，ie(thief)表示，同一個音位在哪一個具體的字里用什麼字母表示需要死記。法文也有一個音位用各種不同字母表示的，同時，詞末輔音多半不發音，例如temps，ps不發音，m表示e鼻化，並且變為後元音ɑ̃。同一個音位在哪一個具體的詞里用什麼字母表示，到底哪個詞後面的字母不發音（有時竟然是整個音節不發音，如法語動詞直陳法第三人稱多數的曲折部分-ent）都需要死記。還有一種困難是同一個字母代表許多不同的音，（如英文中的a可以代表[a:] [ʌ] [æ] [ei] [ə]等好幾個音位，法文中的e可以代表[e] [ɛ] [ə]等幾個音位，還有時不發音。）它在某個具體的詞里讀什麼音更需要死記。漢語拼音方案雖然和苗文不同，但它本身是有條理的，沒有以不同的字母表示同一音位的情形（漢語拼音方案不分尖團，若分尖團，確有以不同字母表示同一音位的情形，如“西”和“希”同音，分尖團時，則“西”寫作xi，“希”寫作hi，s和h都表示[ɕ]音），更沒有以同一字母代表許多不同的音位的情形（即便有，也是有條件的，如g、k、h後面接i或y時讀作[tɕ][tɕʰ][ɕ]），為什麼就記不住呢？

主張用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拼寫漢語借詞的人也會說：拼音文字當然比表意文字好學，但是拼音的辦法越簡單就越好學。用苗語各方言的音位拼寫當地的漢語，只要學會一套苗文的拼寫規則就行了，若用北京音拼寫漢語借詞，還得再記一套漢語拼音規則，同時有許多音是苗族所不會發出或不習慣結合的。若要勉強學，當然可以學會，不過給學習造成相當大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原是可以避免的。英文法文是有幾百年歷史的文字，現在文字的詞形是古代傳下來的，由於語音不斷變化，當然會發生用不同字母表達同一音位或用同一字母表達不同的音位的情形。苗文是新創的，在剛創立時不應當製造讀音上的混亂。為什麼我們不創立容易學習容易記憶的文字呢？正因為法文、德文、希臘文都有帶附加符號的缺點，我們才在創立苗文時沒有採用附加符號。

是的，兩方面从表面談這個問題，是難以把對方說服的。

我个人對這個問題傾向於第二種說法，也就是贊成用四種方言的音位拼寫各個方言當地的漢語。

第一，我們應當首先確定什麼是漢語借詞，什麼不是漢語借詞。在苗語各方言中很明显有許多古代漢語借詞，例如北部方言中的 $\eta u \vee su \vee$ (事情) 中的 $su \vee$ 音節就是漢語“事”字的借音， $ly \vee z'au \vee$ (楊柳) 就是漢語“柳楊”二字的借音。這樣的借音怎樣處理？我想主張用北京音拼寫漢語借詞的人也不會主張把 $su \vee$ 改作 $s \vee$ ，把 $ly \vee z'au \vee$ 改作 $liu \vee ja \vee$ ，因為這些詞已經深入民間，幾乎變成苗族自己的詞了。這些詞不能按北京話拼，那麼什麼樣的借詞才用北京話拼呢？當然可以說凡是新名詞(術語)就用北京話拼。不過新舊沒有一個尺度，是以借入的時間作標準呢，還是以意義的新舊作標準？例如“合作社”總應當算是新名詞吧，但是它是今天新名詞，到明天就不一定是新名詞了。過若干年以後就可能和 $\eta u \vee su \vee$ ， $ly \vee z'au \vee$ 一樣地深入民間。而“合作社”和 $su \vee$ ， $ly \vee z'au \vee$ 的拼寫方式是兩套，一套是北京音，一套是苗音，這恐怕不很恰當吧。苗語西部方言大量借用漢語的虛詞，如：很 $[x \vee \eta \vee]$ ，最 $[tsue \vee]$ ，雖然 $[sue \vee z \vee \eta \vee]$ ，但是 $[ta \vee \eta \vee s \vee]$ ，也借了一些雙音詞，如：世界 $[s \vee \eta \vee kai \vee]$ ，生產 $[se \vee \eta \vee ts' \vee \eta \vee]$ ，階級 $[kai \vee \eta \vee tpe \vee]$ 等等。這些詞都成了日常用語，如果按北京音拼就要把這些詞按 $x \vee \eta \vee$ ， $tsue \vee$ ， $sue \vee z \vee \eta \vee$ ， $ta \vee \eta \vee s \vee$ ， $se \vee \eta \vee ts' \vee \eta \vee$ 的標音寫成拼音文字。我們試想一個人在口語中把“世界”叫 $s \vee \eta \vee kai \vee$ 而在文字上看到的是代表 $s \vee \eta \vee tpe \vee$ 的音，需要怎樣在腦子裡轉彎，才知道兩者是一回事呢？

我覺得像苗語這樣已經含有一部分幾乎變作基本詞彙的漢語借詞的語言，在談到漢語借詞的拼法時，就不能從新借、舊借，新名詞、舊名詞上來區分而允許有兩套拼寫法存在。如果不能把舊有的借詞完全寫成北京音，那麼就不能要求把另一些所謂新名詞寫成北京音。因為新舊是相對的，今天新，明天就不新了，我們不可能今天把一個借詞拼成一個樣子，明天又改為另一個樣子。要是不改，豈不是同樣的舊借詞(在明天來看)却用着兩套拼寫辦法么？

有人舉蘇聯的例子，說蘇聯境內有些少數民族借俄語的詞時，即使俄語的音位在自己的語言中沒有，也把俄文的詞原封不動地借用。但是在蘇聯關於俄語借詞的拼法問題在語言學界中的意見並沒有完全一致。我國的少數民族和蘇聯的少數民族情況不同，尤其是西南和中南的少數民族，包括苗族在內，千百年來和漢族居住在一起，漢語對他們的語言從很早就有了影響。如果仔細研究，古借詞也可以找出時代的先後來。在

借詞問題上我們不能把解放前和解放後截然劃分為兩個時代，把解放前借的詞叫舊借詞，解放後借的詞叫新借詞，舊借詞用苗語的音位拼寫，新借詞用北京音拼寫，這樣做是機械的，是不合實際情況的。

我認為像西南、中南一帶的少數民族在音位系統上和北京話差得很多，同時又有一大批古漢語或近代漢語借詞已進入日常應用的基本詞彙中，而這些借詞是用本民族的語音模仿漢語地方話讀的，在給他們創立文字時，關於漢語借詞的處理就不能強調非用北京音拼寫不可。如果不能把已經活在人民口語中的漢語借詞改為北京音，那麼也就沒有必要把另外一些在人民口語中還沒有生根(而明日可能生根)的漢語借詞用北京音去拼寫，因為這樣做會給少數民族製造學習文字的困難。

第二，我們從苗文方案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正字法來看，也說明漢語借詞不能用北京音拼。苗文方案規定每個音節都有標聲調的字母，這是用輔音字母兼代的，居於每個音節的最後。苗語的聲調比較多，東部方言最少，還有六個聲調(用 b, v, d, g, q, x 表示，例如 $hneb$ “太陽”的最後一個字母 b 不發音，只表示聲調是高升調 4(35)，中部方言有八個聲調(用 b, v, d, g, q, x, l, f 表示)，西部方言有九個聲調(用 $b, v, d, g, q, x, l, f, w$ 表示)，北部方言有十個聲調(用 $b, v, d, g, q, x, h, l, f, w$ 表示)。有這麼多的聲調，如果不在字面上表示(即標調)，文字就很難學習。漢語拼音方案沒有表示聲調的字母，只是必要時在元音上加上 $ˊ ˋ ˋ ˋ$ 等聲調符號表示。如果苗文中的漢語借詞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北京音，那麼苗文就顯然有兩套正字法，一套是苗語的，一套是漢語的。在苗語的正字法中每個音節最後一個字母表示聲調，而在漢語的正字法中每個音節最後一個字母是韻母或是韻母的一部分。這樣在教學的時候就必須說明哪個詞是苗語的，哪個詞是漢語借詞，不但學起來麻煩，另外還給學習的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在讀書的時候隨時注意哪個詞是苗語的，要用苗語的正音法去讀，哪個詞是漢語借詞，要用漢語的正音法去讀，這就實在不勝其麻煩了。

有人說儘管漢語拼音方案不用聲調字母標調，在借入到苗語時，加上聲調符號，豈不是又和苗語的正字法不衝突，同時四種方言文字中的漢語借詞又都詞形一樣，豈不是很好嗎？這要看用什麼字母表示漢語借詞的聲調，如果用各方言自己的聲調字母，則在詞形上還是不一致，因為苗語各方言的聲調字母不是標調值的，而是按調類定的。比如說東部方言一個 b 調的字如果在中部、西部、北部各方言中也有和它同源的字，則在那三個方言文字中也標 b 調，例如東部方言的 deb (兒子)在中部、西部、北部方言中都有其同源的字，在那三

个方言的文字中分别写作 dæb, dob, dub。同是一个 b 調在調值上各方言不尽相同，它在东部方言中的調值是 435，在中部和西部方言中是 433，在北部方言中是 755。北京話陰平、陽平、上声和去声的調值是 755、435、4214、451，現在單說陰平吧，东部方言中沒有 755 調，表示 755 只能用 444，而 444 調的代表字母是 b，西部方言中有 755 調，但 755 調的代表字母是 d，如果声韵用北京音，声调用苗語各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調值标示，則同一个“中”字在东部方言中要写做 zhund，在西部方言中要写做 zhunq，所以說詞形并不一致。而且这样做与漢語的拼法也不一样，漢語的拼法沒有声調字母，即使学会了这样的漢語借詞，將來讀拼音漢文也不一定讀得慣。如果不問調值，簡單地規定陰平标 b，陽平标 v，上声标 d，去声标 g，那么由于这些声調的調值在各个方言不同，各地苗族按着他們自己的調值讀漢語借詞，管保誰也听不懂。要想解决这个問題只有單找出四个字母表示北京的声調，例如用 p 表陰平(755)，t 表陽平(35)，k 表上声(4214)，s 表去声(451)，那就是要四个方言区的苗族除去記自己語言的六个至十个声調字母以外再多記四个声調字母，而这四个声調字母有时又和自己語言的声調字母具有相同的調值，例如东部方言的 b 調的調值是 435，而又要記住 t 調的調值也是 435，其区别就在于 b 調的詞是苗語的，t 調的詞是漢語借詞，这种負担也是一般兒童以至成人所难于忍受的。

总之，漢語借詞如果标北京音，不标声調有困难，标声調更有困难。

假使漢語借詞用苗語四个方言的音位系統拼写四个方言标准音所在地的漢語，非标准音地区的人学起来当然也是有困难的，不过克服这种困难是有代价的，

因为通过漢語借詞的學習更进一步地巩固了标准音的學習。在标准音地区的人學習起来就毫無困难，例如“中”字在苗語中部方言区标准音点（凱里）的漢語中讀作 tsun 4，那就依苗語的音位系統用苗語中部方言文字方案把它写作 zunb，苗族人一讀就讀出來，也不必知道它是不是漢語借詞，因为漢語借詞和苗語是一套拼写規則。若把它依北京音用漢語拼音方案写作 zhung，就必須交代說明苗語本來沒有卷舌音 [ʈʂ]，但在北京話里有这个音位，在文字上用 zh 表示，如果自己不会發这个音，那就只好把 zh 也讀作 [ts]，也就是說 z 和 zh 都讀作 [ts]，另外還要說明 ng 是漢語借詞的輔音韵尾，相当于苗語的輔音韵尾 ŋ，所以 g 不是声調字母，但在苗字中 g 又是声調字母。我們試想，这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大的困难呢？

根据上面的兩項理由，我主張苗語各方言文字中的漢語借詞应当用各方言自己的音位系統拼写当地的漢語，才能在学习上不造成困难，否則就会使學習的人对苗文感到恐惧，直接影响苗文的推行工作。

同时我順便得出一点体会，就是凡受漢語影响深借漢詞多的少数民族語言，在处理漢語借詞时都不能直接借北京話，否則就把自己音位系統打乱。漢語借詞本身如保持系統的完整性，就等于以人为的方法改变少数民族語言。如果旧借詞用少数民族自己的音位系統拼，新借詞（假定新旧借詞还可以划分界限的話）用北京音拼，則漢語借詞本身的系統就不能保持完整。不过这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处理，至于將來普通話大力推广，各地都会讀北京音的时候，北京的音位也可能傳到少数民族的語言里去，那时問題的解决又将是另一个办法了。

广东省开展試点調查工作

广东省教育厅在 195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广东省方言調查指導小組。由教育厅副厅長罗濬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学的教授和講師等七人組成，并由教育厅罗副厅長担任組長。

指導組先后召开了兩次會議，制訂了广东全省方言普查計劃，适当进行分工，华南师范学院負責 20 个县，中山大学負責 10 个县，其余由广东省方言調查队負責。

广东省方言調查队訓練班于 1956 年 10 月中旬開課。抽調前在省語音訓練班學習过的較为优秀的小学教师 18 人脫产學習。時間三个月。課程有語音学、音韵学和方言調查法三科（另加語法專題报告三次）。分別由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中文系語言学的教授和講師担任。

訓練班結業后，經指導組第四次會議决定：全体學員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語言学教授、講師和二十多位同学，配合編成 9 組，利用寒假時間分別到汕头、澄海、兴宁、五华、韶关、乳源、順德、临高、澄迈九县进行了試点調查工作。三月初旬回广州进行总结工作。省教育厅将根据試点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制訂全面开展的工作計劃，务求在 1957 年內完成广东全省 113 县市的方言普查工作。（林运来）

语文短评

209 尼赫鲁說：“帖木兒和納迭尔沙的那些日子还在人們記憶之中，但由于英国人的範圍广大而历史悠久的新恐怖使得他們的丰功偉業黯淡無光了，…”（人民日报1957年1月3日6版）

該文的作者註說，帖木兒、納迭尔沙曾先后侵略印度，杀戮搶掠印度人民。由此可知，他們是罪惡滔天的侵略者。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尼赫鲁总理决不会把他們的侵略印度的罪行称为“丰功偉業”。如果尼赫鲁总理說的是反話，則“丰功偉業”应该用引号引出。（周恩源）

210 出席联席會議的有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常任理事池田正之輔，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村田省藏，日中輸出入協會理事長南乡三郎等三个团体的代表。（人民日报1957年2月4日6版）

“等”前面是三个帶有修飾語（团体名称）的人名，而“等”字后面却是“三个团体”，前后显然矛盾。可以改做：“出席联席會議的有三个团体的代表——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常任理事池田正之輔…等人”。（溫端政）

211 梁軍大学已畢業 / 將回到北大荒去（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7版标题）

第一句的詞序不对，按原标题字数，应把“已”字移到“大学”之前。（野帆）

212 如果一味貪革命之功，以为天下是老子打出來的，那么，習慣势力將終会吞沒他而远离了革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8版）

是誰“远离了革命”？按作者的意思自然是被習慣势力吞沒了的“他”，但是按句子結構只能是吞沒了他的“習慣势力”。應該改做：“那么，他將終于被習慣势力吞沒而远离了革命。”（程好問）

213 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閉幕 / 决定發展健康的創作討論（人民日报1957年4月7日5版标题）

“發展”二字应改为“展开”。（魯揚）

214 被批評者会認為这种批評是輕浮和不誠懇的，而采取玩忽的态度来虛意接受；也会被批評者認為这种批評是变相的打击，是含有敌意或歧視，而拒不接受，結果，通过它不能达到團結的目的。（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8版）

1) “玩忽”一詞通常指明知必須遵守（規則等等）而有意輕視的行为。这里是对別人的批評意見表示不重視，則用“輕蔑”較為妥貼。2) 一般只有“虛心”、“假意”，沒有“虛意”，这里按文意應該用“假意”。3) “也会被批評者認為…”按照漢語的結構，只能是“也会被批評者認為…”，假如是“也会被批評者認為…”（作者的原意是这样）則“也会”必須放在“被批評者”之后，因為我們只說“也会被張三認為…”或“張三也会認為…”，不說“也会張三認為…”。4) “通过它”放在这里意义不明，刪去了反而簡潔。（震山民）

215 这許許多多年，司芬克斯受的磨難，比什么人深？（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8版）

“比什么人”之后一般都用肯定的形容詞，如“比什么人高、比什么人矮”，形容詞前不加否定詞的。假使要加上，則一定加在“比”之前，如“不比…”。其实这里不必用反問語气，把“不”字換“都”字就行了。（項鐵鼎）

216 但是整个說来，这部影片給我的印象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越来越淡，远不能像“白毛女”、“董存瑞”、“翠崗紅旗”那样始終銘記在心头。（光明日报1957年3月9日3版）

“給我的印象”應該在看完电影以后就有定論，它怎么会“与日俱增”呢？应改为：“…給我的印象并不深刻，在我的記憶中越来越淡，远不像…”（沈士英）

217 上海市副市長刘季平和上海市工会聯合会副主席張祺等分別代表市人民委員會和市工会聯合会發給每个优秀教师以獎狀、獎章和獎品。（光明日报1957年3月31日1版）

这个“以”字拿掉干淨。（沈愉）

218 由于老成凋謝，后继無人，甚至某些剧种因而衰竭，这是值得注意的教訓。（光明日报1957年3月31日社論）

用“衰竭”來說明剧种，不恰當，應該用“衰落”。“甚至”是表示进一層的，这里并無比較，用不上。应改为：“…某些剧种已經日漸衰落，…”（沈錫人）

219 董志强正跟一群劳动犯鋤麦草。（中国青年报1956年12月20日2版）

只有“盜竊犯”、“杀人犯”、“战争犯”等等，沒听说有什么“劳动犯”。难道“劳动”也是一种罪名嗎？这种乱造名字，應該摺弃。（喬維森）

220 比如，我們“画法几何”課是由一位助教講授的，开始时，他講的平淡、膚淺，同學們都覺得吃力…（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26日3版）

講得深奧，听不懂，才會覺得“吃力”，既然講得“平淡、膚淺”，就只能“乏味”，決不會“吃力”。（董遵章）

221 賀慶蓮除了做好自己分担的工作外，還自告奮勇地代替了他倆夫婦的工作。（中國青年報 1957年1月30日1版）

“他倆夫婦”就是“他兩人的夫婦”，講不通，作者的原意也不是這樣。應改為“他夫婦倆”或“他們夫婦”。（董遵章）

222 蘇又一無腳飛將軍榮獲英雄稱號（中國青年報 1957年4月12日4版標題）

幾國並列時可以把蘇聯單稱為“蘇”如：中蘇…，但單用時就應該稱蘇聯。如果照顧標題字數，寧可將“榮”字去掉。（茅開）

223 七十六歲的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這幾天正忙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匯報 1957年3月8日2版）

不是“七十六歲的康有為”，是“康有為的七十六歲的女兒…”。如果採用原來的詞序，應該在“七十六歲的”之後加頓號。（周增泰）

224 今年以來，公私合營聯合儀器廠試制成功八十八種新產品。（北京日報 1956年12月23日2版） 今年以來，這個廠先後為武漢長江大橋工程鑄造了油壓的四種大配件的毛坯…（同上）

“以來”（或“來”）有兩種用法：一種是說出過去某一個起算的“時點”，如“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種是說出從這個“時點”到現在的“時段”，如“三年以來”。這兩個句子，說話的時候（即計算的終點）是包括在“今年”之內的，因此起迄不明，無從計算（凡用“今”字“本”字，如“今天、本月”，都不能跟“以來”）。改法：1）要是不計較年底的幾天，就說“今年”或“一年以來”；2）要是認真一點，就說“今年年初（或‘一月’）以來”。（孫方）

225 他們深深地感到了部隊大家庭的溫暖，特別是因為即將擔負起保衛首都天空的任務而感到無限光榮。（北京日報 1956年12月23日2版）

“感到…溫暖”是一事，“感到…光榮”又是一事，中間不能用“特別是”，應該作“又”字。（孫方）

226 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里亞迪斯、維諾夫斯基、斯提佩克和特雷已分別擊敗田中、荻村、角田和宮田，而贏得了全部男子單打的比賽。…此外，捷選手還贏得了一盤男女混合雙打的比賽，日選手贏得了一盤男子雙打的比賽。（北京日報 1957年3月30日4版）

贏得的是“勝利”，不是“比賽”。可把“比賽”移到“的”字之前，再在“的”字之後加上“勝利”。（程越）

227 本市三十八個國營工廠學習毛主席的講話/眼界開闊思想認識提高（北京日報 1957年4月15日2版標題）
學習毛主席的講話後，眼界開闊，思想認識提高的是這些工廠的幹部（新聞內容稱幹部），不是工廠本身。這個標題雖然不致引起誤會，但最好還是在“工廠”之後或“眼界”之前加上“幹部”兩字，使它清楚明確。（徐英葆）

228 二、來稿要注意簡鍊，一般不超過一千字左右。（內蒙古日報 1956年12月21日4版徵文啓事）
數詞之後加“左右”就由確定數目變成大概數目，不能再說“超過”與“不超過”。可刪去“左右”或改作“一般以一千字左右為宜”。（黃光甫）

229 這次介紹的“迢迢牽牛星”也是古詩十九首中的一首。據徐陵的《玉台新詠》，它也是兩漢詩人枚乘作的。（中國青年 1957年7期22頁）

枚乘究竟是“西漢”“東漢”應說確定，不能混稱“兩漢”，若不明確分清“東、西漢”，可以用“漢朝”。（舒市丙）

230 而研究工作呢，卻比較最輕鬆，最有希望。（中國青年 1957年第7期32頁）

“比較”之後，不能跟“最”字。（鄭江生）

231 我懷着無限的敬意而又為她感到殘廢的難過心情，目送她坐車遠去了；我知道我這種為她感到殘廢的難過心情是多餘的，因為她是勇敢的人。（新觀察 1957年2月第3期9頁）

“為她感到殘廢的難過心情”不成話，主要是把詞序弄亂了。應改為：“我懷着無限的敬意和為她的殘廢而感到難受的心情…我知道我這種為她的殘廢而感到難受的心情是多餘的，…”（魏文瑞）

232 1951年的初冬，張瑞芳參加了上海電影制片廠。（大眾電影 第4期11頁）

這裡用“參加”不如用“加入”。如果用“參加”，應該在後面加上“工作”兩字。（蘇東川）

233 我們以為：要更進一步的發掘與整理祖國醫學遺產，對於學習和研究的方法問題上，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為此，希望各地讀者，對於他們的學習方法上，能夠多提些意見。（上海中醫藥雜誌 1957年1月號26頁）

只有“對於…”或“在…上”，沒有“對於…上”。這裡第一個“對於…上”用不着，應該刪去。要是把“問題”、“是”、“着”（以及中間的逗號）刪去，則更為簡潔。第二個“對於…上”應改為“對於…”或“在…上”。“他們的”應刪，因為讀者對本人的學習方法未必有意見，即使有意見也無必要在刊物上發表；這裡的“學習方法”應該是一般的。（陳大堯、孫經國）

更正 本刊1957年4月號31、32、33面作者“鄭達漢”應為“鄭遠漢”；40面左欄倒15行“何藹人”應為“何霽人”；48面左欄倒20行“1頁”應為“1冊”。



唐蘭先生近著讀后感

伯 韓

讀過唐蘭先生《再論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以後，我覺得他的主張有兩點比以前進步：1)承認純粹的拼音文字可以和綜合文字平行發展；2)對拼音字母的採用沒有堅持一定要用某一種自創的字母，而且明確地主張採用橫行排列。我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唐蘭先生的這種在漢字文章裡面夾用拼音字母的原則是接受的。不過唐先生的主張有兩個缺點：一個是沒有承認這種綜合文字和原來的純粹漢字平行地使用；另一個是沒有注意到這種綜合文字和純粹拼音文字之間的密切聯繫，因而沒有主張採用和純粹拼音文字同樣的字母。

關於這兩個缺點，韋慤先生的《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那篇文章里說得很清楚，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韋先生的結論並不同意唐先生的綜合文字，而我的意思稍微不同一點，就是有條件地同意唐先生的主張。我覺得只要唐先生認識綜合文字是新旧文字之間的過渡形式，承認一方面和新文字（純粹拼音文字）另一方面和旧文字（純粹漢字）平行使用，同時又和新旧兩種文字密切聯繫起來，所用的漢字部分和旧文字完全一樣，所用拼音字部分和新文字完全一樣，那末，這種綜合文字也就可以起着溝通新旧文字的橋梁作用。但是不能把這種綜合文字理解為一套獨立的文字，因為它只是兩種文字的綜合應用罷了。

要求拼音字完全像漢字，是不可能的，即使把注音字母拼成方塊，也不能使每個音節都像漢字。綜合文字只能做到象中文夾外文的样子，但是這個样子並不丑。日本文把假名和漢字夾用，有時也夾用西文，看慣了也不討厭，有時因為它印刷精美，反倒覺得好看哩。

“綜合文字”行得通

程祥徵

唐蘭先生說：“真正為人民大眾願意接受的文字是不需要大力推行的”（見《中國語文》1956年1月號，31頁）。我覺得這話很對，簡化漢字推行後即為人民群眾普遍接受的這一事實就証實了這一點。目前，文字改革工作似乎只局限於少數專家，這種脫離人民群眾的現象，必將產生不良的後果。因此，我認為唐蘭先生的這句話值得大家深切注意。

應該首先肯定，唐蘭先生是堅決主張文字拼音化的，但他認為“同樣走拼音方向，也還有不同的意見”（見《中國語文》1957年3月號，7頁）。我們應當尊重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在爭論中發現真理，用來指導文字改革的實際工作。

唐蘭先生認為，整套拼音文字的完全實現，必須以語音統一化、詞彙固定化、語法規範化為前提。這些前提的建立，不是十年八年可以成功的。即使十年八年成功了，整套拼音字母的採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了文字拼音化的早日實現，唐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綜合文字的方案。所謂綜

合文字就是在一些簡單的方塊漢字中加入用字母（唐蘭先生主張用注音字母，我主張用拉丁字母）拼寫出來的拼音字；這樣，就可以把漢字簡化工作和漢字拼音化工作結合起來，就可以在漢字的體系中注入新的質素。大家知道，新質素是具有不可戰勝性的。通過“新質（拼音部分）的逐漸積累，舊質（漢字部分）的逐漸衰亡，最後飛躍為完全拼音的文字。這是由漢字的內部引起矛盾而發展出來的新文字”（同上，9頁）。

以上就是唐蘭先生主張的本質所在。撇開他的某些不妥的論點（如把語言同文字混為一談，文字能夠脫離語言而直接表達思想，民族形式就是方塊字或“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的注音字母，我們不妨心平氣和地、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討論。唐蘭先生的主張是否正確、能否採納，我認為絕不應由一些權威人士來規定，而應當從唐先生的主張的實質來探討，結合當前社會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接受能力等，然後才能作出決定。

前面談過推行成套的拼音文字，必須要以語音統一化、詞彙固定化和語法規範化為前提。可是，這並不等於說：必須把這些問題完全解決後再施行拼音文字。我們可以一面解決這些問題，一面擬定並推行拼音方案，在這之前，可以用拼音字母作為推廣普通話的工具；又可以通過拼音漢字跟方塊漢字同時並用的方式，最後達到文字拼音化的唯一目的。那時方塊漢字則將成為一部分人專門研究的對象。這當然也是一條可以通行的道路，可是它的進度將是很緩慢的。同時走這樣的道路必然會出現如下的情況：只是少數人在那裏閉門造車地擬定拼音字母，待字母造好了再向廣大群眾推廣，而不能很好地發動群眾參與文字改革的工作，發揮群眾的積極創造精神。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基本上採用唐蘭先生的綜合文字的主張，就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讓拼音漢字以簡化漢字的身分打入方塊漢字的體系中去，逐漸替換方塊漢字而在社會中通行。最後，也達到文字拼音化的唯一目的，我認為這條路是完全行得通的。

人民群眾正以極大的熱情參與漢字簡化的工作。每天都有不少的簡字出現。例如在我這裏，就有炊事員同志把“膳”簡化成“腩”，把“碗”簡化成“碗”等等。這些簡字能否被社會公認是另一回事，群眾的這種積極精神至少是應當肯定的。也只有從人民的不斷創造中才有可能選出全社會通用的簡化漢字。如果綜合文字的風氣一開，群眾將以同樣的熱情投入自動使用拼音漢字的群眾性運動中去，那末，綜合文字中的拼音漢字將以它的優越性在方塊漢字的體系中逐漸發展，“最後飛躍為完全的拼音的文字”。

回顧漢字發展的歷史，當形聲字的風氣一開，便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絕對的優勢，這就說明漢字本身原就具有“密切表音”的趨勢，那末，如果在今天大力開展綜合文字的運動，在不長的時間內拼音漢字在方塊漢字的體系中取得絕對的優勢，“最後飛躍為完全的拼音的文字”，也是可以想像

的。企圖由專家們先完成一套拼音文字的方案，然後再在群眾中試行推廣的做法，必將延緩拼音文字的誕生，必將違反社會主義事業一切從速的基本精神，這是脫離現實的。肯定地說，文字改革不僅是專家學者們的事，更主要的是人民大眾的事。既然人民在幾千年前能夠創造方塊文字，為什麼不讓文字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在新的歷史時期以自己卓越的智慧來發揮、推進文字拼音化的應有作用呢？

反對者們把“綜合文字”說成是改良主義的。理由是在常用的簡化漢字中加進一千多個拼音字的綜合文字不是“完全的拼音”，因而不是“根本的改革”。他們故意抽掉了唐先生主張綜合文字只存在於一個較短的历史時期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並不妨礙綜合文字只不過是一種過渡性的文字的客觀性。（應當說這種過渡性的文字是切合實際需要的。）毫無疑義，綜合文字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拼音文字。因此“綜合文字”絕不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恰恰相反，它是“穩步前進”的積極的一種方法。

《中國語文》的編者去年年初以批判的形式發表了唐蘭先生的文章，應該說，這樣的做法是違反“百家爭鳴”的精神的。某些學者以粗魯的態度斥責、謾罵、甚至吓唬跟自己意見相反的人，也似乎缺乏科學工作者應有的謙遜態度。在科學的領域里，必須以理服人，只有這樣，我國的語言工作者在文字改革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的面前，才能團結得更加緊密，也只有這樣，文字拼音化的理想才能更早地得到實現。

這種比喻是不妥當的

毛西旁

最近在《中國語文》1957年2月號上，唐蘭先生以非常坦率誠懇的態度，再一次闡述了自己對文字改革問題的意見。文字改革是全國人民的事，任何人都擁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唐蘭先生有權利提出自己的主張，別人當然也有權利提出反對的意見。1956年1月號《中國語文》在發表唐先生的《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一文的同时，也發表了一些同志的反對意見。雖然某些同志的文章中存在着冷嘲熱諷和扣大帽子等缺點，但是他們所作的分析和批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看了這些文章後，曾對許多關於文字改革的不同主張進行了比較和研究，現在我仍舊不能同意唐先生的主張，因為唐先生的理論缺乏說服力。我始終贊成走拉丁化拼音文字的道路，並且擁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所制定的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韋慤同志在《和唐蘭先生商談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見，我認為是完成正確的，值得唐先生考慮。韋慤同志指出，採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是我國六十多年來文字改革經驗的總結”，這話不是憑空說的，這話里不知包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唐蘭先生是我國有名的文字學家，應該仔細研究“我國六十多年來文字改革經驗的總結”才對，不要一味死抱住自己的主張不放。唐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為人民大眾的利益着想”，這話是對的，我們也相信；然而能不能說主張拉丁化拼音文字的人就沒有“為人民大眾的利益着想”呢？（我感覺唐先生的文章中有這種意味。）如果有這種想法，我認為是不妥當的。六十多年來，許多人提出過不同的文字改革主張，應該承認他們都是“為人民大眾的利益着想”的。至於他們的主張是否切實可行，是否偏於主

觀，那倒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都在為祖國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努力鑽研問題，誰的主張對，誰的主張不對，完全可以擺出來，以客觀事實作基礎來討論，來研究，不能象唐先生那樣地理解為“鬧宗派”。

關於唐先生所主張的“綜合文字”的嚴重缺點，許多同志已經批評過，我完全同意那些批評，這裡不再多說。我只想就唐先生在《再論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一文中所作的一些比喻提出一些看法。唐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作的一些比喻，我覺得很不妥當。唐先生說：“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不只一條，通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也不只一條”。我認為這兩個問題不能相提並論。由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他們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不可能相同的，這是客觀存在的真理，誰要否認它，誰就要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我國的文字改革是漢族文字的一種改革，漢族文字是統一的，它不存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就談不上什麼不同的道路，更用不着讓兩種拼音文字同時推行。因為沒有各種不同的客觀事實，當然就不可能有幾條同樣好的道路。六十多年的文字改革經驗的總結證明，漢字改革的正確道路只有一條：拉丁化拼音文字。就正如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也只有一條一樣（這是被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革命經驗所證明了的）。另外，唐先生還拿變工隊、互助組、人民民主專政作比喻，來給“綜合文字”作辯護，我認為是不妥當的，文字改革不能和這些事實相比較。

這是我讀了唐先生的文章後的一些感想，提出來向唐先生和大家請教。

關於唐本《說文》的真偽問題

【編者按】惲天民同志來信對本刊1956年9月號發表的周祖謨先生《許慎和他的說文》一文提出幾個不同的意見，現在將原信與周祖謨先生對所提第二個問題的答復一同發表出來，供讀者參考。

惲天民：這篇文章里面有少數幾處我覺得還有待商榷，這裡提出來向大家請教，並就正於周先生。

第一，關於《說文》引用今文經的問題。周先生說：“許氏在解說中，有時引用經傳來說明字義或字音。除《儀禮》用今文經，《詩》間用《韓詩》外，其他都是古文經。照周先生的文章所說，是許慎在《說文》中只引用過《儀禮》和《韓詩》兩種今文經，這和事實不符。如象《說文》7卷上鼎部說：‘鼂，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鼂，小鼎’，3卷上雷部說：‘雷，高聲也，一曰大噦也，《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慙然而哭’。8卷下見部說：‘覲，暫見也，《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陽生’。12卷女部說：‘嬀，楚人謂女弟曰嬀，《春秋公羊傳》曰：楚王之妻嬀’。《魯詩》和《春秋公羊傳》都是今文經，後者更是今文經中最緊要的一部典籍。因此，說許慎在《說文》中只引用過《儀禮》和《韓詩》兩種今文經是不恰當的。

第二，關於《說文》比較早的傳本問題。周先生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說文》的傳本，時代比較早的是唐寫本和宋刻本。唐寫本有兩個本子，一個是木部殘本，存一百八十八字，將近全書五十分之一……是中唐人寫本，原為清人莫友芝所藏，現為日本人所有”。這個木部殘本，孫詒讓斷定是清人偽作。他在《溫州經籍志》7卷里說：“近獨山莫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

多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識之。莫号能鑒別古書，乃为其所欺，可歌也”。孙氏又在这里加“注”說：“莫本每頁十八行，每行上下句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样》均不勻排字数，足證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鑒定歐稱篆法《說文》六紙。案唐本在宋時，猶今之明写本，固非絕無僅有之物，况許書唐本全佚，彼時尚有流傳，何得殘廢六紙，遽登秘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為伪迹显然，莫氏自不察耳。”孙詒讓这一段話，值得我們考慮。

此外，周先生說段玉裁“根据《玉篇》、《集韵》的訓釋……來校訂二徐本的是非”。《集韵》疑是《广韵》之誤。

周祖謨：前在《中国語文》51期写了一篇講許慎《說文解字》的文章，提到唐写本《說文》木部殘本是今日所見《說文》最早的傳本。有同志指出清代學者孙詒讓在《温州經籍志》卷七內已經斷定唐本《說文》木部是清人偽造的，值得重視。

孙詒讓說：“近獨山莫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友人歐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識之。莫号能鑒別古書，乃为其所欺，可歌也’。由此可知孙詒讓是听汪宗沂說的，汪宗沂是否可靠也很难說。我們要斷定它的真偽，只有根据原物來判斷。

唐本《說文》木部从莫友芝手轉歸端方，后来又流入日本，大家所看到的都是莫友芝的复刻本，既然很少有人看見原物，所以很多人疑惑它是偽品。

我曾經看到原物的照片，除宋“紹興”小印、米友仁鑒定跋和俞松題記外，尚有明人印記。卷末有清楊守敬跋語，稱“此卷黃麻堅韌，墨光如漆，与守敬所藏唐人書左傳無异。”這說明鑒賞家已經肯定它是唐代的古書了。

其次，从原物的書法來看，楷書的体勢确乎是唐人的筆法，絕非清人所能偽造，凡是熟悉唐写本的人，一望可知。最值得注意的是篆書，篆書作懸針体，遒健雋逸，胜于唐元次山《梧台銘》（參看下圖），清代的人是写不出來的。汪宗沂的話絕不可信。



以上只是从紙張、墨色、書法方面來談的。但最重要的是要看內容。內容要从三方面來看：(1)字次，(2)說解，(3)反切。

木部的字次，唐本与二徐本不同的地方很多，互有短長。然唐本“檜”字列于“櫪”“櫪”之后，“櫪”字列于“櫪”“櫪”之前，

“悅”字列于“愜”字之后，都比二徐本合乎許書條例。在說解一方面，唐本的說解要比二徐本好得多了。莫友芝的《箋異》已經講得很多，不需要多談。但是無論字次或說解，唐本也都有錯誤。這正可以說明它不是清人所偽造的，如果是出于偽造，有現成的二徐本可以做根據，為什麼作偽的人一定要弄出許多錯誤出來呢？可見原物絕非清人所偽造。

大凡古本書籍其中往往有胜于今本的地方，也有不如今本的地方。因為書經傳寫，難免有誤。古本之可貴，就在于今本都錯而古本不錯處。唐本《說文》木部較二徐本有優有劣，也正是古本書籍的面貌。

唐本《說文》木部的反切跟《字林音義》是一個系統，這是唐以前《說文》傳本的舊音（拙著《唐本說文与說文舊音》一文已談過），清人想偽造也偽造不出來。

从內容來看，我們可以斷定它的确是古写本。孙詒讓過信汪宗沂的話而不去虛心研究唐本的內容，就斷定它是偽品，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孙詒讓在經籍、文字方面的成就我們非常重視，可是這一段話，我們不可以據為典要。假如認為他的話可信，就會把一份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給抹殺了。

由于同志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使我有機會再把唐本《說文》木部說得更詳細一些，希望同志們指教。

編者作者應該注意漢語的規範

譚永祥

为了促進漢語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規範，《中国語文》从1956年8月号起增辟“語文短評”一欄，討論有关詞彙和語法規範方面的一些具體問題。這對一般讀者是很有幫助的。不過遺憾的是，《中国語文》所發表的文章，就用詞造句方面來說，也有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例如1956年9—12月号連載的《詞類的區分和辨認》一文，里面就有很多不合規範的詞句。現在摘錄幾個例子，并試加改正。

1. 然后提出我們的漢語詞類的區別标准和辨認方法來供語法研究者的參考。（9月号12頁左欄）——“的”字應刪。

2. 在漢語沒有語尾變化來表明詞的性質，但詞的性質是存在于表示客觀實在的詞本身之內。（10月号26頁左欄）——“在”字多余，刪去后讓“漢語”作第一個分句的主語，句子就順當得多。

3. 通過詞類這樣的性質或本質的研究或从詞的意義來分類，我們才能找出語言組織跟詞類經常而確切的关系。（10月号29頁右欄）——a) “性質或本質的研究”費解，應刪去“性質”和“或”；b) “通過詞類……的研究”和“从詞的意義來分類”并非“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关系，不能用“或”字來联接，“或”字應改成逗號。

4. 从王力的話：“我們不能認數目字……”，又从呂叔湘的話：“大多數動詞和形容詞能用作某些動詞的賓語，……就應該承認它們已經變成名詞”，他們証明了形态這一標準，區分詞類是會碰到困難。（10月号30頁左欄）——下文沒有跟“从”字呼应的動詞，只說了兩句沒頭沒尾的話“从某某的話”改成“某某說”，不是簡單而又明了嗎？

5. 這獨立的存在特性似的團結和孤獨，焦躁的獨立（下轉25頁）

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語音·語法現象

董遵章

上 (1) 表示方位, 有兩個讀音: a) 單純的方位詞, 如“往上看”, 讀[xaŋ↓]; 跟別的詞組成名詞或者方位結構, 如“晚上、身上、鍋台上”, 也讀[xaŋ↓]; b) 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 都讀[san↓]。

(2) 表示動作, 也有兩個讀音: a) 單獨作謂語, 如“上車、上了堤”, 讀[san↓]; b) 附着在主要動詞后边表示動作的趨向, 如“裝上、塞上去”, 讀[xaŋ↓]。

(3) 作形容詞或形容詞性的詞素時, 如“上級、上游、上一代”, 都讀[san↓]。

下 (1) 表示方位, 有兩個讀音: a) 單純的方位詞, 如“朝下看”, 讀[xa↓]; b) 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 讀[pia↓]。“底下”的“下”也讀[xa↓]。跟別的詞組成方位結構, 中間就得加“底、根”等字, 如“樹底下、牆根下”, 這時也讀[xa↓]。

“下”直接附在名詞后, 如“眼下、脚下”, 在寿光方言里是不大說的。例外的情况如“年下”, 有時讀[pia↓], 有時讀[xa↓]; 又如“手下有很多人”, 就只讀[pia↓]。

(2) 表示動作, 也有兩個讀音: a) 單獨作謂語, 如“下雨、下楼”, 讀[pia↓]; b) 附着在主要動詞后边表示動作的趨向, 如“擱下、掉下去”, 讀[xa↓]。

(3) 作形容詞或形容詞性的詞素時, 如“下等、下首、下嘴唇”, 都讀[pia↓]。

(4) 作動量詞用時, 如“一下、几下”, 讀[xa↓]。

里 表示方位有兩個讀音: a) 跟別的詞組成方位結構, 如“心里”, 讀[niŋ]; b) 單純的方位詞, 如“往里走”, 讀[liŋ]; 跟“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 也讀[liŋ]。

家 (1) 用作名詞時, 如“回家”, 讀[tɕia↓]。

(2) 用作名詞或疑問代詞的輔助成分時, 如“人

家、誰家”, 都讀[ga↓]。

在复合名詞里的“家”, 如“家庭、家下(指妻子)”, 讀[tɕia↓]。

去 (1) 單獨作謂語, 如“他去了”, 讀[tɕy↓]。

(2) 附着在主要動詞后边表示動作的趨向, 如“出去、趕集去”, 讀[tɕi↓]。

在 (1) 用作動詞而有“活”的意義時, 如“他還在着”、“他不在了”, 讀[tsai↓]。

(2) 用作介詞時, 如“在床上躺着、扛在肩上”, 讀[tai↓]。

像“老李在家嗎?——不在家”句中的“在”, 一般說是動詞, 但在寿光方言里讀成[tai↓]。這跟(1)項不同, 而跟(2)項相同, 因此這個“在”字是動詞還是介詞, 還可以考慮。

別 (1) 用作構成复合動詞的詞素時, 如“離別”, 讀[pie↓]。

(2) 用作形容詞時, 如“別人、別的樹”, 讀[pie↓]。

(3) 用作副詞而有“不要”的意義時, 如“別看他、別亂寫”, 讀[pai↓]。

沒 (1) 作動詞用時, 如“太陽沒下去了”, 讀[mo↓]。

(2) 作否定詞語(動詞、副詞)時, 如“沒法子、沒有來”, 讀[mu↓]。

以上所說的幾個字, 在山东寿光方言里每一個字都有兩個讀音。一般地說, 實詞性質的是一種讀音, 虛詞性質的是另一種讀音。可是讀書音只有前一種讀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上、下、里”這三個方位詞只在作單純的方位詞或者和別的詞組成名詞或方位結構時用“土音”, 而跟“以、之、边、面、头”組成合成的方位詞時, 就只用讀書音, 不用“土音”。

每冊定價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4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5 月号

總第 59 期

1957 年 5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海甸中關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 三個月 0.72 元, 半年 1.44 元, 全年 2.88 元; 寄費: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9,540 册